

# 目 录

## 经济运行辑

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一个本质特征.....	( 3 )
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是“紧运行”.....	( 15 )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若干问题的思考.....	( 37 )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研究的思考.....	( 121 )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特征和改革问题.....	( 139 )
紧运行：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运行的基本 特征.....	( 154 )

## 金融改革辑

金融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	( 191 )
建立金融市场,深化金融改革.....	( 202 )

## 首都发展战略辑

关于计划体制改革的几点想法.....	( 209 )
关于发展北京市第三产业的问题.....	( 213 )
从实际出发研究首都发展战略.....	( 222 )
首都发展战略研究中现代决策方法探索.....	( 226 )

关于首都发展战略研究的几个问题.....	( 235 )
首都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 248 )

# 经济运行辑

---



## 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一个本质特征<sup>①</sup>

在我们面前，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现象同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现象表现出明显的对偶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是普遍存在的需求不足，供给过剩，劳动力过剩、资金过剩、商品过剩、生产力也过剩；在社会主义则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几乎所有生产条件和资源，相当多的生产资料都短缺。在资本主义，整个经济是预算约束型的；在社会主义则是资源约束型的。在资本主义是企业的预算约束硬化；在社会主义则是企业的约束软化。在资本主义是买方市场；在社会主义是卖方市场，如此等等。

资本主义的微观约束硬化是私有制决定的。社会主义的微观约束软化则是现时存在的公有制决定的，是由需求膨胀条件下经济的结构化造成的。

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资源闲置及浪费，雇拥劳动与资本的对立，经济危机等问题和企业竞争性强，管理水平高，技术进步动力较大等特点，都同出于私有制造成的预算约束硬化。这

---

① 本文写于1986年6月，发表在《学习与研究》1987年第一期。

种硬化同时表现为宏观的生产力过剩和社会需求不足。经济危机即资本主义的经济震荡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自发地强行调节过剩状态的表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破坏作用在 1929 年达到巅峰之后。因为政府的干预政策、科技进步和政治、军事等原因，周期震荡大大缓和了，范围和强度都减少了。在今天，只在鲜活商品上还表现出较大的周期性破坏作用。但是各种过剩的经济表现仍然普遍存在，如：资金、劳动力、资源等都存在着过剩状态。过剩是形成买方市场的条件。在社会上资源和生产力过剩的情况下，企业才可能随时迅速地购买到一切生产条件，实现资本的转移和增殖，也才可以加强管理极大地减少内部物资准备。在资本主义方式下，企业的准备资金主要地不是表现为物质资源而是表现为货币，有货币——一般等价物，就能够调动资源和生产力。准备资金从实物资本形式转变到货币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因此，资本主义依赖财政和金融就可以实现产业利润率的调整，就可以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就可以引导整个经济状态。列宁在分析帝国主义特征时曾经深刻揭示了金融资本的这个作用。企业的准备资金以货币形式存在，是以社会上大量的物资和生产力闲置为条件的，没有这种外部条件，一般等价物向生产条件的转化是不可能随时、迅速实现的。

“过剩”的海洋造成了金融资本及其垄断形成的基本条件，以金融为船舵的资本主义经济转向快，就是以“过剩”为前提的。

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一切都反过来了。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之后，解除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对经济发展的社会约束——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约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奇怪现象：人们的贫困和商品过剩同时存在的现象消失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对社会生产力和生产资源充

分利用的基础上的（当然，这种实现资源充分利用的方式，是行政的，还是经济的，是用于体现技术进步要求的结构还是单纯的数量扩张都需要研究）。实现充分利用是依靠统筹规划和计划，在全社会进行调度、平衡、安排来实现的。它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因此社会主义的社会需求摆脱了社会性约束，出现了人们的需求大于供给，从而形成源源不断的生产发展动力这一社会经济发展的更为合理的状况。需求过强以至膨胀是现实存在的所有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现存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优点和缺点也都同出于这个特征。这种摆脱了社会约束的需求膨胀，只有在资源约束面前才会“俯首贴耳”。社会主义的需求膨胀只受到资源约束。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机制”，但却是物质的而不是社会的“机制”。一旦人为地放松了各种经济宏观管理工作的主动约束性，社会需求就会自发地过份膨胀，每逢这时，资源约束就从“隐型在后台”走上“显型的前台”，整个经济发展和需求增长就不得不在“物质”面前“止步”。“过剩”的海洋消失了，社会经济结构直接面对资源了。

因此，社会主义经济是资源约束型经济。这是对于社会约束型（包括预算约束型）经济的否定和伟大进步。它第一次使经济发展建立在资源充分配置上成为可能，而不是追随在市场供需关系的人为的社会约束的后面。在这种状态下，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的不是货币而是资源。各种形式的准备资金都主要地表现为物资形式。物资短缺和卖方市场长期地、强度不同地存在着。

需求膨胀在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在苏联，即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中，计划管到生产，是严格的、周密的行政化计划体制，其需求膨胀的主要表现方式是投资需求膨胀，物资短缺、消费膨胀由投资膨胀所引导。

在匈牙利，行政的计划管到价格、金融、工资和税收等“经济杠杆”，通过“经济杠杆”调节经济运行。在调节经济运行的层次上，是非行政化的，但它仍然企业约束软化。其基本建设投资、信贷、消费基金等都表现出周期性膨胀。消费基金的膨胀越来越成为社会需求膨胀的主导。

在南斯拉夫，行政计划只管金融，“经济杠杆”的调节几乎包容了经济发展的所有方面。在那里，是消费基金不可逆转的增长，生产投资不足，信贷约束严重软化，企业分光吃净倾向严重。

无论哪种模式，需求膨胀这一经济现象是共同的。但膨胀的方式和方面不同，而导致资源约束的需求膨胀是由公有制下的社会因素决定的。

当然，社会主义条件下也会出现局部的过剩现象。这种过剩不是需求膨胀的消失，而是更严重的结构性需求膨胀造成的短缺的另一种表现。当局部过剩现象出现时，总伴随着结构性及总量的短缺存在，而且后者的强度总大于前者。这种“过剩”是需求提前质变或生产力长期单纯数量型扩大再生产或经济发展中结构性“偏向”的结果。

三十年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多种经济体制改革，试图通过强化预算约束的办法来制止需求膨胀。但目前看来，预算约束的硬化程度是有限的，无论需求的结构怎么变化，总强度并没有减少。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抑制需求膨胀的问题必须寻找多样化的出路。

综上所述，可以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是日益膨胀的社会需求同有限资源约束之间的矛盾。这里所说的资源，即指自然资源，也有做为生产基础和前提条件的，由劳动积累形成的资源，如：生产资料、劳动力、基础设施等等。我们平时所说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只是这种

基本矛盾的更原则、更笼统的说法。由这个基础矛盾出发，社会主义宏观经济领导的主要任务是自觉地调节这两者之间关系，防止“激化”。这个基本矛盾表明，社会主义的经济机制必然是多方面的，如：物价、财政、税收、工资、金融、投资等等。因此，用这些机制来调节经济不是一项简单的事情，同时也说明，社会主义要将控制需求增长放在首位考虑。因为需求是社会主义最活跃的经济因素。

从这样一个基本矛盾出发，经济体制改革就要首先紧紧围绕解决这个基本矛盾来进行，改革的目标、方针、政策都应针对短缺经济运行状况。旧经济体制中的种种弊端是短缺经济中的问题，简单地用“过剩”经济的办法来纠正是很难有助于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的。

## 二

在我国社会主义短缺经济状态下，也出现了周期性经济震荡——资源耗尽型经济震荡。其基本特征是：投资和消费的需求膨胀——制造业的生产膨胀——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再膨胀。为适应消费膨胀或经济发展高速度，投资结构畸变，资源开发性投资比例下降——资源极度短缺（如：重要的生产原材料、能源、交通、粮食、外汇、资金等）形成的停滞和调整。这种经济震荡反映出在短缺经济中经济规律对需求过度膨胀，极度短缺状态的“自然”调整过程。这是一种事后的，被迫的调节过程。出现经济震荡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完全有可能避免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为消除这种震荡奠定了最重要的条件。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水平低，我们历史上只有几次摆脱了“盲目”，抓住“自觉”前进的线索。

没有社会约束(非私有制的)的需求膨胀是社会主义经济不稳定和震荡的基本原因。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个任务应该是解决震荡问题。出现震荡是经济体制不成熟的、典型的、集中的和全局性的表现。依靠震荡的“自然”调整解决经济平衡发展问题是化价沉重的,这已为我国 36 年的建设历史所证明。除此之外,经济体制改革还有许多其它的任务,如:调动职工和企业生产积极性,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解决企业经济效益问题等等,但首要的应是解决经济震荡,保持合理的经济结构,避免“经济折腾”,这是宏观最大经济效益所在,也是经济指导和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

社会主义解决经济震荡问题同资本主义解决经济危机问题是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是在充分利用资源,充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克服需求过度膨胀以解决经济结构合理的问题;资本主义则是在市场的“自发”性产生的资源普遍闲置和过剩的条件下,为缓和社会矛盾,促进资本增殖实行需求刺激措施。

消除经济震荡只是消除了“短缺”最恶劣的形式——有限资源对需求过度膨胀的约束惩罚,但并不会消除短缺。短缺作为相对的稳定状态,还会长期存在。按照非均衡论的观点,社会经济状态中,供需不多不少地完全平衡是不存在的,仅仅是理论上的设想,而不平衡才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指导和控制的作用是使经济摆脱耗尽型经济震荡,减弱短缺强度,趋于供需平衡。它是人类依靠自觉的行动,也就是“看得见的手”驾驭经济的平衡发展。

从更一般的角度看,社会主义短缺经济是对资本主义过剩经济的否定和进步。尽管这看上去是原始的,粗糙的,但却是现实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经济出现了一种反态:生产力的发展好象超过了人们的需要。一方面企业为资本拼命在品种、质

量、技术等方面竞争,另一方面大量社会生产力闲置。社会主义在社会化大生产中表现出人们发展生产的原动力,一切生产都为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需求而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展现给人们的,一开始并不是光彩夺目的“无限”的优越性,而是一种粗糙、简陋,然而却是朴素的现实的生产不断发展的原动力。

### 三

“计划”就其本身的含义而言,是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内在要求,使社会经济按比例、平衡稳步发展。当然,现实离这种“最优化”的计划还很遥远。现在的计划与其说是主动的,不如说是被动的。“需求膨胀”的产生,严重阻滞了“计划”原有功能的成长。需求膨胀不仅表现为企业行为,也常常表现为政府行为。当这种有计划的“无计划需求膨胀”形成时,“计划”便走向它最恶劣的形式——“救火式”计划。社会主义经济的矛盾也走向它最恶劣的形式,即需求膨胀的无政府状态和有限资源的矛盾。计划被迫以行政性办法被动地跟在需求膨胀之后,分配资源和发展短线、约束长线。以分配有限的资源和投资规模适应需求膨胀。这时,一切其它的社会经济机制都变得黯然失色。其他经济机制“退化”的条件下,行政性计划成为反映资源约束、控制需求膨胀发展的最有力的方式,这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但是,这种行政化而非科学化、社会化的计划方式在约束需求膨胀同时,也制造着需求膨胀。这已为我们三十多年的历史所证明。

在短缺情况下的行政性计划,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社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还不够高,短缺程度又较大时的一种十分自然的发展结果,而不会以个人的主观

意志为转移。在我国建国初期，为调整经济秩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种行政化的计划体制曾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成为国家改造和干预经济的主要形式。在此之后，行政化的计划体制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隐退”。但各项需求极度膨胀导致的经济震荡，在它的膨胀、调整的每个阶段上，都不断强化了行政手段的作用。因为别的办法比行政的办法要求较为宽松——供需较为平衡的条件。短缺加强了管理及计划的行政化，而这些方面的行政化又阻碍了社会经济社会化的进程。

以计划的形式，按照全局经济发展要求，按照充分利用资源的要求来指导社会经济发展和企业发展，实质上是社会化生产的内在要求，而不是行政化经济体制的结果。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化特征日益明显。经济结构化要求按比例，比例是结构的数量表现。结构是现代生产力的立体描述、是现代经济的最基本特征之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结构是以金融的结构化为前提的，而金融就其作为货币——一般等价物的运动，本质上是非结构性的。因此，金融的结构化是经济结构化的货币表现而已，是曲折的“映射”。在“过剩”的环境中，结构是“淹没”和掩盖在金融中的。在社会主义“短缺”状态下，“水落石出”，金融对经济的指导作用让位给资源，经济结构性突出地、直接地显现出来。这是一种短缺条件下的，资源约束下的结构化，是不断地再生出“短线”的结构化。经济结构性的最概括表现形式之一是投入产出表。计划是经济结构化所产生出来的经济功能。生产力越发展，社会化分工和联系越复杂，经济结构化(或说系统化)程度越高，经济发展的计划特征也就越突出，要求也就越高。无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还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论是稳定在短线还是稳定在过剩状态下的经济，只要是社会化大生产，

就都表现出了这种特征。

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经济的发展，既要充分利用资源解决结构问题，又要减少经济震荡。以“看得见的手”代替“看不见的手”来自觉地组织和领导社会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是历史赋予社会主义社会的使命。

完成这样的历史转变，需要长期的过程。现实的社会主义，还只是人们自觉地引导经济发展的胚胎期、“原始积累”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经济运行还摆脱不了需求膨胀和短缺的现实基础，无论从认识上还是从客观条件上、手段上，人们利用计划指导经济发展，即以“看得见的手”来推动经济发展的能力还是有限的，相当多的时候是不自觉的、被动的。离不开行政方式，也还离不开市场，离不开“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在一些经济领域中，还要以市场调节为主。这是一个行政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兼容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经时期。也可以说，在整体上这是一种以计划形式出现的、以短缺的卖方市场机制运行的商品经济。在这种市场中，计划只不过是卖方市场运行机制的一种条件和表现而已。在这个历史时期，不管是计划，还是市场，都离不开需求膨胀和短缺的现实基础，我们的改革正是要改进和提高这个市场的社会化程度。当达到以自觉的社会化机制来发展经济时，经济的发展逐步自觉地缓和了需求膨胀，摆脱了盲目被动的短缺的资源约束，便达到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成熟期。这个时期，体制是什么样目前尚看不清，但应具有这样的特征：经济运行中的行政方法失去了计划的主要载体的地位，退居有限作用。行政化计划和盲目市场调节这两种初级形式共同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以信息化为基础的自觉的社会化运行和调节机制，是原有的计划和市场功能的有机的融合。“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融为一体，协调一致，在宏观和微观上同时解决着资

源“最优”配制、结构、科技进步、效益和动力问题。“看不见的手”为“看得见的手”服务，自发性为自觉性服务。计划功能也从行政的方式转变为社会化机制的方式。

计划功能行政化的缺陷是难以完全反映社会生产力内部各方面、各经济单元之间的立体的有机联系和瞬时变化的动态过程，也难以解决效益和动力问题。经济体制改革增加“市场”机制的功能，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市场”机制实际已隐含在现有的经济运行机制中。这不是资本主义传统的过剩市场机制，而是社会主义现实的短缺的市场机制，改革就是要把这种机制更充分地发挥出来，使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有个大发展。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特征首先是在需求迅速增长造成的短缺条件下，尽可能地利用短缺市场的机制，发展商品生产，最大限度地解决资源的配置和经济结构问题，效益、动力问题。各种要素的商品化和市场性流动，都是在需求膨胀的资源约束的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普照的光”。在这种商品生产中，不能幻想“过剩”的市场会自然而然地出现，“过剩”的市场机制会自发地起作用。这是一种以短缺条件下的“看不见的手”直接为全社会的共同目标服务的商品生产。

实践证明，单纯依靠传统“市场”机制不能消除社会主义经济由于需求膨胀造成的震荡，因为在短缺的环境下，难以形成“过剩”的市场，而需求膨胀的形成，是超越市场机制的。这种膨胀持续的再生，不断地限制着传统市场的作用。在目前社会不能自觉约束需求膨胀的阶段上，行政性计划存在的主要任务就是约束需求膨胀，调整经济结构，避免经济震荡。

## 四

解决宏观需求膨胀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解决经济结构问题，同时也是解决微观企业约束硬化，使企业有效益压力，有生产动力的过程。也就是给企业以真正的活力，搞活企业的过程。

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单纯依靠预算约束硬化，因为完全的预算约束硬化是以“过剩”为条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企业预算约束硬化程度不高，一方面是短缺的表现，另一方面，是社会高度结构化的表现。而同时社会主义企业社会约束硬化程度很高，也就是社会公平的原则硬化程度很高。资本主义“机制”的对象是金融，社会主义“机制”的对象是结构、是资源。因此，社会主义形成以“看不见的手”为主体和基本特征的经济机制是困难的，相反运用政策和行政办法反而容易。

企业的活力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大问题。需求膨胀造成了越来越强的短缺，直接制约着企业的活力。高度的需求膨胀，在传统体制下，往往把企业变成了行政的附属物，变成了被动执行上级指示的“机械零件”。而在改革后，需求膨胀逐步从外部转移到企业内部，又会使企业陷于消费膨胀、预算约束继续软化的种种困境之中，从而使企业活力得而复失。因此，企业的活力只有在消除需求的过度膨胀后才能有保证。社会主义企业从无活力的“机械零件”转变为活跃的有生机的经济细胞，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大历史性进步。事实证明，在短缺的状态下企业仍然有广阔的活动舞台。搞活企业，大有作为，可以发展各种横向联合，技术的、资金的、原料的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联合。企业之间的竞争也能广泛开展。我们应该使企业的活力，在短缺条件下，有个最大限度的发展，造成最大限度的生产社会化和企业约

束硬化,造成企业活跃发展的局面。同时,我们也不能跳出短缺的现实环境,幻想出现一个总量过剩的社会环境,使企业有过剩条件下的“活力”。企业是不可能短缺条件下,自发地遵循“过剩”市场机制的。

社会主义必须采取多种方式实现企业约束硬化。首先是把宏观的资源约束用各种社会化的方法分解和“映射”到所有的企业中去,来提高企业约束硬化程度,将宏观资源约束同企业约束有机地联系起来。其次是通过法制化的领导者责任制和合理的经营自主权提高对企业领导的约束硬化程度,比如:资金(资产)经营责任制、经理(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厂长(经理)负责制等等。第三是通过对企业经营行为、投资行为、分配行为的社会监督和综合考核,通过各种经济杠杆对企业行为的调节,提高对企业行为的约束,克服企业行为的短期化和非正常化;使企业追求经济效益,追求技术进步,追求产品质量和企业信誉的长期战略目标。

在社会主义社会,微观企业的约束硬化同宏观经济发展的约束硬化是一致的、同步的。(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两者之间是矛盾的、对抗的。)从本质上说,它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以符合国民经济发展整体需要为原则的,社会自觉的行为。企业的约束硬化程度的提高有待于整个社会化机制的发展。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生产社会化水平低,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以及行政及经济管理层次较多的社会主义大国,是一个要经过很长历史阶段的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

## 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是“紧运行”<sup>①</sup>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不仅提出了对经济体制深入分析和认识的任务，而且也提出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理论深入认识的任务。如果说，几年的经济改革实践，使我们对经济体制和改革方案、措施有了深一步认识的话，那么可以说，对于社会主义运行的认识显得还不深刻、不全面，还较薄弱。社会主义经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特别是近二十年的改革实践，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使人们可以进一步进行理论的思考和探索。这是一个新的基础，它已远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和社会主义初创的尝试，而是有丰富的内容和坚实基础的持续不断地发展和改革的实践。因此，不能简单地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直接结论，更不能由于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就转而全盘使用西方经济学的工具来分析和认识它，而是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吸收所有当代的科学成果，从对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描述和实证性研究开始，形成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系统地、客观地、历史地认识。因此，我们不仅要对近年来改革的实践进行反思，同时还需要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特点、特征、矛盾和规律的认识进行反思。这是更为基础、更

---

<sup>①</sup> 原载1987年2月2日《北京日报》。

为迫切的任务,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有更深远的影响。

---

当我们将考察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目光,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性事件和时期性政策所带来的变化和生机中延伸过去,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新的、整体性历史来把握时,就会发现,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具有鲜明的特征。这种特征在不同时期发生着时期性的变化,但它始终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与其它经济运行的显著区别,这就是“紧运行”特征。

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是“紧运行”。“紧运行”是指在社会经济资源供给相对紧张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这里所说的资源,既指自然资源,如:耕地、水源、矿藏,也指做为生产基础和前提条件的,由劳动积累形成的资源,如:生产资料、劳动力、基础设施等等。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状态是稳定在这种资源紧张状态下的,这是当前的现实。

紧运行的形成不完全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紧运行不是哪个人设计出来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描述过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目标不是紧运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和政策也不要求紧运行。但是,无论主观愿望怎样美好,无论政策和宏观经济调控方针如何变化,实际经济总是形成紧运行。我国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方针和政策都力求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用先进的技术和社会化的组织方式来增加供给,实现国民经济稳定平衡的高速增长。但是,

尽管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和政策各不相同，但紧运行的特征都是相同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资源紧张已经是人们比较“东方”和“西方”经济的最生动、最直觉、最主要的现象。

紧运行有程度的区别，有资源供给紧张程度比较缓解的“宽松”的紧运行。这时，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结构比较平衡，在一些产业、产品类上甚至出现局部的、暂时性长线，而这些长线是直接由其他短线支撑的。也有资源供给出现结构性较严重短缺的紧运行。这时，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短线，以致有些产品或资源成为相对长线。能源的短线可以使生产能力成为长线，建筑材料的短线可以使建筑能力成为长线；饲料不足，猪、禽的饲养能力便“多余”起来。短线的出现也会由于需求弹性和需求替代作用而传递到其它长线。这时，如果总量上的紧张程度得不到控制和缓解，短线就会增加，原有短线还未能迅速增加供给，新的替代品便又被强大的需求拉成短线，短线的规模、范围迅速蔓延。还有资源供给全面极度紧张的紧运行。这时，需求全面膨胀，计划和生产发展再也赶不上急剧增加的短线，本身也受到约束。短线迅速蔓延到一切主要资源，正常生产受到影响，建设项目停工待料，而为了维持生产和建设，企业被迫囤积大量短线资源，同时社会的短缺资源被膨胀的需求（消费、建设和简单再生产）撕得支离破碎，以致谁都不能够得到满足而正常运行下去。这时，资源耗尽型的经济震荡便来临了。显然这种“过度”短缺的紧运行，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灾难。客观经济运行虽然不能完全以这样三种程度简单划分，但这三种不同程度的紧运行，我们都曾经体验过。无论经济运行处于何种程度，都具有“资源紧张”的特征。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还没有出现过稳定于“非紧运行”状态的时期。但我们可以选择一种利大于弊的状态而避免最恶劣的灾难式的状态。

从经济发展方式上看，紧运行是一种“短线主导型”的经济运行。在这种方式下，经济发展总是受到最短链资源的制约。是整个经济发展平衡、稳定的中心。短线成为一种调节阀，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对短线生产的投入增加，短线的供给增长，会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而短线的增长停滞以至范围的蔓延，会使整个经济发展缓慢和停滞，短线成为整个经济调节的基本杠杆。而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制约整个经济发展的是需求。只有需求的增长，才使充满长线的过剩状态略有松动，才使整个经济有所发展。而同时，更多的长线迅速出现和蔓延，造成新水平过剩的长线主导状态，这样，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是“长线主导型”经济，一切矛盾都集中在长线上。

在过剩市场中，生产要素供给充裕，能够在市场价格和市场摩擦引导下，较顺利流动。生产要素在流动中实现配置。在紧运行中，短缺使社会生产要素相对稳定的分配格局如同过剩条件下生产厂家有相对稳定的需求客户一样；使生产企业获得稳定资源渠道，建立与供给厂家的伙伴关系，使企业能有更长远的打算。相对稳定的生产要素分配格局能够减少要素流动中的摩擦损失，供求的结构构成更为清晰。目前迅速发展企业跨区域间的横向经济联合很多属于这一类。但是，这种要素配置方式无形中强化了要素分配结构，导致现有产业结构的硬化。短缺越严重，要素分配的结构化倾向越明显，流动越困难。

形成紧运行不是由于供给增长过慢，而是由于需求增长过快。在这种运行中，任何供给的增长都同时创造着比供给增长量更大的需求。需求成为最活跃、最具有主动性的增长因素。需求总规模的增长拉动了供给总规模的增长，成为巨大的经济发展动力，需求的结构变化也强有力地拉动着供给结构的变化，造成短线的不断再生。经济的发展在供给短线的不断被缓和，

又不断再生中实现。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我们经常看到的则是相反的形式。在那里，最活跃、最具有主动性的因素是资本过剩的供给在时刻捕捉着由需求的总量和结构变化而产生的新的获取最大利润的机会。

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需求的产生往往并不取决于供给，供给始终只是需求增长和实现的约束和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如何依赖需求增长，这一微观的本质性生产动力促进生产发展，同时又能够有效地把握住亿万种分散的，又是巨大的需求，使之与供给相适应便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呈现紧运行的特征取决于很多原因，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原因也有所不同，其中有主观原因，如：决策失误，方针、政策上的失误；也有社会主义初创和探索过程中，体制上不可避免的不成熟、不完善的原因；也有由于没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水平的提高而及时地相应改革体制的原因；也有宏观经济管理的摸索、尝试中难免的“代价”；还有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影响，和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处于发展中阶段，必须努力赶超、尽快实现经济技术现代化和领先地位的历史要求等原因。透过所有这些原因，我们可以看到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样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所带来的产生需求膨胀倾向（膨胀在这里仅作为一种描述）的必然性是一种更基本的原因。

公有制的建立废除了几千年私有制形成的对社会财富分配使用的所有制约束，社会利益主体在社会财富分配和使用上的对立和对抗亦随之消失，经济发展目标和利益主体之间的对抗消失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私有制障碍被彻底拆除。公有制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是使经济运行转变为紧运行的关键。

在公有制条件下，各社会利益主体不再以自己对财富拥有的有限所有权(象私有制那样)来参与社会资源的分配，参与生产和消费，而是以自己社会利益主体的平等地位，以自己所负有的社会责任(发展生产，加紧建设，改善生活，实现现代化的责任)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来参与分配，换句话说，这近似一种无限的所有权。于是，社会成员参与社会分配的权利超越了实际的在现实基础上的所有权和各自贡献的限制。任何企业为上新项目要求更多的投资都是合理的，任何地方要求早日脱贫致富，振兴赶超而要求得到更多的资源也都是合理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攀比(投资攀比、生产条件攀比、工资福利攀比等等)也是合理的。因此，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利益主体的分配权力突破了物质的约束，这不仅成为生产与消费直接联系，产品得到充分分配和使用的保证，而且也是形成需求膨胀的主要原因。分配要求由高尚而又宏伟的目标产生，而一旦分配要求实现，目标的膨胀就变成需求的膨胀。需求膨胀被释放出来，整个经济便在不断迅速增长的需求牵引下运转起来。

紧运行的另一种理论描述，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资源以满足已经日益增长了的社会需要。也就是说，是一种需求超前增长(需求拉动，需求膨胀)并且受到资源约束的经济运行。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矛盾是日益膨胀的社会需求与有限资源约束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经济正是依靠这种紧运行而达到了资源的最大限度的利用和平衡。可以有实现不了的需求，但不能有没被分配和利用的资源，是这种运行的原则。尽管还存在着微观上的浪费，但至少从宏观经济管理角度看，是这样的。这种保证资源得到最大利用的资源平衡方式与以资本取得最大利益为原则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各社会主义国家都具有紧运行的特征，这不是社会主义对经济运

行状态和资源平衡方式的共同选择，即政策层次原因的结果，而是由于公有制，这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所决定的。公有制可以在任何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中建立，但落后的社会释放的需求膨胀的盲目性更大，更超出经济的实际负担能力，公有制形式的变化，不同一经济发展水平上调整、完善，可以改善紧运行的强度，缓和短缺，但没能完全消除紧运行状态。公有制的最终完善，显然依赖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化的高度发展。这样，社会主义经济的紧运行状态便成为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相区别的鲜明特征。有时候，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也出现相对“短缺”及由此而来的通货膨胀。这种需求增长是偏离它稳定状态的暂时现象。这是政府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长期趋势中，采取创造和刺激社会需求的政策及对企业投资需求的振兴政策的短期效应和现象。而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任何需求都是无须刺激的，它自然生长，到处蔓延，无处不在。社会主义经济稳定的紧运行状态，确是由于各种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决定而存在的，它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结果。

紧运行状态是经济运行的一种方式。紧运行状态一方面表现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极大的解放作用。在紧运行状态中，社会生产的原动力——社会需求得到了自然的充分体现。但同时另一方面，需求增长会超出资源约束的可能性也转变为现实性，在这一点上，合理性转化为不合理。这就表现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仍然不存在自然的平衡，即可以简单地按主观愿望实现的平衡，失衡，甚至经济震荡也能发生。这是一种年轻的、不成熟的处于发展初期阶段的，又是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经济。

紧运行是商品生产的一种全新的年青的形态和阶段，它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而诞生，与资本主义的“过剩”经济

状态相比,晚了 300 多年。因此,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研究还刚刚开始。

## 二

紧运行作为商品生产的形态之一,具有鲜明的特点。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供给(资本)成为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并且日益受到需求不足的挤压相反,在紧运行中,需求成为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是需求拉动供给高速增长。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它的特点和特征,而又误把“过剩”状态的特点和特征作为商品生产一般,这也许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紧运行对商品生产有较大的特殊影响。在紧运行下,市场呈现短缺状态,这和天文现象一样,过强的需求形成了“需求黑洞”,使企业处在“需求黑洞”引力中,这是一种强大的需求引力场,产品一旦进入流通就迅速地被巨大的需求引力所吸纳,很少有提高产品质量和改进性能、更新品种和款式的反馈信息。这样就造成企业数量增长的积极性很高,数量发展的环境良好。大量产品长期适销,生产以适销产品的数量增长方式增长,系列化、多样化的进程很慢。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内部技术进步,产品更新、质量提高的意识较弱,而扩大规模、增加产量的意识很强,新增投资往往是重复的数量增长式投入。“需求黑洞”的存在是企业经营各种风险的最可靠担保。依靠“需求黑洞”企业敢于为投资冒各种风险。几乎是无止境的过强市场需求刺激了企业的同样几乎是无止境的投资欲望,投资饥渴普遍存在。一切投入都可以从“需求黑洞”中得到报偿,使这种饥渴不断地再生。而这种长期的受到“需求”吸纳的扩大规模的投资造成了投资决策的盲目乐观。由于市场需求压力过大,为满足市场,企业的产

品产量指标,尤其是短线产品的产量指标得到强化,成为企业第一位的目标,效益指标被弱化了。这时,生产企业对市场供给的责任也日益单一化、物化、固化;任一企业,尤其是资源性生产企业的产品更换和产量变化,都会影响到其它企业甚至整个生产秩序,企业的产品和在企业中的社会分工被这种紧张的供给关系硬化了。由于资源短缺,企业不得不将生产经营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取得资源上。企业十分注意资源供给的信息,根据资源供给情况安排生产计划。

由于整个经济运行处于紧运行状态中,整个经济结构也都被紧运行“异化”了。紧运行下的经济结构化,使有限资源只能在已形成的既定结构中流动和分配,而在不同结构部分之间的结合部,边缘部分形成大片结构和资源的空白,紧运行造成资源只能在既定结构中勉强平衡,使资源只能维持、服从现有结构,是紧运行下高度结构化的主要特点和内容。而结构的变化,往往来自于外部的干预。正是这种结构化,使有限的资源得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已有生产秩序,使整个经济按着已有结构较快发展,同时,也为经济结构调整带来了困难,社会上没有有力地促使各产业之间相互联系,推动科技进步和结构及时调整的“多余”资源,甚至大部分增量都被填入到为满足需求膨胀的现有产业结构中去。任何企业想要改变自己的工艺、更新产品或者使自己转到另一产业上,首先遇到的困难是难以在流通中找到足够的资源。紧运行仿佛是一个将整个物质空间已经撑得满满的结构经济,任何产业的调动和置换都极为困难。社会经济发展中,随着科技进步和需求质量内容的变化,社会经济的各个产业部门,各企业在产品、规模、工艺、设备和组织上都应不断地进行相应的变化和调整,以适应科技进步和需求变化。但在紧运行状态中,由于各种资源“绷”得很紧,总量调整极为困难,调整只

好以增量的步伐缓慢完成。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能摸索出一套及时有效地进行总量调整的社会化方法。除了资源紧张的原因之外，在紧运行下，产品市场需求过大，长期适销，也是结构调整困难的原因之一。在紧运行下，资源供给紧张，商品交换以期货为主，且供货期长，供应量和供货期不稳定，导致企业的囤积倾向。资源供给越紧张，供应量和供货期越不稳定，企业的囤积倾向越严重。而企业的囤积倾向又反过来加剧了供给的紧张程度。往往资源分配不得不依靠行政调度来保证既定结构中的骨干企业和支柱产业，结构便被进一步硬化，结构调整更加困难。紧运行下这种结构化特征是科技进步慢。产品质量差，企业效益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紧运行也是一种市场，是公有制下的市场。当然，这种市场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市场”，而是卖方市场。在这种市场中，许多资本主义经济过剩市场中的市场机制都发生了变形。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企业仍然是为交换而生产的，或者说，企业的经济成果(效益)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实现。不过在需求引力下，企业为交换生产的观念重心，由售出转到生产要素和原料的购入。这种交换既不是为使用价值的简单实物交换，又不是为最大利润的一般交换，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以满足需求增长的交换。就交换双方的市场而言，是在“需求黑洞”引力场“普照的光”之下的交换。交换的双方都有各自明确的经济利益，但这不够，在这两者之上双方还在充分利用资源以满足社会需求的原则下进行交换，并通过交换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实现着社会的利益。可见，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交换关系已经超越了自然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而有了自己主导方面的新内容。在双轨制下，存在着两种交换，即计划指导下的交换和按照利润原则的交换。

显然，在现实中，前一种交换集中在短线资源上，后一种交换中的长线产品多些，而且往往不少长线产品是直接依赖短线资源供给的。资本主义的资本增殖再生产是通过有限需求市场这个“瓶颈”中的竞争、挤压而实现的，在竞争和挤压中，交换的价格趋近于商品价值。而紧运行下的社会再生产是通过“需求黑洞”引力场的吸纳、加速而实现的，因此交换的价格被需求推动，往往大大偏离商品的价值。交换中卖方很容易通过价格和价格以外的方法获得超额利润，这些收益迅速被原有产业结构和消费所吸纳，而难以形成结构调整的机制和能力。

紧运行同资本主义市场相比，交换手段有不同的表现。资本主义市场中，价值是由统一的尺度表现的，而且有集中化、抽象化的趋势，从稀缺物品到贵金属，又发展到纸币、票据、有价证券、信用卡等信用货币，现在甚至抽象为计算机信号。而在紧运行中，却出现了相反的倾向。最基础同时又最短缺的生产资源有了一般等价物的功能，出现了物资串换，有一般等价物功能向短线资源集中的分散化和具体化的现象。谁更多地掌握短线资源，谁就能交换到其它生产资源，就能掌握经济运行，如同掌握货币一样。短线资源与货币在交换过程中形成一对互相依存、在流通中互补的共同起作用的对立而又是统一体的“偶极子”，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相比，货币不再是完整意义上的一般等价物，它需要短线的补充。于是囤积短线资源的倾向产生了。货币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灵活调动资源的功能大大减弱了。

紧运行下有特殊的价格形成。资本主义市场有过剩供给和有限需求约束，这种约束是价格制约的自发机制，生产价格反映了过剩的供给和有限需求的共同作用，这样平均利润率就发挥作用，使价格趋向于价值，这反映了以利润为原则的所有权互相完全独立的、私有企业的利益。社会主义的价格却从一开始就

陷于需求膨胀的矛盾，就反映资源不足、短缺，为需求膨胀所左右。无论是稳定价格还是价格上浮，都是围绕短线进行的，都只不过是隐蔽的或公开的需求膨胀的标志，而且更多的是反映紧运行下资源分配特殊方式的需求，很难反映企业的利益，对企业来说，价值反映投入的诸要素，因此，最终反映了有限的社会资源，而价格是完全反映需求的。在需求膨胀的总环境下，除非控制价格，否则价格将大大偏离价值，成为需求膨胀的指示器，不再有一种自动趋近价值的机制，平均利润率的调节作用很难形成。所以在现实中，价格不论是控制还是放开，总是大大偏离价值。价格的这种状态可以称之为“价格陷阱”，即在经济运行中，由于较严重的供不应求倾向的长期存在，价格在抑制需求、刺激供给方面的调节作用常常远远小于由它的波动给社会生产带来严重影响。价格问题所处的这种矛盾状态，实际反映了需求膨胀的整体矛盾。价格的调节功能不得不受到整个经济运行特征约束。实际上，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供给的增加和需求的抑制都很难由价格调节独立地完成。各种短线资源形成了巨大的短线网络，吸纳、分散以致切割了价格信号作为供求关系信号的传导机能，一部分功能转移到短线资源上，这就抑制了价格的调节作用。运行中很难有“有余资源”迅速响应价格信号，集中于增加供给。因此，在紧运行中，价格对供需关系、资源分配、产业结构调节的作用被短线网络极大地分割、削弱了。越是在短线被有效地消除或减少短线制约的生产领域特别是加工工业，价格的调节作用就越是明显，相反，越是对于基础资源、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部门短线网络的分割和衰减作用极为显著，价格信号的传导线路越长，信号传递越慢，信号误差越大，价格的调节作用也就越弱。

在紧运行中，也存在竞争和淘汰机制，但是这种竞争和淘汰

机制是与过剩市场下的竞争和淘汰机制很不相同的。在紧运行中，长线产品的企业经营不好，有可能被市场淘汰、破产，可以被“关、停、并、转”，短线产品的企业即使经营不好，产品未能更新，成本较高，仍然不会破产、淘汰，甚至还可以得到较快的发展。竞争在“过剩”市场中，集中于产品销售，集中在从商品资本到货币资本的“惊险一跃”。在那里，竞争意味着以高质、优价、新功能的产品在有限市场中多占份额，市场份额关系着企业的生死存亡。但在紧运行的市场上，由于市场过大，几乎任何企业都很容易找到一种产品，不怎么费劲就可以在市場上得到企业生产能力所能达到的最大订单。竞争只意味着赢利多少，而不会危及企业的生死存亡。巨大需求市场上的有限份额，不仅没有形成企业竞争的压力和投资风险，反而形成了企业扩张的要求。在紧运行中，对企业发展最有约束力的因素是资源，是第一次投资。一旦从可投入增量中得到投资，企业就会很容易占有市场，象滚雪球一样发展起来。因此，紧运行条件下，竞争首先集中在增量资源分配市场上，企业争夺的不是需求市场而是有限资源供给。于是，竞争的焦点便集中于建设计划和贷款计划。企业处在平等地位一齐扩张需求，使大量需求变成“空中楼阁”。当无限需求从空中落到人间，就变成现实的权力竞争。企业在列入计划(立项)过程中的竞争是最为激烈的，要过几十个“关卡”，费尽百般周折，这个过程始终是企业整个经营活动中最为惊心动魄的过程，大量的企业(项目)在这个过程中被淘汰。

其次，企业竞争的焦点在于存量资源分配。企业生产正常进行，生产计划顺利完成的主要风险在于原材料的正常供给。企业只要能够获得供给稳定、按期、规格对路的原材料，完成各项经济指标都是不困难的。这种竞争集中于负有物资分配职能的部门和原材料生产厂家，这是买方之间的竞争。能够较多地

得到充分的平价生产要素和对整个经济有重要影响的企业（如部分材料、基础产业）和能够更多地以其他条件（价格及价格以外的）满足卖方企业要求的买方在这种竞争中就有优势。在资源较为紧张的时期，大批的企业在这种购买资源的竞争中失利，被迫停工待料，甚至“关、停、并、转”，被淘汰。这种竞争和淘汰机制是经济运行从资源分配出发，根据资源状况调整产业结构的机制，它与“过剩”市场中，从市场分配出发，以平均利润率为原则调整产业结构的机制是完全不同的。在紧运行中，同资源分配受行政结构分割和影响一样，这种企业的竞争和淘汰机制，往往也是受到行政结构的分割和影响。在这种分割的影响下，相对不足的资源难于集中，而分散的资源配置又加剧了资源配置过程中的短缺和竞争。总起来讲，在紧运行中竞争和淘汰机制由于长线产品和短线产品各自具有显著不同的市场环境而分成两种不同的方式。对于短线产品的生产企业竞争和淘汰机制，主要作用和表现是争取投资，获取资源，加速扩大生产能力，表现为扩大再生产方面的竞争。对于长线产品的生产企业，竞争和淘汰机制则主要表现为销售市场竞争，是简单再生产方面的竞争。但是，长线产品的生产企业的身旁总是存在着巨大的短线产品的市场空白，长线产品市场又不断地受到需求增长的直接压力和由短线市场转移过来的需求压力，使得市场竞争不时地得以松弛。长线产品的生产又往往是短线生产能力聚焦的结果。这种聚焦现在往往是由于企业利润导致的。因此，这种销售市场上长线产品之间的竞争往往是对于短线资源竞争的延伸。长线产品间竞争的持续和发展取决于短线资源或短线产品聚焦的持续。换句话说，这种长线产品的简单再生产之间的竞争，总能转移或转化为短线产品之间扩大再生产之间的竞争，成为推动短线产品的扩大再生产增长的动力。一旦长线产品对于

资源的吸纳能力衰减,短线资源的焦点移向新的产品,长线产品生产企业在销售市场上的竞争就急剧转变为在资源市场上的竞争。因此,紧运行中,竞争机制作用集中地表现在资源分配市场上,企业在销售市场上的竞争是以资源竞争为前提的,并随之而转移的。

紧运行下的投资机制也有很大不同,资本主义过剩市场条件下,企业从社会上筹集投资并不困难,为实现投资所需要的资源也不成问题。在那里,困难在于获得能够得到较大利润的投资机会。投资取决于企业在有限市场中能否保持并提高地位,保持和争夺更大的市场份额,从而获得可能的最大利润,全部困难在于投资之后走过有限需求不足的市场这座“独木桥”。对投资的主要约束是市场需求,一旦需求增长,市场扩大,投资高涨也就随之而来,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家通过增加财政支出以创造需求,或调整税率和再贴现率以形成更多的较大利润投资机会,都是为了刺激投资,并希图以投资形成的需求刺激新的投资。在紧运行下,企业投资的困难不是在“黑洞市场”中争取到多少份额。巨大需求市场的存在为企业创造了几乎是无限的良好投资机会,这是根本无须刺激的。企业最为困难的,是如何获得投资和如何获得保证实现投资的资源。任何企业都能够获得良好的投资机会,因而任何企业获得资金(无论是企业留利或是其它途径得到的资金)的最大兴趣是直接投入于扩大再生产,而不是用于融资。始终存在着无法满足的企业投资要求。因此,对投资行为的束缚转变为另一种约束,这就是按投资项目缓和紧运行状态的作用,获得资金的可能性和完成投资的资源保证的约束。投资机制完全倒过来了。经济运行越紧张,需求膨胀越快,完成投资的困难也越大,建设周期也越长。对企业来说,最困难的是获得初始投入,一旦有了投资,后面的一切都是“阳关大

道”，市场是不成问题的。

在紧运行中，金融机制的特征也发生了变化。在资本主义过剩市场中，货币资本过剩是市场过剩状态的集中反映，资本输出是货币资本摆脱过剩的困境的表现。资本主义的金融以灵活的融资方式，迅速满足各种投资需求，从而激励了投资活动。在紧运行中，资金短缺是资源短缺的典型反映。一切膨胀的对资源的需求都首先表现为对资金的需求，金融承受着投资需求的巨大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信用膨胀随时可能产生。而一旦形成信用膨胀金融便成为需求膨胀、加剧资源短缺的工具。过剩市场中，信用担保是对企业运用资金获得利润风险的约束。信用担保约束了企业的投资需求，反映了金融对企业运用资金走过“市场需求独木桥”的能力要求。在紧运行中，市场黑洞的存在胜于其它各种信用担保，是最大的担保，能够消除一切风险。在过剩市场中，利率是调整资金资源和实物资源的有力杠杆，也是刺激或抑制社会需求和企业投资需求的有力杠杆。在紧运行中，存在着普遍的投资饥渴，利率的调节作用是很有限制的。争取资金是企业获得资源，从而实现经营和发展目标的先决条件。只要资源短缺，需求继续膨胀，企业为获得资源、甚至为囤积资源便不惜成本争取资金，对利率的变化并不敏感。为缓和短缺，增加供给，企业高利率取得资金从而导致的收益减少，往往可以从其它途径，如：税前还贷，财政贴欠、拖长还贷期、减免税收等等来求得解脱。在过剩市场中，金融的结构化是产业结构化的集中表现。金融在调整资源配置、调整产业利润率进而调整经济结构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在紧运行中，是金融的结构化依附于资源配置的结构和现存产业结构。是资源配置结构的变化调整金融的结构。不是金融调动资源，而是资源调动金融。短线—金融的二极、双重金融结构。在紧运行中，金融与资源有特

殊的关系，要求货币和短线资源共同成为卖方市场上交换的媒介。两者是调控手段的两个极端。在一端，当买方掌握有一种或几种短线资源时，就可以买到同样平价（优惠价）的其他短线资源；在另一端，当买方能够付出足够的货币时，也可以获得所希望的资源。而更多的，是在其中存在着各种资源——货币组合方式的交换。目前，大量的横向联合都是以获得优惠价资源为目的，资金融通、投资在大跨度的地域空间上调动的情况，是这种资源调动资金的现实表现。紧运行下的这种交换不是原始的物交换，而是由于极端短缺的资源具有一般等价物的特征，使得交换过程更为复杂，交换媒介是有了双重结构特征的缘故。

尽管在紧运行中，金融机制的内容和作用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它仍然在调控经济运行的总量关系和结构关系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相比较，金融机制的这种作用和金融业的这种责任更为复杂，更为重大。金融是调节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紧张程度的第一杠杆。充分认识金融的这种宏观经济责任，充分发挥它的作用，是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

资本主义财政的主要经济作用是进行调控，克服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需求不足的自发倾向。它可以采取完全逆向的调节方式，通过扩大财政支出，甚至赤字财政支出创造需求。社会主义的财政则始终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同时也是经济运行的调控中心。社会主义财政的双重职能使它的经济意义大大提高了。各种财政都负有充分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需求的任务，负有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同时，财政措施又是抑制由于非预算原因日益增长的需求的有效手段。这种双重作用表明社会主义财政在经济运行中不能完全发挥逆向的调节作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财政的建设作用相应地减轻，更多的建设功能轻移给了企业；同时，财政的逆向调节作用的责任

加强了。但是,在关系国计民生,奠定现代化基础的重大基础性行业的项目中,财政仍然保存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社会主义财政能采取最简洁的方式,迅速地集中短缺的资源,用于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长远的、重大的、基础性作用的方向上。单纯依靠平均利润率的指导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越低,就越缺乏经济运行中自发的经济机制来接受和传递宏观经济调控的信号,财政的这种建设作用也就越重要。

但是来自各行各业要求改善现状和来自千家万户要求“脱贫致富”、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往往将财政挤压得不断减少建设功能,趋近于“吃饭财政”。在紧运行中,财政的这种双重作用是经济运行中的主要调控杠杆之一。这种双重作用,即控制需求、逆向调节的作用和集中资源、重点建设的作用,应该是整个经济发展的两个有力的轮子,一方面通过预算控制需求和消费,保证经济总量平衡,另一方面,落实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优化产业结构,保证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先导产业领先发展,保证经济结构合理。但是,如果运用不当,财政会起着完全相反的作用,推动和加速需求膨胀,将大量的观念需求变化为货币需求。我国经济发展中几次大的需求膨胀都与财政这种“功能失调”有关。

紧运行下的效率问题是为人们所关心的。但人们往往孤立地把效率问题完全归结于管理的微观层次的原因,而忽视基本的宏观前提和环境。紧运行下不断再生的资源短线导致了企业越来越强的囤积倾向和生产投入的强制替代。短缺大大增强了生产过程中的不可预见的干扰,使生产节奏和工艺的一致性被打乱,如停电、待料等。而生产过程一个环节的混乱会蔓延到整个生产过程,甚至整个行业、地区,如推迟交货,这样就从根本上破坏了效率和质量保证的前提条件。短线越多、越严重,混乱的

程度也越强,蔓延的速度就越快,低效和低质量就越严重。在这种环境下,企业倾向于搞万事不求人的大而全、小而全以及降低管理和产品质量水平。高水平的管理无从建立,就生长出一大片混乱的、小生产式的水平低下的管理方式及小而全的企业结构,落后的管理和企业结构又强化了低效和低质量的程度。当然,主观的努力可以改善管理水平,提高效率,但短线制约越严重,紧运行下的效率问题这个薄弱点也就越突出。

紧运行下,科技进步除了在扩大再生产的领域中集中于产业结构的前沿外,在简单再生产中就集中在资源节约和资源替代上,集中于在不稳定的资源供给环境里,努力保证生产比较稳定的运行上。当社会需求提前质变时,改进产品品种和功能,提高产品质量的任务也严峻地向企业提出。但在紧运行下,企业如果不能在科技进步上有效地解决前类问题,在需求压力下,后类问题往往是无力解决的。企业任何改进产品的决策遇到的首要障碍,要改变社会对企业的资源分配格局,得到新产品研制和生产所必须的资源。

在紧运行中,存在着一种自发的经济机制,也是最基本的经济机制,即需求膨胀倾向,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经济运行中的反映。而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上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差别,特别表现在对它的约束程度上。由于它的存在决定了上述各种经济机制的特征和作用,决定了紧运行的全部面貌。而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发机制,形成有限市场和需求不足,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的反映,而紧运行和资本主义的“过剩”运行都针对自己的基本矛盾采取行政措施来干预经济、调节经济,以保持稳定发展。在资本主义,行政办法主要用于扩大需求,如:增加财政支出以增加社会需求的财政办法,降低中央银行再贴现率以刺激企业需求的金融办法,扩大和保护出口和资本输出以

扩大市场的贸易政策等等。在紧运行条件下，行政办法主要用约束需求，指导资源分配，使用限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如：控制投资规模、控制消费基金增长，优先保证重点工程的办法等等。两种经济制度都要“行政干预”，但对象、内容和形式截然相反。资本主义干预市场分配，社会主义干预资源分配。

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需求膨胀倾向这种自发的基本机制的存在，证明宏观经济管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稳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和完善，我们终究能在经济运行中建设更为科学、完善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有效地抑制需求膨胀倾向的发展，使社会经济处于有效率的紧平衡状态。

### 三

以上分析不过是对紧运行主要特征的初步描述。这种描述不是对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简单排比，而是对两种经济运行的现实比较的结果。紧运行状态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存在，我们首先应该全面地、正确地认识它、分析它，把握它的特征和变化规律，对它的评价应是在此之后的事情。

紧运行状态尽管还很不完善，还有很多缺陷，需要通过不断地建设和改革来改进它、完善它，但是，在它几十年的生命中，已经显示出了公有制优越性，尽管这种优越性还是粗糙的、原始的、和弊病生长在一起的。紧运行首次解决了需求不足，为生产发展提供了宽广的前景。它在宏观上实现了资源的最大利用，避免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由于“生产过剩”而产生的经济波动和经济发展约束，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制度建设应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

紧运行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条件。紧运行特征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矛盾，提出了宏观经济管理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社会主义经济紧运行特征应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依据之一，对紧运行状态的理论研究的改革政策的理论基础之一。应该在认清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矛盾和运行特征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深化改革。

从紧运行的特征出发，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考虑资源短缺这样一种客观条件。改革只能在紧运行下进行，并且通过改革缓解紧运行，把握紧运行的方向。不考虑紧运行这样的基础条件，或企业通过改革完全消除紧运行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紧运行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状态，用紧运行这样一种尺度来判断经济发展状态，是重要的宏观经济依据。改革必须保证和促进经济发展处于最有效益的适度的紧运行状态，而只有经济发展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改革才是有利的，才能够成功。改革需要宽松的环境，改革也要能创造出宽松的环境。

对紧运行状态的分析表明，“过剩”状态只是商品经济的一种状态。商品经济还有另一种状态，即紧运行状态。人们往往把商品经济等同于“过剩”经济运行，认为一旦使产品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指令性调节就转变为市场调节，物资充裕、品种繁多、价格低廉、服务周到的买方市场状态就会出现。显然，这种认识没能把握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近几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在越来越大的比例上，由市场进行调节，越来越多的自然经济产品变成了商品，流通空前活跃。然而，人们期待的过剩状态并没有出现，许多放开的重要商品，都仍然是短线，如，肉、蛋、菜、水产等等。换句话说，通过改革形成的是紧运行的实物形态向商品经济状态的过渡而不是过剩的商品经济状态。企图通过改革，使过剩的市场

经济的经济机制在紧运行中再现,并且发挥宏观经济调控的主导作用的想法,只是一种“市场乌托邦”。

从紧运行的特征出发,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首先解决有效地抑制需求膨胀,自觉运用资源约束,缓解经济运行中资源紧张程度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还必须解决紧运行下,如果实现产业结构灵活有效调整的问题,使新兴产业得到较快发展,使基础设施、原材料生产部门有合理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在搞活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同时,必须建立起能使生产力有效地合理集中,使有限资源有效集中,避免重复建设,保持规模经济效益,使骨干行业和骨干项目能够较快建设发展的方式。

紧运行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特殊环境,这种环境比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环境具有明显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源源不断的强大需求,和由此促发起来的生产力高度开动、资源尽用的状态,是令它们羡慕不已的。当然,紧运行这种经济建设环境又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历史性任务,就是通过改革,使这种经济运行方式能够自觉地克服需求膨胀的自发性,具有保持总量协调、结构调整及时,有力地促进科技进步和企业间、行业间融合的机制,具有保持旺盛的生产发展动力和高工作效率的机制。

#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 运行若干问题的思考<sup>①</sup>

## 一、紧运行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

1. **要接清楚社会主义需求的再生产过程** 社会主义需求的再生产过程是经济运行机制研究的理论重点和难点。既然造成紧运行状态的主要原因是需求增长大于供给增长，那末，就首先要搞清楚需求的再生产过程。科尔内是分别从企业行为、消费者行为、预算约束软化的角度进行分析，回答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短缺是怎样不断再生的问题。仅有这些是不够的。作为理论难点，我们要研究和解释的是：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个再生产过程循环下来，需求总是小于供给；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个再生产过程循环下来，需求总是变得更增强了。如果只是象科尔内说的那样，从微观到宏观，从企业行为导致企业之间的交换行为，又导致宏观行为和消费行为这样一个分析过程，看来不太困难。我们要做的是对从运行层次到基础结构这样一种循环的分析研究，是从“表皮”到“肌肉”、到“骨骼”、再到最基本的结构，看它每个“细胞”是如何进行再生产的。

凯恩斯分析了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投资效益递减和灵活偏

---

① 这是陈元同志(1987年)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研究》课题组其它同志的谈话。

好,他的目的是给出这样一个循环过程,即每次循环下来需求都有所减少。凯恩斯的需求再生产是讲资本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我们则是要从需求再生产中讲清怎样产生短缺,搞清楚为什么每个循环下来,需求都有所膨胀。当然,说清楚这个过程,不等于发现了一个原理,而只是一种描述。我们要做的是从逻辑上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需求再生产串起来,讲清这个过程。对需求再生产的分析,可能是个核心的问题。

2. 供给增长与需求增长表现出明显不对称 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总量需求始终大于总量供给,是紧运行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传统体制下的消费品生产中,计划目标往往跟不上需求的变化。现在多数企业已经不按计划生产了,而是按市场信号进行生产。但供给仍然明显不于需求的增长,多数企业仍处在恶性循环中。例如钢材,从前年到今年三年中钢材的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其它行业的增长幅度,市场信号对它非常明显。钢材的价格最高已涨到 2000 多元一吨,市场信号非常强,足以刺激企业拼命增产。但是钢材的投入是有限的,受整个短缺资源的约束,因而仍没有赶上需求的可能。供给增长一分,刺激需求增长十分。武钢投产了一米七轧机,全国各地都认为我国的冷轧薄板供应从此解决了。于是各地都上汽车工业、上家用电器,一下子使薄板变成短线中的最短线,结果是现在进口用汇最大的就是薄板。另一个例子是北京的交通。修了二环路之后,引起了全市围绕二环路搞基本建设的不可遏制的需求。大家把基建点都布满了,马上就出现了电、水、气、暖的短缺问题。一项供给缓和往往带来若干项需求的增长,这些需求的分布领域又是多种多样的,其增长不但使这一项供给没有得到平衡,反而使供需之间的差距更加严重了,这种需求激活效应是到处可见、非常明显的。

1979年之后,改革的目标是搞活经济,最先活跃起来的是投资机制,其次是向消费机制扩展,这带来了生产和供给的增加。但是供给的增加远远赶不上被激活的需求的增加,这是“搞活”以后的一个扩展。另外一个扩展是中央采取了扩大地方自主权的方针。地方被激活了,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增长和消费增长的要求。以国家为主体的投资机制扩展到地方,再扩展到企业,这是一个垂直传导的扩展过程。激活以后,现在搞活经济的主体、需求增长的主体和经济增长的主体主要地都在地方政府一级,企业一级受到地方政府一定程度的约束。谁都不愿花钱去干的事情都留给中央政府了。所以,中央只有紧紧抓住京、津、沪三大市,抓住六大公司保证中央财政的来源。即使这样,中央财政收入也已下降得很低了,仍然扭转不了需求增长超过供给增长的局面。同时,资源约束作用在结构上多层化了,在覆盖面上也广泛化了。

3. 需求膨胀造成市场不透明 凡是在搞投资时,投资的可行性报告都认为投资完全能够收回,可实际上大部分企业的投资都收不回。无论如何集资,它都是以巨大的市场作为抵押的,认为建厂后肯定能在这个市场中得到全部的补偿。但由于各方面的需求都在膨胀,就好象肥皂泡擦肥皂泡一样,市场就变得不透明了。企业在市场不透明时,看不到真实情况,它的还款能力是建筑在别人需求膨胀的基础上的。企业每次要求贷款时都说得头头是道,而银行也确实无法在这个不透明的市场上弄清事实。购物单位一旦发现买进的产品可能销不出去时就会毫不犹豫地退货,这样社会资源约束就会使经济增长出现停滞。能还贷款的,是生产那些市场透明度很好的产品、最基础的产品企业,如化纤、冷轧薄板等,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有绝对把握收回投资。这就是全国烟草、石化、有色金属、船舶、汽车等六大公司

上缴利税占总财政 65% 的原因。

除需求膨胀造成市场不透明外,还有短缺制约一切生产环节,造成需求拉不动供给这一原因。企业即使有了资金,也不一定得到物资,得到资源的投入,所以不仅是需求信号强弱的问题。市场的不透明度最终的约束是资源约束。但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我们还没有找出来。具体讲如何从全社会资源约束的最短线、通过资源约束的连锁作用,制约全社会各行业的合理限度,这点在实践中和理论上都还没有找出来。

4. **需求膨胀以致形成紧运行的过程**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现实的经济运行中抽象出需求膨胀并形成紧运行的过程。在起始阶段,出现了需求增长,短线增多,供给缺口扩大的趋势,这些缺口便成为诱导投资的动因。这时,潜在需求或由于增长要求和发展目标,或由于缺口的扩大及市场吸引,或由于地区、企业以及个人之间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方面的攀比、竞赛,而不断增加,并且开始转化为非货币需求,即实物形态的目标。如短线产品的数量及大型项目,人均消费实物量等等。源源不断的、巨大的潜在需求转化为非货币需求,便形成了经济高涨;经济高涨的热烈发展气氛反过来又加速生产着潜在需求,加速着潜在需求向非货币需求的转化。在这个时期,基本物资条件还能够保证满足实际投资的需要,尤其是低价的短线产品的供给仍能够维持,使得人们产生出一种类似“货币幻觉”的“投资幻觉”人们都把眼光集中在市场需求增长和经济增长的趋势上,都将建设的可能性建立在实际是勉强维持的短线供应上。对新项目建设和市场需求充满信心的人们便千方百计地立项、投资,以迎接经济发展新高潮的到来。投资扩张迅速蔓延,摊子一片一片地铺下来了。其实这时形成的总需求规模已经偏大了,已经超出了短线资源所能承担的程度。在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国民经济

过热运转的阶段。这时，一方面非货币需求仍然在潜在需求的推动下继续不断产生，投资仍在增加。另一方面，前期非货币需求开始不断地、越来越大地转化为有支付能力的货币需求，摊子铺开需要实际投资，需要购买原材料进行建设；招收大量职工后，需要发工资，需要给予规定的福利；大量的产品订单促使企业大量借贷，扩大原材料、再制品的规模、生产周转金大量增加，于是形成了投资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和消费品市场的空前活跃。需求，尤其是货币需求迅速膨胀。部分非货币需求直接推动着经济运行，如：短线物资分配、物资串换、重点项目通过行政方式形成供给聚焦等。更多的非货币需求则转化为货币需求（非货币需求直接实现后，在其第二个循环中仍会转变为货币需求），使整个社会经济象一辆开足马力的车全力追赶已经形成并超前的需求。这种情况在某个时点也许可以实现平衡，但这种状态是不能持久的。非货币需求一旦转化为货币需求，货币需求便会在膨胀系数的作用下，随着每一次供需满足而不断放大。同时，得到满足的货币需求在这个时期又会以比其它时期更快的速度转变成新的非货币需求。一方面是货币需求的满足——非货币需求的产生——货币需求增长的一次次循环和膨胀；另一方面是整个经济不断地改变比例关系，将生产能力聚集到几种最短线产品上，以维持这种不断高涨的经济秩序，整个经济结构不断变形和扭曲。这种“过热”终于有一天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生产无论如何再也跟不上需求增长了，这时候，第三个时期到来了。这个时期就是膨胀后的收缩和调整时期。在这个时期，整个经济结构已经扭曲得连最基本的资源也再不能做最微小的聚焦了。象经过一场搏斗而倒下的勇士，精疲力尽、伤痕累累。经济结构所固有的比例仿佛是物质内原有的应力又突然回来了一样，生产又恢复到原有的结构关系中，过去所有产生供给

的环节顿时都转变成需求，聚焦的弥散，结构扭曲的复原，使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供给与需求之间巨大的差距，全面地展现出来了。但这时，不仅非货币需求已经膨胀得太大了，而且大部分需求都已经货币化了。由于失去短线聚焦的支持，人们这时才冷静地将目光从需求市场转移到资源供给上，非货币需求被迫地回到潜在需求的位置（通过行政控制和压缩），而货币化需求则仍是强大的，因此只好一方面采取非常措施维持这种供需高差的状态并保证经济能够运转，如：定量供给，物资分配，指令性计划；另一方面，只要可能便尽量回收货币，如：议价、涨价；再一方面是将这些需求推迟到下一个循环中去实现，如：刺激存款、发行债券。整个经济就在这种供需高差的紧张情况下缓慢运行，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补偿，只好随着生产积累一点一点完成。当结构的调整和补偿完成之后，当货币化需求或消化或延续之后，经济发展便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循环过程的起点了。

5. 关于需求的合理性 需求最终都是合理的，问题是你站在哪个角度讲“合理”。修地铁和修住宅合不合理？都合理，人均住宅 20 平方米也合理。这当然是指最终需求的合理。资源配置则是指生产结构的合理化。

这些不同的需求，哪种应优先得到实现，最终取决于它们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这才是我们观察合理与否应有的角度。在结构上显得重要的，往往是初级产品和科研开发，而实际上，它们的短缺程度却更强一些。

仅以总量来衡量需求合理不合理，很难说明白。如果这样，就等于在需求增长当中，只要把资源供应引入，需求就是合理的。这恐怕不行。理由很简单，大家都找上级要求投资，都说自己是合理的，都说把别人的改了，把自己的留下，在总量很难说你合理，他不合理。但从结构上就可以说清谁合理。生产钢材

合理，生产电力合理，建设铁路合理，办教育也合理。这些都要放在结构中去衡量，只在总量上是很难说清的。

当然，超分配显然是不合理的。总量不平衡肯定是在结构上有的部门增长得不合理。这几年，年年超分配，包括财政发行国库券，然后又打在财政支出里，显然有不合理需求。但在结构上，不合理的需求没压下来，总量上超出的部分又填了合理需求的空白。国家发行国库券，是为了改善教育，改善基础设施，怎么能说不合理呢？企业都要追求经济效益，都不说自己的投入不合理、是长线，那些没有企业直接经济效益的基础部门怎么办？只好国家投资。国家没那么多钱，只好搞点国库券。钱都垫在这里面了，都给了能源、交通、教育、科研，你能说它不合理吗？没有比它更合理的了！所以很难直接用总量来判断这个超支部分是否用得合理。

加工工业和消费的不合理增长，对能源、交通等造成过强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采用挖东墙补西墙的办法、采用财政赤字的办法建设这些基础设施，最终仍然会陷在一个不合理的增长当中。所以，应当说总量上超分配是不合理的。超支的部分，尽管把它拨到了动力、能源等领域，尽管单量是合理的，但从总量来说，却是不合理的。

由于总量中的最大问题仍是结构问题，我们在考虑对策和出路时，应该把总量和结构结合起来。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开始做到这一点了，他们可以做到把多余的生产能力引向科研开发，这就既解决了总量问题，又解决了结构问题。而我们还没做到这一点。

**6. 资源和结构是经济运行中两个最主要的约束** 总量关系的度量尺度是价值。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公有制经济的总量关系，在价值量上是有表现的，而且是清楚的。我们说总需

求大于总供给，在价值上可以用数字说清楚。

对中国社会主义紧运行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约束需求。在约束需求中，一个是要约束总量，另一个是要控制结构。从价值形式的作用来说，我们可以通过控制货币和金融来约束总量，但很难控制结构。所谓结构不合理，从根本上讲，不是需要不需要，而是可能不可能。需求膨胀是趋于无限的，甚至会超出整个资源和结构的限度。对需求的约束不仅表现为基本生产要素的投入，自然资源本身就是最后不可逾越的约束。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只是就企业来讲的，涉及的是投入要素，而对整个经济运行来说，资源就变成最主要的东西了。对经济总量分析来说，有很多受结构约束。例如现在需要电视机，电视散件就成为资源。所以结构和资源制约是我国经济运行的两个最主要的约束。

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应从中国的特点出发。中国不是在原有较好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的。匈牙利还可以象科尔内说的那样，通过“搜寻、排队、替代”解决问题。而我们连现代化大生产最基础的东西都很薄弱，我们缺的东西不是靠“搜寻、等待”就能得到的。科尔内说的是一种较高水平上的短缺。而我们是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建立现代化的经济结构。这种跨越，导致新的经济结构上出现了大的结构性不平衡。

7. **结构性倾斜具有必然性** 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在运行中是非均衡的。经济结构的倾斜点，在运行中表现为短缺的聚焦，是短缺的最强点。随着经济发展，经济结构的倾斜也随之变化。建国初期，最紧张的是粮食，经济结构中最倾斜的点是在粮食上，棉花也紧，两者有互相替代的关系。1958年以后所以被迫调整，关键问题是由于粮食严重短缺，只好裁减2000万人回农村。现阶段倾斜点开始变了，粮食仍然是基本制约，瓶颈虽没有消失，但改革后已开始缓解。农副产品市场也开始缓解，这

个方面的制约不是那么严重了，最厉害的制约是工业基础设施、钢材等。现在的倾斜推移到了基础工业，将来还会前推。现在钢材薄板的需求上升很快，如果宝钢、首钢、鞍钢都上了薄板轧机，薄板的供求紧张关系可能缓解，这个倾斜点可以消除，但倾斜点会前移到其它方面。苏联、东欧现已转向高技术产业，但由于经济增长缓慢、高技术就不能发展，这是他们的“瓶颈”。倾斜点再往前就会象南斯拉夫，匈牙利，遇到外汇的“瓶颈”。这个“瓶颈”制约着它的开放度，制约着其经济的国际化。如果再克服了这一个“瓶颈”，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时代就会到来了。所以，我们认为在现阶段这个“瓶颈”只会发生变化，但很难消除。当然，可以通过砍需求来实现宽松，但这种强制压缩需求只能是非常时期的做法。设想能够通过体制转换而在一夜之间达到理想彼岸是不可能的。如要做到全面宽松，必须达到最后一个层次，就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站住脚跟，如果我们能有这个条件，就能够将我国经济的需求、结构问题统统嫁接到世界市场上，就不是借外债还得起还不起的问题了，而是在世界经济的格局中占有相当的地位和实力，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世界经济。这一点苏联现在也还做不到。我们这样的大国要走到这一步，恐怕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在这个阶段到来之前，我们认为结构性倾斜必然存在，是不可避免的。

8.“瓶颈乘数”和“瓶颈陷阱” “瓶颈乘数”和“瓶颈陷阱”这两种现象反映了短缺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作用。用投入产出表表示生产社会化的链条，则从左到右表现为产业运行之间的传递效益，一个环节的投资会在一连串的产业当中产生出效益。这是所谓乘数。反过来，由于短线制约，也会传递短缺效应，这就是“瓶颈乘数”。这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最基本的特征，应作为分析的重点。

同时，在宏观流程中应着重分析“瓶颈”的再生产过程。瓶颈的再生产过程正好对应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再生产。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瓶颈”的制约、短线的制约是决定全局的东西。这种状况下，任何一个短线的拉长，对其它需求都有激活的作用，一下子把隐藏的需求变成显现的，使它们一下子都出来了。

9. 关于生产要素滞存问题 生产要素的滞存同短缺有关。短缺下的滞存除了由短线制约引起了长线以外，很重要的是短缺程度越高，对最短缺的资源储存的要求就越高。它是作为一种货币来储存的。在短缺市场上，最短线的资源具有货币的功能，能够串换到所需要的东西。固定资产的流动性差也是这点引起的。在一个需求很强的市场上，尽管目前不开工，也不会有哪家企业买设备。人们在等待市场发生迅速变化以后，使投入重新找到偿还的机会。这是一种短缺下的储存功能，在短缺市场上人们认为手里的东西绝不会贬值，所以也不愿流动。这是经济利益决定的，并且被经济利益派生出的行政性机制加以僵化。企业大了，官就大，行政级别就高，这就和中国传统的东西结合起来了。

## 二、紧运行的动态机理

10. 短线制导是紧运行横断面的出发点 我们知道，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总是存在着一些短线。这些短线既可以是产品，如粮食、石油；也可以是部门，如交通。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中，这些产品或劳务就会涨价，直到供求平衡为止。而在我们这里，有多种原因使得难以单靠涨价来大幅度地抑制对一些最基础的短线的需求。这其中涉及到许多重要的考虑，如基本原材料、设施

及消费品的价格的稳定,企业素质、工业体系的从无到有,等等。

近年来,短线产品与价格运动有了更密切的联系,双轨制的价格对短线起了调节作用,特别是对企业和地方更为明显。但总的来说,这种作用并不对称。货币和价格的需求约束作用虽然大大增加了,但和它作为需求表现的作用相比,在方向和程度上都显得力量不足,难以形成同步增长的有效供给。短线制导仍保持着其隐蔽的、强有力的、核心的支撑作用。

这种明显的不对称性,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劳动力并不是人格化的商品,利益主体带有不可侵犯性和稳固性,这制约了价格的有效性。即便是在微观层次,价格对短线存量的调节也远不够充分。既然短线产品难以依靠涨价来解决,那么求大于供这种压力就会始终存在。

**11. 基础设施和科研开发是最大的短线** 整个产业结构中最大的短线是两头,一头是基础设施(能源、交通)和原材料,一头是科研开发。这两条短线制约着整个经济,这就是我国的现状。能源、交通设施的短缺是现在经济增长的最大制约。还有原材料、粮食的制约,也十分突出。人才的制约使得我们的经济建设缺乏大量的管理人才,缺乏大量的科研开发产品。

我们是在一个非常原始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经济结构。这个结构的建立,只能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铺摊子,一步一步地、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建设和积累。这种建设方式逐渐暴露出它的缺陷,就是对整个经济结构的覆盖能力不够。这首先反映在计划部门的复盖能力不够上:一是由于极度的资源约束,使计划部门没能力去覆盖;二是由于财力高度分散,虽然想覆盖那两条短线,却没有足够的资金。现在全国每年固定资产投资大约 3000 个亿左右,而国家预算用于重点建设(主要是用于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只有 300 多亿,大约是需

要的 1/10。国家现在的财政收入中，能够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全部投在那些看得见的短线上，还是不够。那些看不见的短线，如科研和人才开发等，根本无力顾及。

凡是长期的、社会性强的结构性问题，在中国就更为突出。因为我们原来搞建设，铺摊子，是从工业生产的角度入手。各个部门、各个地方的着眼点都在工业。越是往下层，越是着眼加工业。我们对两头的问题始终认识不足。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社会化联系的增加，两头的问题就非常突出了。

**12. 短缺在经济运行中的信号作用** 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短缺成为一种信号。短缺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拉动价格，而在日益商品化的经济中，短缺信号越来越多地采取了价格和货币的形式。另外，短缺还对技术创新具有导向作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创新的动力主要来自微观层次；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微观层次的创新机能还不健全，宏观创新的动力，往往大于微观层次。往往是由于短缺压力过大，迫使人们去创新，重视技术进步。最后，短缺还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落脚点。在定经济计划的盘子时，以什么为基准呢？财政、信贷、外汇、物资平衡在什么地方呢？当然是短线和由短线引起的一组短缺现象。因为它们约束着经济的总规模，约束着长线的发展，价值平衡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而它们本身的弹性，在一定时点是较小的。

**13. 短缺的缓解，主要是靠各个利益主体的吸纳** 所谓吸纳，就是需求的直接扩张，既不仅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而且使用非市场的办法来增大投入，从而增加供给。而供给的增加，却依资源的有效配置度不同而不同，并不和吸纳程度成比例。

在经济运行中，每一个利益主体都有其吸纳的特定方式。除直接的财力吸纳外，一种是政治性动员，使各种要素自愿地投

入到短线中来；一种是实物形式为主的财政投资，使要素直接流入到短线中去；一种是降低或压住短线产品所需的要素投入的价格，人为地不使短线产品的价格上升。通过这样一些方式，中央可以使短缺得到一定的缓解，从而使短缺的制约有所松动。但中央一级的吸纳是有限度的。超过限度，它就要将短缺传导给地方，也就是要块块去背负一定的短缺压力。

块块也有其吸纳的形式。它尽可能地从中和企业吸纳财力和短线资源，以扩大自己的财力。它还可以用行政的办法，将生产要素很快地组合起来，可以用涨价及行政办法压住过大的需求，用货币及非货币的办法增大供给，对市场作出反应。

企业的吸纳，也尽可能地以货币形式吸纳资源（投资、贷款）和所需要的短线物资。除此之外，企业主要靠向职工提供稳定的就业及各种福利等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增加产出。另外，企业在短缺面前，还会采取各种形式的产品、技术的替代，来缓解短缺造成的压力。企业所做的所有努力，有些并不一定能构成社会性的充分的有效供给，但它作出的吸纳努力，却对社会总需求的增长起到了更大的影响。

通过吸纳，短缺从结构到总量都会有所缓解，从而使受短线制约的经济得到发展。

**14. 短缺在各利益主体之间的传导和摩擦系数的均衡** 吸纳一旦超出各个利益主体的区间和界定，就会引起强烈的社会摩擦，从而导致社会问题。因而在每个利益主体的吸纳达到一定限度时，便将短缺的压力传导给其它的利益主体。所谓传导，就是需求的转移。例如，中央由于直接背负着自然资源的约束，财政上的困难，生活物资的匮乏，这些压力中央要传导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一方面吸纳，缓解一部分压力，同时还要将短缺的压力继续传导。这种传导分为两个方向：一是横向，向其它块块

攀比，将吸纳造成的摩擦系数拉平，一是纵向，用行政的办法将短缺的压力层层传递，最终将短缺传导给企业和家庭。

企业的短缺传递也是双方向的。一是向家庭，也就是向消费者，其通常的形式是涨价及产品脱销、品种不全，质量不高等等。另一方面是企业之间，通常形式是卖方市场，价外加价，囤积倾向，产品强制替代等等。

短缺经过复杂的传导，整个经济趋于一种特殊的均衡，即各经济单元的吸纳摩擦系数的均衡。摩擦系数的均衡过程，实际上是利益与资源的双重配置过程。这即是稳态意义上的紧平衡。从更根本的角度来看，是各种利益主体在物质生产中资源配置的均衡。如果不均衡，就说明该主体在物质生产中得到的资源，已使其再生产的过程发生困难。这与资本主义的利润的均衡化是相对应的。

改革以来，这种吸纳、传导及均衡化的过程进一步货币化了。各利益主体的相互关系中，加进了更多的价值因素。但由于这种价值因素远不能反映和调节它们之间的根本利益关系，因而这些价值因素也要转化为摩擦系数来发挥资源配置作用。例如信贷本来是一种价值运动，但决定信贷运动格局的，首先不是利率，而是信贷分配额度。由于货币化的吸纳、传导、均衡过程都是不对称的，是被需求扩张带动的，而同时形成的有效供给则明显不足，所以短缺的平衡并不是短线彻底、完全的消失，而是短缺常态的恢复，新一轮短线制导又开始了。价值和货币化并没有改变紧运行状态本身，而只是改变了它的形式。

**15. 短缺在紧运行中的产业传导** 紧运行的再生产过程不是简单的重复，而存在短缺的产业传导。资本主义过剩有一个产业自上而下的扩散过程，从消费市场到耐用的消费品、机械产品、大型设备、到基础设施，其传导的中介是价格和金融。而我

们的短缺也有一个产业升级的传导过程,但这一过程与资本主义正好是相反的,是自下而上的,是以短线资源及其货币形式为主的。短缺现象是从基础设施、到原材料、到制成品,以及科技及人才等等。这种传导也成为短线带动的价值和金融形式的产业间的定向传导。并且随着短缺的升级,滞存与短缺同时存在于同部门、甚至同类产品的现象普遍起来。当前的企业间的资金拖欠,就是滞存和短缺的金融表现的新形式。

### **三、紧运行中的价格问题**

16. 紧运行状态下的价格与供求关系 价格是反映供求双方关系的,它是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的表现。价格的波动受供求关系的调节,这是传统的商品交换的一个特征。在所有的商品供求大体平衡或供略大于求时,它们的价格和价值可以统一起来,而完全不必加以任何人为的干预。在最简单的微观经济学的曲线上可以看出,随着商品总量的增加,价格呈下降的趋势;这是在一定环境下形成的曲线,这个环境就是供求接近的状态。

在紧运行的环境下,长线产品的价格,会符合基本的供求规律;但在短线产品的价格上,价格对供求关系的反映有着特殊的表现形式。在总需求略大于总供给,短缺强度还能维持得住的时候,价格显然是按微观经济学的价格与供给数量关系的曲线上升;而一旦出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极度不平衡,短缺强度高,价格就掉下来了,当然不一定会掉到最低点,而是掉到一个能起相应作用的点上。这可能是相当数量的补贴的作用。这时的价格曲线成了水平直线,或略有起伏的水平线,这取决于现有补贴能力的大小,也可能财政完全没有能力补贴,国家干脆就调拨了。在极度短缺时,价格信号就不起作用了。如果这时仍然

放开价格,价格增长的曲线显然是趋于无穷大的;而趋于无穷大的价格对于任何经济来说,都将使其无法运转下去。

为了使在高度紧运行下的经济还能运转下去,就要加入一个非价格因素,即超交换关系,超双方交换的利益分配。这种分配是一种出于社会目标的分配。现在的粮食价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现在人均只有 700 多斤粮食,因此非常严格地限制平价粮的销售。这种销售价格显然并不反映供求关系,但这种价格却是整个国民经济稳定的基础。

在短缺程度较强时,价格虽然不能灵敏地反映供求,但多少还能反映供求方面的一些情况;在极度短缺时,价格信号失去作用,这也是供求的一个结果。

**17. 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的特点**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价值平衡和全社会的实物平衡大体是一致的;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开始就不太一致,剪力差就是一个例子。当然资本主义的剪力差也很明显,但那是作为自发过程的后果,而不是社会计划的产物。我们的价格平衡,不是各产业、各部门价格水平的变化趋势都反映整个社会平衡的状况。这显然是与结构失衡、总供给总需求结构化的状况有很大关系。这种情况下的价格,很难以单一的市场来实现最终的、规范化的调节方式。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的调节功能集于价格一身;而在紧运行下,这些功能是分散的。原来是把结构的功能交给计划,把资源配置的功能交给物资,价格只是核算的工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格的功能是否能象资本主义制度下那么完整?或者说,这些功能是否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价格来实现?这都是需要加以考虑的问题。当需求使短缺到了相当的强度时,价格会持续上升,这就要求政府进行干预,或者要求有一个分配资源的独立机构。如果说现在的计划不够合理,但总要有有一个机

制把基本的资源分配到最需要的部门。在这个基本机制起作用的时候,价格显然只是反映成本的,而不反映供求关系。所谓价格变成一个核算工具,意味着它是整个社会综合平衡的一个手段,但不是一个直接的调节手段。

18. 价格在紧运行中的作用 在紧运行的环境下,资源越短缺,价格越动不了,价格处于逆向的作用,短线资源和产品的供求价格关系是逆向的。

价格,首先是具有从结构性短缺到全面短缺的“加速器”作用,即由于价格固定,价格对短缺强度大的需求的约束力很小,使得结构性需求膨胀继续发展,并通过短缺替代,将原结构内的短缺转移到其它方面,短缺便开始蔓延,从结构性短缺逐渐蔓延成全面短缺。

商品市场结构越完善,价格信号作用就越大。苏联提出在更大范围内利用价格的作用,这比我们意义更大,因为他们的商品市场结构更完整。现在难以形成全社会的均衡价格,但价格又在起作用。在大量短缺中,没被切断的商品市场还能循环,价格也起传导作用;当短缺种类太多时,循环受阻,价格传导也不起作用了。凯恩斯是用赤字财政解决资本主义的过剩问题,我们用什么办法解决短缺问题?转化中的价格结构虽然对短线有所拉长,但仍然赶不上需求的增长。煤现在是结构性短缺,炼焦煤、优质煤等都是短缺的,民用煤、小窑煤是长线,而能够用来炼铁、炼钢的还是短线。

在紧运行状况下,价格能够对改善供给、抑制需求起多大作用?在这点上,单从科尔内讲的来看好象还不够。在一定条件下,提高供应是比较对的,但提高供应的周期较长。由于产业部门之间社会化分工很细,影响到信号的传导,有的地方价格信号过不去。影响信号传导的原因就是资源与结构的约束。结构制

约在中国是比较明显的。

**19. 要对价格和实物的结合点加以研究** 货币投放到底是反映供给还是反映需求？有人认为需求膨胀的原因一是工资总量增加，二是农产品收购价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提高实际是由需求拉动的，价格上涨反映需求增长，不反映供给增长，这种价格会高于价值。短线产品价格带动整个价格水平变动，货币投放也变成了需求增长的反映。为什么货币发放压不下来？因为一直是被需求拉动的。

在价格和实物结合点上（市场上的均衡价格），资本主义市场价格反映供给的增长，总有一部分商品价值在竞争中实现不了；在经济危机中，则集中表现为大部分商品过剩，根本卖不出去。不能实现的商品价值，也就是被浪费的劳动和资源，这是由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造成的。在社会主义的紧运行中，价格被需求增长拉着跑，其常态也是背离价值。在传统体制下，计划价格低于商品价值，结果是过度短缺，货币的功能也严重衰退。价格放开后，又大大超过商品价值，出现了价格陷阱。这和资本主义不同，不是产品变不成货币，实现不了价值，而是货币买不到产品，实现不了实物。商品价值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高价格形式投入，又把需求膨胀变成投入，一部分不能实现为实物的价格又转移到成本中。成本由企业消化，这是成本推动型。在价格扭曲情况下，企业超额利润实现不了实物，又返回成本。一部分工资等收入，没有彩电等商品去实现，也变成投入。在每一轮投入中，都含有实现不了的一部分，每一轮都加上一部分需求膨胀，最后都集中到最终产品市场上，消费品的缺口非常大。价格偏离价值成为一种常态，如果只用货币发放和利率来解释，还不足以说明这种常态为什么会不断形成。看来价格和实物的结合点是一个要研究的问题。

价值和价格怎么一致？凯恩斯是用赤字财政解决资本主义的过剩问题，我们用什么办法能解决短缺问题？现在价格上去了，实际上是有一部分货币实现不了实物。在市场上搜寻实现的对象，搜到一个消灭一个。通货膨胀本身就有价格到价值的变化，从主观到客观，一轮一轮的水涨船高，从结构失衡到总量失衡。有人说结构失衡不能加总，其实马上就可传导成总量的失衡。当然，利率也是失衡能量的释放点，但更大的释放口还是价格水平的上涨。

20. 价格信号的传导及作用范围 以利润为导向，以市场价格为传导机制的资源配置，在什么环境下是最有效的？在加工链条上离制成品距离最短的环节上最有效。而对最长距离的环节就很难有效。产业加工的链条距离越长，利润导向的作用削减越大。由于传导环节有时间差，导致了供给的增长远远小于需求膨胀的程度。此外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传导不过去。比如江苏那里集资办企业，需要用大量的煤炭，可是江苏是不出煤的地方，这就需要把山西的煤炭运到江苏。而能不能把足够的煤从山西运到那里，就牵扯到能不能对铁路投资，对煤矿投资的问题。这对大量乡镇企业来说，传导已经很弱了，它们往山西的煤矿投资的可能性很小。这几年煤炭市场能够相对缓和，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山西大煤矿的数量增加了，国家对晋煤外运的铁路投资增加了，使基本资源和基础设施的紧缺状况得到了改善。如果等着这个信号从市场上传导过去，非常困难。南方沿海用电量每年几乎以20%的速度增长，整个江南地区的能源需求，最终要依靠三峡建设或其它能源的形成才能全部满足。但象三峡这样重大的产业结构调整，等价格信号传导过去就非常弱了。对众多的乡镇企业来说，现在发行建设债券，要等到孙子辈才能用上三峡的电。他们未必会把钱投向这样长期的项目。

可见，越是环节短的，越是靠近加工工业末端的，利润导向、价格传导配置资源的作用越明显；越是处在前端的，如农业、交通、能源、基础设施，信号就越难传过去。信号衰减是因为在每个环节上都有资源约束，使信号减弱或传不过去。这种资源的约束导致传递不灵、信号衰减，这是很重要的。价格信号只能在现有结构中起调整作用。

这个局面和资本主义市场很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的每一环节，产品都是相对过剩的。有的属于相对过剩，也有的是绝对过剩。所以它的价格信号每一级都能往前一级推，一级一级能传过去。如果说整个社会资源是 100% 的话，它实际运用的是 80%，剩下的 20% 是传导的通道。所以它能传导过去。而我们在 100% 封顶的状态下，还想有一个 120% 的运转。100% 已经到了资源约束的边上了，101% 就已经超过了资源约束，120% 的状态产业结构根本无法将信号传导过去。那些不可能在国内实现的，就挤在外汇上了。但外汇本身又是一个国内资源约束的表现，最后仍然是信号传导不过去。

膨胀的、以利润为导向的投资需求来回传递。能不能增加供给呢？在一定环境下是可以的，就是在不受资源约束的环境下可以增加供给。一旦受到资源约束，它就增加不了供给。供给不能增加，整个传导链条也就不能运转。为什么市场价格机制很难对资源配置起作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1. 完全依靠市场价格的思路，没有超出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理论** 把价格作为整个改革的出发点和最终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这个思路还没有超过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理论。因为到凯恩斯就不是只讲这些了。资本主义在许多物资和结构上也是直接调节的，而且不是出了问题才调节，是一开始就直接调节。这是资本主义在战后的普遍趋势。

把价格导致的平均利润率和总量的平衡、资源的最优配置、结构的合理化、科技进步之间都划上等号，这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基本观点。到凯恩斯就已认识到平均利润率解决不了资本过剩的问题。我看提出完全依靠市场价格的办法，是沿着亚当·斯密的思路走过来的；然后，又想到了公有制下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还需要“二次调节”，这实际上又是凯恩斯的思路，他先提出的是利润最大化，后来又提出了用干预手段来改变利润最大化导致的后果。所以，前面提到的完全依靠市场价格的办法最终就变成了短缺环境下的凯恩斯方法了。这种分析不是一种客观的逻辑的分析，是悬在空中的“理论”。凯恩斯的分析是针对过剩环境的，与我们所面临和要解决的问题不同。我们不能按西方的经济状况来谈中国改革的思路，更不能按西方一百年前的经济状况来谈。我们只能从我国紧运行状态的实际出发，从对现实的实证描述中，去寻找一条可行的路子，找出一个在我们这个环境中现实的运转办法。资金和劳动如果能够进入市场充分流动，供给就能拉动了？这里恐怕至少要打三个问号。

**22. 短缺不可能靠放开价格来消除** 现在不少人提出先创造一个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环境状态，然后再用多出来的供给刺激需求。这个圈子绕得实在没有什么实际内容。

如果选择市场，价格放开，就能够消除结构性、经常性短缺吗？实际上，需求膨胀往往超过价格变动对供给的刺激作用；即使是正相关，也不等于供给能满足需求。我们举个最现实的例子：粮食如果彻底放开价格，我们能承受得了吗？我们想在人均七八百斤的水平上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放开粮价之后，价格肯定会上升到人们只能吃粮食，而肉、禽、蛋基本不吃，即恢复到60年代的消费水平。现在不仅可以吃粮食，还可以吃肉、禽、蛋，因为大多数地区是依靠平价

粮。蛇口粮食价格虽然全放开了，但那里职工只有 7000 人，工资水平最低是 250 至 300 元。在蛇口实际上是农产品比价回归，粮食在总消费中的比重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上，所以人们能接受。而全国如果都这样搞，就不行了。

粮食现在和价格的关系是正相关，但并不等于满足了需要。需要是在不断增长的。粮食在沿海省份已由调出变为调入。今年再给农民一点好处，订购减少到 1000 亿斤，订购以外的办法是再加价收购。但是给这点好处，对农民种粮的刺激作用能有多大？今年我们进口粮食 300 亿斤，而且这 300 亿斤缺口都是硬碰硬的城市用粮、饲料用粮。在整个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时候，利润导向必然要促使农民选择利润最高的方面。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把农村劳力和有限的资金都吸引到那个方面去了。而粮食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对粮食的需求仍然增长着。现在是把这个缺口留给财政和外汇，靠进口粮食维持。所以，虽然粮食与价格正相关，对农业生产有刺激作用，但这个刺激作用能否解决问题？这又成了新的问题。

**23. 价格双轨制具有必然性** 实践已经证明，价格双轨制不能过渡到单轨制。在紧运行条件下，总有一部分商品的价格要保证整个结构能够运转下去。而这部分就是存在于行业之间的剪刀差价格。国家必须靠计划价格来保证一些行业的发展。比如大(同)秦(皇岛)线的晋煤外运，对缓和全国煤炭价格起了很大作用。大秦线的钢轨如果都采用计划外价格——市场价格形式的话，国家投资就会不可思议地大幅度增加，大秦铁路就不能从大同修到秦皇岛了，修到北京就过不去了。大秦线之所以能修到秦皇岛，就说明双轨制还有作用，说明计划价格还有作用。

现在蔬菜和粮食的价格都是双轨的。实行双轨的主要是初

级产品,还有各类服务业、交通中的货运部分以及邮电业等等。实行统一价格的主要是基本生活消费品,外贸上也有,如稀有矿产。中药材的价格放开了,而西药大部分是统一价格,因为这涉及到公费医疗问题。

把双轨制变成单轨制这种想法,实质上是相信完全的市场价格可以实现资源配置。但是资源配置遇到需求的无底洞,使资源没有办法配置,配多少就掉进去多少。

有人说匈牙利等东欧国家是单轨制价格,其实他们也是双轨,他们的那一轨在苏联。能源(电力、天然气)、铁路、钢材等都在苏联,他们这边当然可以放开市场价格。如果苏联那边对他们实行议价供应,他吃得消吗?他们的外汇收入对他们决定生死的。有了外贸出口,他们才能在经互会得到必需的燃料,在西方市场得到需要的原料。他们为了保外贸出口,会采取最强制的手段。他们是单轨制吗?根本不是单轨制。匈牙利的指令性电话比中国的指令性计划还厉害。他们的副总理可以直接给大企业打电话调拨产品。一年开两次一百个大企业的计划会,实际上就是调度会。

公有制与双轨制不一定充满矛盾。有些行业的价格放开以后,政府确实不用管了。如手表、缝纫机、洗衣机、收录机等,已经全放开了,大家也觉得挺好。在现有结构中的最后制成品环节,我们实行彻底的生产价格,好象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通过在计划这一轨采取的比较强制的分配,使几个基本的短线能够维持住,在总供给与总需求能过得去的状况下,我们可以在这棵大树下对系列产品实行放开的办法,因为对这些末端产品的需求有限。同时又要看到,我们之所以能够对这些产品实行彻底放开的办法,又是依赖于对整个社会资源中几个最基本资源实行了严格的计划。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一些领域中实行

充分的市场调节。

价格的双轨中有一轨是乡镇企业、地方企业。由于减少了对地方的价格管制，这些企业更具有活跃市场的性质。人们都希望这一轨将来与另一轨合二为一，或者说用市场这一轨取代另一轨。我看这是很困难的。前一段人们对双轨制的批评很多，什么怪胎、相斥、不能持久等等。但现在看来它是很现实的，至少目前还不可能取消或改变。

地方以利润为导向的企业的活力，依赖于国家在另一轨上给它保证了一定的条件。有人说这是无偿占用，不合理，但现在很难看出这部分会收缩。地方政府愿意把自己有限的财力投入象三峡这样的基础工程吗？肯定不愿意。只有靠国家来投资。也可以说，双轨制在过去一贯存在。现在与过去的区别，只不过是多和少、公开和隐蔽的问题。

#### 四、紧运行中的金融问题

24. 公有制条件下金融运行的特点 货币运行和商品运行的关系可以作为研究金融运行的起点，但主要的是要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金融运行加以对照和分析。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货币发展成信用货币，这种信用货币的支撑点，是经营在不同的所有者之间进行。一个人能够取得多少信贷货币，取决于他拥有的资产、在产业中的地位和产业活动的范围。如果他有 100 万元，就能贷到 300 万元；如果他只有 5 万元，那绝不可能贷到 300 万元。另一方面，企业要贷多少，要视在已经过剩的市场上能够获取多少收益而定，市场约束和私有利益约束使货币需求受到约束。银行创造信用的功能也受到类似的信用约束和需求约束。

作为资本之间的一种信用关系，金融有导向作用，但只有在过剩的环境中才能起作用。在公有制条件下，财产所有权的边界变了，一旦利益边界模糊，企业贷款的风险就变成了发展的可能，企业货币需求便在巨大的市场需求推动下膨胀起来。同时也造成信用边界的扩张和模糊。不同的国营企业之间，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可能差很多，但能得到同样数量的贷款。这取决于政府制定的行业贷款指标。对企业来说，这个界限是软的可移动的。八年改革，这个界限硬了些，银行发放贷款也要看还贷能力了。但在很多情况下，企业仍旧是没有营利也能得到贷款。首先因为有政府做担保，政府可以对银行下“戴帽”信贷指标。所以，没边界本身也是一种边界，政府的边界是无限的。公有制导致信用关系发生了变化。

同时，市场也发生了变化。卖方市场可对金融造成很大的需求。我们相当多的部门是以卖方市场为信用抵押。由于全部产品都能很快销出去，贷款可能一年就赚回来。表面上看起来，企业的信用程度很高。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就很难办到，因为产品卖不出去。因此，我们研究货币、信用时，一开始就要从所有制的特点入手，所有制决定着整个经济运行各个方面的特征。

在紧运行过程中，信贷在相当程度上成为需求增长的表现。投资实现不了物资，会变成储蓄、国库券、债券等多种形式。如果仅在持有者之间进行交换，不会出问题，还可以收回一些手续费。但如果这些资金又用来投资，流通的货币就会增多。在改革中，货币在金融运行中的不对称作用仍很明显。一方面对需求的约束稍有硬化；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很大，金融运动会很快传导到市场中刺激起需求。现在多数银行放款多，存款少，只有少数银行有存款差额。这就说明投资还在膨胀，信贷软化还没有消除。1986年的行政性贷款，就是典型的、纯粹的信贷软化。

这种信贷很快传导到市场上，成为超分配的需求。加上投资实现不了物资，不断地形成投资饥渴，又造成市场需求进一步的扩张冲动。

总的来看，金融可能是更大的不对称。称尔内只说了货币起消极作用，这不准确。货币也是积极的，一是起引导作用；二是各级利益主体都盯着货币，又为得到货币而盯着市场。在我们这里，总需求在一定时点上只表现为货币需求。

**25. 金融运行中的利益主体和利益均衡** 对传统体制下的金融运行，不必过多地描述，重点要放在改革八年以来金融运行的新特点上。最重要的是要分析几种利益关系在金融中的运动形式，研究地方政府等利益主体在金融上的表现和关系等问题。

金融运动也在利益主体之间采取摩擦系数均衡化的方式，例如信贷额度的均衡。地方、企业面临的是市场，不完全是财政指标。但它们要从财政上争取最大的利益。现在指令性计划很少了，例如电冰箱、洗衣机、收录机等产品，没有指标了。这是改革后很大的特点。企业面对商品市场，也面对金融市场，但它们不是直接去银行拆借，而是向上级要信贷指标。匈牙利经济学家把这描述为行政市场，即平等地向上级争取有限的信贷额度；在行政摩擦中竞争。各利益主体都是在原有环境中参加竞争，不可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譬如肉联公司，它的生产状况与社会生活的稳定有很大关系，因而即使没有利润，也可以贷款。有的行业则要靠利润高去争贷款，如汽车行业。总之，在信贷配置上有社会、政治、经济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经济方面的比重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企业，要凭盈利向政府争贷款额度。

现在金融运动并不是最终形成稳定的收入率，不是以平均利润率为结果，而是达到一种利益摩擦的均衡。在这种摩擦中，利益主体的金融行为是不对称的。一方面是企业还贷上的拖

欠，不是欠银行的，就是欠财政的；另一方面是企业之间的拖欠。企业间的拖欠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短线产品支配者可以欠款，短线产品对金融有吸引、制导作用。我的产品销路好，就可以占用你的贷款额度。还有一种是产品卖不出去的，赖帐。两种关系在资金运动上都有表现，在企业之间的横向关系中，短线通过金融在更大范围内起作用。

在金融运行中，宏观上是紧配置，信贷是紧的，对信贷要控制。但在微观上，资金紧张和资金滞存同时都有。这种利益配置的格局，不断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导致资金配置的不合理。这是我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特点。

金融运行过程中的利益主体行为表现，利益均衡方式，短线制导的作用等，应作为研究金融问题的主要内容。这些方面说清楚了，复杂的东西也就不复杂了。

**26. 我国金融系统作用弱化的主要原因** 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了资金融通的积极作用。过去我们的金融系统虽然一直都在运转着，但作用却发挥得很不够。现在我们又重新考虑发挥金融的作用，也就是要增强资金融通的功能。

很多同志觉得过去我们的金融系统之所以没有发挥作用，是由于受到一种观念模式的影响，即金融只是起出纳的作用。我认为，就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这种观念模式反映了我们国家过去比较落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这种现实状况。除了历史的原因之外，金融机构之所以没有发挥强有力的作用，还有更基本的一些原因。解放以后，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场的迅速扩大，经济规模的增长，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这个市场的最大特点，是在多数情况下大于我们总供给的限度。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市场就变成相对短缺的市场，而不是一个过剩的市场。在过剩的市场上，金融的作用就象神经和大脑的作用，可以指挥一

切，调动一切；而在短缺的市场上，有限的资源要办足够多的事情，那么金融的作用就无形中被弱化了。我们现在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是在过强的市场需求情况下形成的一种结构化，即短缺下的结构化。短缺的结构化减弱了金融的作用，这同时又反过来加剧了短缺。因为越是行政化管理，企业对于国家的关系就越简单，有困难就伸手要。这种严重的预算约束软化和信贷约束软化，使得我们的金融业发挥不出作用。

列宁很重视金融的作用。他曾把金融比作是资本主义经济中最精巧的机器，并认为金融能对社会主义经济发挥巨大的作用。可惜这个机器在很多情况下被我们打碎了。也不是有意去打碎，而是逐渐撤掉了机器运转的内在动力。这样，这架机器就慢慢不起作用了。前面已经谈到，这里面有其内在的原因。当然也有在这种客观现实下形成的一些主观的观念的原因，如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需要商品，金融只要当出纳，不需要发挥更多的作用，等等。

27. **金融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全局性作用**  
事实上，金融历来对经济都有很大的作用。不管是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实行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金融作为商品生产的必然产物，都有着不可取代的全局性的巨大作用。

首先，金融是社会总量和结构的一个综合反映。不同产业的关系，在金融上有着鲜明的表现；国民生产和再生产的关系，也是通过金融来表现的。如果我们仅仅按照斯大林过去讲的那样，把价值、货币、金融只作为一种结算工具，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金融反映了整个经济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其次，到目前为止，我们衡量社会财富，还是采用马克思当初分析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方法，即用来度量价值，度量劳动量。社会生产的运转，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所共有的，是社



比例关系,使之顺应科技进步和需求变化的方向,使整个宏观经济结构合理化。

因此,在对待总量调节和增量调节的关系上,应该大胆进行研究和探索,通过金融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来促进企业和产业之间的重新组合,促使总量调节的进行。应该说,这种总量调节在原则上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困难。现在我们要建立的金融市场、股票市场、科技市场等一系列市场,都有助于产业要素、生产要素的合理重组。如果能够更好地打破现有企业之间的行政关系,更多地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变成一种金融关系、经济关系,而且使这种经济关系的约束不断硬化的话,那么,产业结构的调整、科技进步的发展,将会处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之中。金融就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我认为,利用金融调节产业结构,通过金融市场疏导和融通社会资源的作用更好地组合资源,有助于解决经济生活中在总量上是短缺、在局部又是浪费的、低效的,亦即微观上的低效和总量上的短缺同时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微观效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

从金融本身的发展来看,金融部门在过去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产业部门,现在也没有做到完全产业化。过去金融机构对经济的管理,往往是从总量上考虑的多,从产业结构上考虑的较少。这主要是由于金融应该发挥的作用从来没有实现过。我们是在一个经济落后的社会里建立现代化经济的。这样就出现一个矛盾:产业本身要求高度的结构化,以适应日新月异的变化;而金融的管理却是单一的层次。这也是多年来金融发挥不出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金融机构的功能过于简化,缺少一个能按照产业发展的方向灵活有效运转的、分层次的、结构化的金融体系。另一方面,一些重大的产业部门也缺乏相应的银行机构为其服务。













个内容更加丰富、更加科学的财政平衡概念，而不应简单的为了破一个东西，就引进西方的东西。

34、**财政应在对总量和结构的调节上发挥作用** 我们在过去的30多年中，已出现过几次财政管理体制的下放。过去的下放和现在的下放，应该说在基本的方面和做法上是一致的，没有本质的区别。历年来财政体制的变迁，无非是在中央、省、地、县这几层利益之间进行再分配和调节。

以往的分析，一向对分权和集中各自存在的合理程度和历史必然性描述得很不够。一是历史阶段的划分不清楚，二是对各历史阶段中央、地方的财政行为变化的脉络描述得不清楚。如果说1980年以来的财政是经营型的，当然不是商品生产下的经营行为。现在无非是财政的口子开得更多了，用于补贴和用于吃饭的比重更大了，而用于生产能力的更小了。过去下放后出现的重复建设的盲目性现在又重新出现了。而这种吃饭性财政比重的逐渐上升，财政从建设性财政被迫拉向吃饭性财政的情形，无非是消费超前增长的表现而已，与中央、地方在财政上分权无关。导致消费增长的原因不在财政之内，不分权也会导致消费增加，财政只不过是它的表现。如果说1980年以来在经济发展中财政的作用增强了，主要是指它在集中地方的财力、发展地方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增强了，这个作用是相当明显的。广大地、县主要依靠自己财力，建立了大量加工工业，活力是很旺盛的。但是这种地方政府行为是以利润为目标，以利润为导向的。在中国这个国土广阔、有着巨大市场的条件下，就产生了同资本主义类似的重复建设的盲目性。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不足，导致大量结构性的短缺。“十二大”提出要加强两个基础，但现在还没有什么根本的好转。国民经济的结构问题至今没有变化，甚至有恶化的趋势。财政本身也有预算赤字增长的趋势。



## 六、紧运行中的资源配置问题

**36、社会主义经济实现二元配置的可能性** 资源配置与社会均衡是同一层次的问题。

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源配置是怎样实现的？显然这个实现过程可以有很多方式，不仅仅是我们过去考虑的那种计划导向方式。譬如，现在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方式，既不完全由计划导向，又不是单纯依靠市场的利润导向。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配置呢？简单地说，这是一种二元配置。

**37、紧运行也是一种市场** 紧运行是公有制下的市场，属于广义的市场，它不是象普通市场那样运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企业也为交换而生产，但这种交换既不是为使用价值的简单实物交换，又不是为最大利润的一般交换，而是最大限度利用资源，满足需求增长的交换。所以这种交换关系不但越过了自然经济，而且也越过了资本主义。它加上了日益增长的需要，甚至是需求不可遏制的膨胀的内容。这是非市场运行，还是另一种市场的运行？我倾向于认为紧运行是市场的一种，是与资本主义典型市场本质不同的市场。

拿紧运行和资本主义市场相比，交换尺度有不同的表现。资本主义市场中，价值是统一的尺度，而且有集中化、抽象化的趋势，从稀缺产品到贵金属，又到纸币、票据，有价证券、信用卡，现在抽象为计算机信号。而在紧运行中，却出现了反过来的倾向，出现了物资串换，产销联合等，有一般等价物功能向最短资源分散化和具体化的现象。资本主义有充分满足市场需求，并且保持过剩的机制，这是看不见的手。实际上紧运行中也有看不见的手。需求的膨胀带动了其他方面，这是最自发、最自动，同时也是最带盲目性的机制。

不同的市场，有不同的价格形成机制。资本主义生产以利润为原则，生产价格反映平均利润率，反映企业的利益，并为过剩的供给和有限的需求所约束。社会主义的价格却从一开始就反映资源不足、短缺，为需求膨胀所左右。留利水平以简单再生产为标准，基本不反映企业的利益。资本主义加强管理和政府干预，是为了减弱价格受需求约束太强的问题。如果社会主义价格只单纯反映企业的利益，由于价格反映需求膨胀，结果必然是价格不断上升。科尔内在这些问题上展开不够，他的价格理论苍白，而且有跳越。

不同的市场，也有不同的竞争和淘汰机制。在紧运行中，长线的企业经营不好，有可能列入破产、淘汰的范围；短线的企业即使经营不好，也不能列入破产、淘汰的行列。紧运行靠的是增量调节，市场的特点是需求普遍在扩大，科尔内说的普遍短缺，说消费市场短缺是因为生产市场短缺造成的，是生产挤消费，恐怕不一定。紧运行下，个人工资约束是硬的，但工资总量增长的约束并不硬。福利性、非工资性消费也起作用。还有人说，公有制下公平分配，需求同步上升，这些都会引起消费膨胀。消费膨胀有自己的规律，各种需求都膨胀，几乎所有行业都不是长线。竞争意味着在市场中多占份额，而在紧运行市场上由于市场过大，所以企业很容易得到一份，造成企业发展动力不足。另外，在紧运行中的投资，也与在资本主义市场中不同。资本主义企业是担心投资后能否在有限需求的运行中占住市场，而在紧运行下，发愁的是第一次投入不容易找到，一旦从可投入增量中找到了，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资本主义企业争夺的是有限需求，紧运行中企业争夺的是资源，是有限供给。

对市场的自发机制，紧运行和资本主义运行都采取行政措施。资本主义用行政方法扩大需求，紧运行用行政方法约束预











法。这种生产方式已被世界各汽车工业大企业所接受。这点给人以很大的启发，即信息不一定全要集中。把信息都集中于大脑，然后大脑指挥所有的动作。这是做不到的。科尔内也曾讲到在许多经济环节中，可以有类似植物神经的调节作用，既非市场信息，又非计划信息，只是象植物神经一样的一种简单的互相依存的关系。这恐怕和人一样，和有机体的进化或协同学理论一样，从无组织状态到有组织状态是有类似特征的。用一个信息中心指挥一切是不可能的，现在苏联自己也不太相信这一套了。过去人们对计划的看法，是把计划统统集中在社会的一个大脑里，现在看来是不行的。马克思所说的计划无非是自觉一些、盲目性少一些。而斯大林是从处于赶超西方的环境下，不得不采取抉择一切的办法，有历史阶段的局限性，不能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

45、“二次调节”理论在实践中难以实行 我认为“二次调节”理论与现实接不上。这种理论认为应形成一个完整的二次调节机制。第一次是全面由市场调节，市场涉及不到的再由政府干预。这种二次调节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现在许多部门只有一次调节，有相当多的短线是政府在直接管理，将来这部分也不会实行二次调节。

在一般市场均衡的状态中，原则上说只有所有的产品都不存在短线才可以实现二次调节。而在不断再生出短线的环境中，二次调节就不可能完整实现，只能是对长线实行二次调节，而对短线只有一次调节，就是政府的直接投入。当然，这种投入也有不同情况，若是领导者高明一些，可以发展高技术、改变产业结构；如果领导者近视一点，认为产量多、产值高就行了，他只会现有结构中扩张，其结果是一次调节的副作用更强了。在大量短线存在的条件下，二次调节是不现实的。任何省、市的计

委每天都在为煤、水、电、气等忙得团团转，这就是现实的一次调节。如果计委不搞一次调节，把企业放入二次调节，那么许多企业马上就会垮下来。当然这并不是我们的理想模式。我们是处在短线不断再生的环境下，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

**46、要客观评价政府干预的作用** 不能把由于短线导致的政府干预看成是一种优越性。很明显，政府干预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被迫的，其中并不含有什么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含义。短线制导没有任何高明之处。但在产业结构的问题上，就存在政府干预的合理性问题。存在价格与结构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简单地划分出一个逻辑和理性的界限，现实的界限是按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的利益层次划分的，不同的利益层次有着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大量加工工业的企业及地方政府基本上是以利润为导向的；而在沿海城市及上海、天津、北京、武汉等大城市，他们已开始考虑到环境，整个产业基础设施以及人才对产业的作用；包括江苏、广东等经济发达的省市也考虑到了这些。但也还只是将很有限的资金投向这些领域。北京总的说把资金投向了基础设施，但随着财政收入的减少，这种能力也在缩小。虽然从绝对程度上基础设施是加长了，但在整个经济中，它们短的程度更强了。这种状况没有改善，很难说在基础设施这块领域能实现宽松的环境。日本半导体芯片每一片有59%的补贴，这使得美国无法承受、最后只得对它实行制裁。这种补贴是一种政府干预手段，与结构调整是有关系的。如果最终取得了市场垄断地位，就可以把全部补贴赚回来。

**47、承包在现有结构中是有效的** 承包的作用无非是企业留利多了，但还不具备领导干部的竞争和领导干部以个人财产同经营状况挂钩的约束硬化的优点。人们都以首钢为例说明承包好，这恐怕是指首钢的技术改造和生产发展比较好，这是一个

成功的例子。凡是搞包干的企业，消费基金失控的情况都不严重，而对抑制投资也有效果，因为企业工资要自己算帐，投资也要自己算帐。这是目前大家提到的两个特点。资产经营责任制同样会收到这种效果。在各种方案中，我比较倾向于资产经营责任制。资产经营责任制最具特色的是资产评估，这是一个核心的环节。承包为什么有效？承包的结果实际上是取代了国家指令性计划中扩大规模、数量增长的作用。过去用指令性计划的办法，显然有重点项目重点浪费等诸多弊病。而承包以后，自己算帐就要精打细算了。本质是一样的，但承包显然比过去的办法好。但它解决不了结构问题，只能解决现有结构下的数量增长。对于短线产品，承包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是向前走，还是向后走？是向更初级的产业走，还是向加工工业走？中央领导同志希望它向前走，向更初级的产业走，而首钢却要向加工工业走。这很明显是企业行为的短期化，是以利润为导向。目前承包的关键问题之一是争基数。一开始企业竞争的环境就不平等，有人把这叫做“早革命不如晚革命”哪个企业挖潜挖得差不多了，承包后反而会吃亏。承包有适用性问题，处在中等水平以下的企业没人愿意包。首钢承包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国家对矿山和煤铁这部分的投资都已投入了，现在只要在钢材上稍加投资就可以获得巨大收益。

## **七、对经济运行中几个有关问题的思考**

### **(一)消费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

**48、消费对经济运行有较大影响** 消费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和作用，不是比较弱，而是比较大。跟西方一样，消费是整个经



说,我看对匈牙利等国家来说也差不多,也有类似的问题。东欧有的国家不是搞挂钩吗?采取工资和物价指数挂钩的办法。他们搞了挂钩的办法,工资就更不容易硬约束了。

## (二)人口问题对经济运行的影响

51、**农村人口是个巨大的后备压力** 农村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是单向的,流出后就很难再流回去。1962年2000万人返回农村,这样的事今后不会再有了。这不是个调节经济的长期办法。现在城里低技能劳动力从生产岗位上裁减下来,还有提供供给和需求不平衡的老、幼、病、残,显然不能再回到农村去。所以说,农村的劳动力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来说,更像个巨大的后备压力。

52、**过去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要充分肯定** 中国人口三十年发展到十亿,很大程度上是靠低成本劳动力,靠历史上农村水利的原始积累。过早地丢掉这些,是一个重大的失策。无偿调拨是有问题,但过早商品化,反而会影响进步,很难集中力量搞大规模农田投入。这在很长时间内实际上是不可取代的。都靠投入钱,会造成很大浪费,短期不能收回,经济也难以承受。在中国现有发展水平上,要充分肯定过去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肯定它们的积极作用。释放需求也拉动了供给,否则还会有多数经济停留在自然经济上。至于供给的增加,实际上是用集中财力,搞重点项目发展起来的。

53、**提高人口素质是解决人口问题的出路** 要把人口问题的出路讲出来。一方面,要抑制低水平需求数量的过度扩张和需求向高层次的超前转化,抑制直接由人口带来的需求膨胀。另一方面,还应从人口的供给角度,增加供给财富的能力。通过

改变人口素质,改变目前高需求、低供给的倾斜结构。

只把矛盾摆出来,人们会觉得没有出路,认为人口压力太大,中国不行了。摆出矛盾,可以使人更冷静,但不改变人口素质,是不能改变人口压力的。改变人的素质很难,社会发展要消除对教育发展的阻碍。毛主席曾说人多热气高,现在要改成高技能的人要多。只有这样,才能缓解人口压力,改变供求不对称的状况,促进人口素质向高水平变化。

54、低成本和高科技相结合是我国人口的目标模式 要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和科技进步的作用。当然,高科技由于受资源限制,也不可能发展太快。克服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将是长期的任务。将来的人口目标模式,应当是保持低成本并和高科技结合,这样才能形成新产业的支撑力量,才能在国际上有竞争力。这个目标模式,不是牺牲公平和一般群众的基本需要,而是要解决广大就业和消费刚性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使广大就业和高消费分开。我国的人均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数,不可能像西方那样搞高消费。所以应当把低成本和高科技相结合。如果是低供给能力、高消费需求,就会成为恶性循环。在保持多数人民群众温饱、生活稳定的基础上,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低成本的优势,建立高科技、高效率的高层次产业,这是中国人口问题的出路。欧洲人口多数已进入高成本层次,低层次的劳动要由外国人干。我们不行,低层次需求不要过早地向高层次转化,但低成本的有益作用要能传到高层次产业中,高层次科技的作用也要传到低层次产业。在我国,产业层次不能统统城市化,也不能统统高科技,这将是一种长期的状况。

55、中国悠久文化和高科技结合能形成很强大的力量 中国巨额的人口和悠久的文明结合,同时和现代高科技结合,能在世界上形成很强大的力量,形成很强的经济实体。这是可以设想的。



应指政治结构和经济内在结构的摩擦和矛盾，两个既存的结构之间应加以协调。可以说，现在党政分工不明确，就是一种不协调。例如在工厂，厂长、党委书记的作用发生错位，就是一种不协调，就会出现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改革这种错位状况有很大的难度，但我们还是要要在摩擦和碰撞中前进，使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逐步完善。

57、政治体制职能的集中表现 政治体制的职能集中表现在决策和调控上。现有体制的决策层次主要是从政治统一的角度考虑的，从经济运行角度考虑的较少。实际上，政府和政治组织干预经济活动的职能在现代社会中是很普遍的。西方国家强化它，是在市场机制上使用它，在普遍自发的市场机制上运用政府的协调机制，以求达到协调状态。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职能是围绕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展开的，主要表现是分配有限的市场。不论是国内的权力制衡，还是国际上的政治活动，都是围绕市场分配的利益。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要走向成熟，也应围绕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展开。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是紧运行，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政府干预经济是为了使经济资源的短缺强度不要太强，既要保持需求拉动的作用，又要尽量降低短缺强度。这样在需求与资源，使用资源与供给资源的管理机构之间也应有互相制约，并且使局部利益代表者和全局利益代表者分开，不要让管理资源的无限使用资源。如果这些机构和利益的代表者行为约束软化，就会把资源吸光、用光。

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第一步要保持经济运行不打摆子，体温保持 37℃，要有自动制约，有抗衡资源饥饿症的机制，使经济运行走向稳定。其次是对经济结构的调控问题。这对政治体制来说，是更高一层的要求，要有更高级的决策体制和决策程序。



很多人说紧运行是主观原因造成的，过去是“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现在是领导有竖碑思想。主观到底起什么作用？我们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时要回答这个问题。主观表现形式对政治体制的变化来说，既是现象，也是原因，两者有双向的作用。我们要说明这里面更深一层的东西，说明主观因素和体制怎样相互作用，互相转化。长期的主观因素，可以转变为体制，和体制有相互固化的作用。为什么有人认为问题都出在长官意志上，认为打倒长官、或决策科学化就好了？因为这些人没认识到主观和利益之间的联系。领导水平高，只会考虑得长远些，但超出一定范围，就会碰钉子。客观约束每日每时都在转化为主观的东西，表现为主观和体制之间的关系。

59、决策分层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 过去的机制不断再生出短线，而且短线的增加速度很快。改革就是要强化约束，要有利于短线的消除。改革的指导方针中要明确这个问题。

决策分层化是个出路。经济社会运行的复杂性要求改革原来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实行决策分层化，使城市建设形成良性循环。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建筑三权分立，是为了平衡各利益集团的关系，其制衡机制是保证各财团的利益，是使有限市场在争夺条件下得以均衡而不导致震荡和内战的制衡。各财团的利益一旦受到损害，就通过众议院、参议院行使否决权。我国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在政治体制上的反映是缺少一种非私有制的社会约束。其表现是使用资源和管理资源集于一身，谁都有份，谁都想捞一把，无人制衡资源平衡。名义上代表整体利益，实际上代表局部利益。这样，局部利益强于整体利益，最后矛盾集中到少数主管人身上。矛盾要得到解决，一是靠权限约束，二是靠主管人的认识。从长期趋势看，少数主管人的制衡与无制衡机制差



有盲目性。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消极作用，还有落后的管理办法，这些对生产社会化是障碍，应当消除。政府分配资源以需求为依据，以资源为限度。需求超前增长，会直接受资源约束，但政治体制中也存在着制约需求超前增长的力量。如人代会对国家预算的制约的作用，在宪法上有规定，但这个作用发挥得不够，我们是从经济运行谈政治体制，对政治体制本身的演变不一定要描述，而要从政治体制对经济运行的关系来描述。

#### (四)城市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

**61、超紧运行是北京城市运行的主要特征** 北京和全国其他大城市的经济都处于紧运行状态，但内容有差别。北京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城市基础设施上，这是短线中的短线。北京城市“超紧运行”状态形成的原因有很多，真正体现北京矛盾特点的或者说导致北京城市“超紧运行”的更主要原因，是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带来的需求膨胀。

在“过剩”经济条件下，城市的吸引作用产生于追求超额利润，表现为“资本的城市化”。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城市的吸引作用产生于优厚的福利政策和优越的服务设施。产生于部门、产业在“天生”平等条件下无偿地占有城市基础设施。资本主义国家争夺资源是靠资本调动，在市场上的平等最终表现为不平等，由追求超额利润、追求市场引起城市膨胀。社会主义国家则是按非价格因素争夺资源，表现为部门之间过分追求平等地位下的竞争，要求平等地使用资源等等，而引起城市膨胀。在公有制下，可以有未实现的需求，不可有未利用的资源，这种观念下的竞争使一些需求变成了“空中楼阁”。无限扩张的需求从空中落到人间，变成了权力的竞争。这种竞争在北京表现得更突出。

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高税收、高物价等手段限制了需求增长。社会主义国家则是对无限扩张的需求缺乏应有的限制机制。福利政策和城市基础设施无偿使用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强有力的竞争力,象海绵吸水那样,把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增价值吸得干干的。

**62、城市运行中最突出的矛盾是基础设施** 对整个城市运行来说,构成矛盾最突出的就是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最能打破城市经济循环的也是这些。由于城市有聚集效应,城市土地的级差收益也越来越货币化了,土地价格在增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经营在城市中的决定性作用,是研究城市运行的核心问题。

要着重分析基础设施投资分散的问题。投资分散严重地削弱了城市的资源供给能力,并增加了需求。各方面都投资盖楼建宿舍,楼房立起来,要水、要电、要气,但这些分散的投资却不管有没有基础设施,有没有学校、商店等服务设施,使需求达到甚至超出了基础设施的边际效益。城市基础设施有许多是产业发展摊出来的,这是我国的一大特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是靠单一财政渠道所能完全解决的,要与基础设施改造相结合,凡是对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有利的就要鼓励。新兴技术、高产出产业要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连起来,这样可以解决一部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房地产、旅游业、新兴第三产业这些非物质生产领域的收入,应作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

## **八、紧运行中的利益主体问题**

**63、在研究经济运行时需要回答利益主体问题** 在当前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益主体问题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需要回答清楚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公有制条件下,利益主体是绝对一致的。

我们在进行经济运行机制研究中认识到,社会主义条件下,特别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全社会各方面的利益主体是不一致的。那么,各利益主体之间内在的关系是什么?利益差别是由什么决定的,是怎样的差别?各利益主体逻辑的合理性存在原因是什么?各个利益主体是怎么形成的?历史上是如何演进的?等等,都需要一一给予回答。很显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益主体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进行深入的探讨,取得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认识。清晰地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课题整体研究任务来说,必定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单纯用计划和单纯用市场都不能充分说明经济运行为什么会成为这种状态。研究经济运行机制和运动状态,必须深入到利益主体分析上。利益主体的配置是经济运行得以进行的载体,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决定了资源利用的程度和生产要素配置的状况。

**64、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益主体之间既和谐又冲突** 如果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特点概括成“欠抑制型需求膨胀”,就要从利益主体入手说明它。这是因为经济运行是在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状态中进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但存在着利益上的和谐,而且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和矛盾,这是研究经济运行一般问题的出发点。认识和把握这个基本出发点很重要,人们的经济行为并不是从想象的经济模式出发,而是从现实的实际利益出发。研究经济运行的矛盾结构,只有从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入手,才能抓住主要矛盾。

对新旧体制也不能泛泛地讲经济集中或经济民主。谁集中?谁不集中?谁对谁集中?这些都要做具体的、本质的分析。象宝钢这样的工程,不集中能建得起来吗?另外谁对谁民主?这也要有具体的含义。经济利益的各主体都要求民主,都要求

平等地使用资源,如果这样无限地提要求,资源用完了怎么办?这不是把权交给企业,企业不会使的问题,而是利益不一致导致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也有矛盾,无论如何达不到让各方面都完全满意的状态,只能尽量找出从整体来说普遍满意的状态,这样才能使各方利益基本统一起来。此外,还有统一不起来的特殊利益,对于这些特殊利益,可以给其自主权,尽量发挥作用,但是不能跳出利益统一的范围。

**65、从利益主体的分析出发,说明“紧运行”成因** 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利益冲突和利益矛盾,是研究经济运行的一个基本观点。在公有制条件下,各利益集团和利益层次之间,不可能全都是和谐的,现在我们还做不到象生物体那样,每个细胞都独立存在,但又具有总体目标,我们只能在不同利益层次和矛盾当中求得发展。看来这些矛盾是由经济利益不同造成的,同时也是由某些非经济利益的格局决定的。

最终要从利益主体出发解释所有的矛盾。现在的经济运行是在不同利益集团的和谐与矛盾之中演进的,从这个角度一下子可以找到所有行为的根源,找到各层次、各部门形成的根源。这是最基础的东西,社会主义基础结构实际上是由基本矛盾构成的,不可能被其它东西取而代之。分析利益矛盾应以利益主体入手,从利益主体的现状和运行的状态入手,再加以展开。《矛盾论》中提出,一个主要矛盾决定其他矛盾,这是一个基本观点。在论述经济问题时,也要求在哲学方法上有一定的逻辑性,不然的话,对问题的认识必然缺乏内在的联系。

**66、抓住利益主体,可以透过运行现象看到运行本质** 仅从收入流量分析还不行,以利益主体为流量分析的基础,大概更能透彻地说明现状。因为,在西方经济学中,利益主体问题是前提,是经济学以外的、经济学不考虑的问题。从资本主义转变为

社会主义，利益主体有了很大的区别，把这一点区分清楚，就能比较清晰地解释社会主义经济，解释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状。这是一个核心问题，这个问题能说清楚，整个文章的主线就比较清楚了。

**67、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利益多样化**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大体上有三种说法：第一，初级阶段中的商品生产是不可避免的；第二，在初级阶段不可避免要出现短缺；第三，在初级阶段将会导致利益的多样化。我们认为，在初级阶段，当生产结构还不足以使社会利益统一起来的时候，必然会有利益的多样化；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好象有一个利益半径，在一定的半径内凝聚起来的的就是利益主体。我们可以设想，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中，在交通、能源、信息、物流和产业结构等方面，都达到了高度均衡，那么，这种利益多样化的层次就会减少，变得更加透明；反之，利益多样化的层次就十分复杂，难以一下子辨认清楚。

**68、各层利益主体在工业化过程中逐一生成** 经济利益主体逐个阶段地生成或激活，形成了一定经济格局的框架。这个过程是一个滚动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有主线的，这个主线和我们当前的现实紧密联系。人们之所以十分怀念五十年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那时候没有这么多利益主体，没有这么多层次的经济利益。随着工业化的迅速进展，不同层次的利益主体就逐渐形成了。这个形成过程虽然有反复，但可以抓住两点，一点是中央对地方的关系，政府行为作为利益主体行为是中国特有的一点；另一点是农民的经济利益迅速增长，由原来体现在解放初能分到土地、能吃饱肚子，迅速增长到现在农民要求农村经济全面增长、加强农村地区城市化的进程上。这两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

**69、两种制度下利益主体的差异** 社会主义的利益主体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利益主体。资本主义的利益主体是私有制的，彼此关系的界限很清楚，没有直接的统一性。他们在资本主义商品市场上，以各自的经济利益为出发点进行商品交换。在争夺市场赚取利润上，我多一份，你就要少一份，因而相互之间在经济利益上是完全对立的。这种对立，必然要求交换的尺度充分反映自身的经济效益。他们只能通过市场才能实现利益的均衡。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利益主体之间不是资本主义商品市场上的关系，有统一性的一面，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具有的特点。公有制下，利益主体之间必须进行交换，不然不能进行再生产。但是，这种交换又不完全以自身利益为支点，交换的尺度也不是单纯反映利益主体的经济利益。这种情况导致公有制下的市场与私有制下的传统市场存在着很大区别。

**70、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各层利益都有主体的表现** 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各层利益，显然都是现实的，而且都有主体的表现，不象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未表现出来的。

生产的社会化是一种潜在的利益，而这种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是无法通过私有制本身加以表现的。可以说，它没有代表者。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益主体之间都是这种共同利益明确无误的表现者和代表的一方。当然，资本主义制度下也有很多政府干预、产业政策等等，代表了一些共同利益，但是不能与社会主义制度相比。资本主义的政府干预实质上是缓解矛盾的干预，或者是对现有利益主体、对一个个垄断集团之间进行某种协调，而不是代表社会整体的长远利益。

**71、利益均衡在两种制度下参照系明显不同** 均衡问题不光是一个总量平衡问题，还有社会均衡问题。社会均衡就是利

益均衡。我们可以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平均利润率，来使社会最后达到均衡，这种均衡当然是一种过剩的均衡，通常它是以一个参数作为均衡的标志，即，社会集团之间的平均利润率大致相等。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也有一个类似的参数，这个参数可以概括为利益的均衡和摩擦系数最小。这个参数导致的最后结果是一种“紧运行”状态。因为利益的均衡和供求平衡的焦点不一致，不可能重合，这样人们就不可能看到平均利润率最终带来资源的最优配置；反之亦然，摩擦系数最小的利益均衡，也不可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全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而人们往往把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基本平衡，看成是资源竞争的结果，看成是由于价格调节使利润达到均衡，利润均衡又满足资源最优配置，最后使社会总量达到平衡。实际上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凯恩斯在论证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时，后期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根本就没有实现均衡，他放弃了那种实现均衡的想法，他的一切努力不过是想办法改善一下资本主义社会中长期存在的过度的不均衡。

**72、存在着利益主体就要有交换** 市场问题跟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存在利益主体这个现实有直接关系。传统意义上的交换，是以个体利益为支点的利益主体之间的交换；在公有制下，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就某种程度上讲，又不完全象传统市场那样是相互独立的利益关系；换句话说，公有制下利益主体之间有利益一致的一面。

在私有制下，利益主体的界限非常清楚，你的不是我的，我的不是你的，我在市场多占一份，你在市场上就少占一份。这就是利益主体在私有制下的基本特征。

在公有制下，企业的基本利益也要在交换中实现，舍此没有

其它实现的渠道。如果不在这个渠道中实现它的利益，那么企业的一切利益就失去再生产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分析，企业具有被迫交换的因素，这种交换与资本主义的市场交换有类似之点。就是说，你不交换就无法生存，这跟资本主义交换是相同的，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分工以后不得不交换。

**73、公有制下利益主体的交换在各层之间传导** 在公有制下，利益主体的交换目的有各种层次之间的传导，某一层次的利益主体可以要求下一层的利益成为超主体的。比如，一个县政府，以利润为导向，它为了最大限度地取得利润收入，对所辖企业采取工厂对车间的办法，不考虑企业本身利益的最大好处，只考虑我这个县的财政收入，于是在一个县内采取工厂之间的配套产品交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是一种很典型的交换。就上级利益对下级利益讲，上级的利润导向可以不是下级的利润导向；下级不服从这种交换，工厂的工资就实现不了，整个工厂的再生产过程就无法实现，实现工厂自身利益的基本条件也可能丧失。县里对付下面的主意多着呢，你无论如何跳不出这个“如来佛”的掌心。县里说了，你这个工厂当初还是我给你投的资，我给你贷的款，给你跑的项目，才建起来；你现在想不服从县里的利益，那怎么得了。一句话，企业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所以，我说“紧运行”下的这种交换。如果只局限在每个交换的主体，它还具有某种独立意义；如果从交换主体之间交换目的的传导层次看，交换主体不一定能有完全独立的利益。现在人们总是希望企业完全独立，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彻底独立自主地发展。哪有那么回事？大量事实可以证明，没有地方政府，你绝对摆弄不起来；没有各级政府给你创造条件，你绝对转不动。

**74、利益主体分层化导致结构性矛盾尖锐** 在我国，由于有分层的利益和分层的决策，就使总量短缺状况下的结构性矛盾

尖锐化了。这种矛盾主要出现在具有利润导向的利益主体上。如果利润导向的利益主体是工业企业，就会表现为工业上的重复投资；如果利润导向的利益主体是地方政府，就会表现在地方之间大量的重复建设。这种分层的利益和分层的决策，造成了生产增长的相对无政府状态，使有些产品在市场上出现了过剩。当然这种过剩是相对的，主要是中低档产品；高档产品仍然很短缺。凡是利润导向的效果比较明显，容易实现生产要素重组的产品，很快就成为积压或过剩的产品；反之，却很难消除严重的短缺，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所以有人说，中国的短缺很严重，同时过剩也很严重。这种情况不能用计划人员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低来解释。如果我们没有回答为什么中国的滞存过剩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严重，那么就没有讲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特点。在中国，利益主体分层化比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明显。在发达一些的社会主义国家，利益层次少，社会透明度增高；在落后的社会主义小国，也很难形成多层次利益主体。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利益主体分层化的特点最突出。

**75、地方政府的特殊作用**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个利益主体之间仍然存在着非常尖锐的矛盾，这些矛盾是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有时矛盾很尖锐，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有时也很尖锐，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矛盾也很尖锐，中央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矛盾同样尖锐，还有和消费者的矛盾尖锐等等，各部门之间都有矛盾的一面，同时又都有利益统一的一面。把这些利益的矛盾和利益的统一分析清楚，会对前面所说的基本状况有更好的解释。

我觉得可以结合政府行为、企业行为把利益主体问题很好地分析一下。中央政府承担的责任和它的基本目的，就导致它

的行为。在现在的结构中,双方之间的矛盾和协调,既是利益的协调,又是紧运行的现状。之所以必须有地方政府这一级利益主体,就是因为地方政府承担着中央所不能承担的事情。改善群众生活的最直接要求,不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承担,而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群众这方面的要求,是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反映到中央政府的。这是利益上统一的一面,统一的一面能反映上去。而矛盾的一面,则导致利益主体的分层,各层主体分别承担不同范围的利益。在这些利益主体之间,又表现出新的矛盾。地方政府行为为什么受利润导向规律支配?因为利润导向最终解决地方福利的最大化。地方经济的最终目的是福利最大化。地方收入的最大化,是为了最快地脱贫致富。现在大家都在喊这个口号,这是不可遏制的潮流。

地方政府是以利润为导向的,它不管你是长线还是短线,也不看整个市场的综合状况,它只看利润。由于地方政府利润导向,导致重复投资。广东省搞洗衣机,营口市也搞洗衣机,甘肃省也搞洗衣机,导致洗衣机的市场饱和,而且过剩很多,这就是地方政府的行为。利润导向是这种资源配置最直接的动机。

在中国,地方政府成为利益主体不是局部的现象,而是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存在的现状。这是中国经济运行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于苏联的基本方面。地方政府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有它独立的经济利益。这与中国历史有相联系的一面,但现在主要表现在经济上。

**76、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摩擦是必然的** 在中国,资源配置,市场配置或计划配置,很难说有一个逻辑的、规范的界限或结合点。在现实工作当中,这个结合点是通过摩擦和不同利益冲突来实现的。中央政府说,没有外汇,没有进口原材料,消费基金失控,等等,你们(指地方政府)是不是少搞一些项目?地方

政府说,我们要有一定的财政收入。如果这也干不了,那也干不了,就会影响中央的税收。双方出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讨价还价,这种摩擦和矛盾是广泛的,无所不在的。所以,在这种状态下的资源配置,出现大面积的重合。

中央政府必须在很广泛的领域里牵制地方政府。它要上洗衣机,你就不让它上,因为上了以后,你就不得不帮助地方解决外汇,解决能源,解决原材料。所以,各层利益之间不是按照一定规范确定相互关系的。冷静、客观地讲,即使到了地方政府的行为相当规范化以后,这种摩擦也是依然存在的。因为利益本身决定,摩擦是必然的,是基本的经济现象。

**77、在紧运行状态下实现利益之间的均衡** 另外,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推动力,从利益主体讲,对它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弊端,也要说一说。这样可以找出一个新的看法,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它由一个一个完全独立的企业利益,在市场上形成平均利润率,实现它的市场欲望。在公有制下,经济运行的过程最终也导致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怎么度量呢?好象摩擦系数最小,可以稳定在一个均衡状态。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运行的一种均衡。但是这种均衡绝不意味着在资源配置上都是合理的。这是一种紧运行状态下形成的利益均衡。

在资本主义运行中也要实现资本的**利益均衡**,资本主义的利益均衡是通过平均利润率或金融的办法获得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利益均衡不光是价格和利润,还包括其它方面。这种利益均衡导致紧运行状态。运行的平衡和利益的均衡是两个概念。原来人们认为平均利润率能导致市场导向的资源分配,最后导致合理的配置。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这只会出现过剩的局面。

我们这里存在的是公有制下的利益均衡,结果导致的是紧

运行下的均衡。科尔内说短缺、过剩都可以导致均衡,我们则要进一步分析,均衡在什么上。我们和科尔内的区别不仅是在宏观和微观的区别上,而且在两国的起点和现状根本不同上。我们有的问题可以借鉴科尔内的成果,有的则要根据我们自己的状况来分析。从这点出发,还要研究调节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矛盾的手段是什么?是否能拉动供给或抑制需求等等问题。

78、利益主体和人的问题的关系 在许多问题上都可以找到人的问题的踪迹。在我们的整个课题研究中,这似乎是一个最深层领域的问题。它不完全是经济问题,而是哲学、社会、历史,经济这几个方面结合部上的一个问题。

对人的分析是我们应达到的最深一层的领域。我们研究的层次越深入,客观上达到的覆盖面也就越宽,穿透现实的辐射力也就越强。马克思所说的“全面发展的人”,是在一种充分社会化、现代化的经济中才能实现的人,而不是在一个低层次生产力水平上能够实现的。所以,我们对现在公有制环境下人的异化,也可以作一些分析。

在自然经济中,人的需求的实现是与他的生产的实现紧密相连的;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个人的需求则总是与社会需求紧密联系,是整个社会需求中富有个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个人的供给也成为全社会千万个富有个性的供给中的一部分。在自然经济社会中,个人需求与供给的统一表现为人力与自然力之间的和谐,或者说表现为在个人改造自然能力限制下的统一,两者都源于此。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由于分工和协作、需求与供给都成为只有在更大的范围内,才能相互联系和可能协调的因素。个人需求的产生摆脱了个体生产能力的约束,而来源于受整个社会消费活动的启发、示范和刺激。同时,个人的生产并不直接与个人消费结合,而成为社会生产的分子。在资本主义经济中,

个人需求和供给的发生都受到私有制的严格限制。需求的内容和规模只是个人资产规模的消费表现。个人需求与生产的实现，都表现为个人资产的社会实现。社会主义制度是对于人的需求与生产受私有制束缚和决定的解放。个人的需求不再受到私有制的约束，而是同个人的劳动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建设、经济发展形势相联系。在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人的需求与生产在高度社会化的基础上，实现了内在的统一。所谓内在的统一，就是说，它不是由需求和生产内容之外的因素所决定的统一，而是由需求和生产的内容本身统一的。在那种状态下，人的实现，精神的实现与物质的实现，作为需求行为的实现和作为供给行为的实现，消费的实现与成就的实现都内在地和谐地统一起来。但是，在我们目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以后的发展中阶段甚至发达阶段，当生产力水平还未充分发达，社会化水平还不高，物质和精神财富尚未充分丰富的情况下，人的实现，在需求和生产两方面，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在消费和成就两方面都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自发地表现为需求的膨胀和相对于生产的超前增长。这种本源性的不平衡因素，通过多种决策层次、体制和多种利益主体，通过各种责任制和经济运行机制丰富多采地表现出来。这种不平衡即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源源动力，又是经济运行出现波动的因素。社会主义不能通过私有制的约束来消除这种不平衡，而只能是通过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强宏观经济管理，控制和协调这种不平衡，并且引导人们的实现向着平衡的、与社会总体利益更为一致的、精神和物质内容更为丰富和高尚的方向发展。

## 九、紧运行的成因

79、**要对紧运行成因作逻辑和历史的分析** 紧运行的成因问题是大家都关心的。紧运行是一种现实,以前若明若暗,现在大家都承认它是一种现实。成因到底是什么?应该按不同层次作逻辑和历史的分析。历史原因中往往含有合理的一面,必然性的一面。必然性里面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这都是在必然性展开以后才能出现的。这需要运用一些哲学、逻辑学的分析方法的来展开分析。

紧运行的成因,有一次性的成因(所谓第一推动力下的紧运行),还有它不断再生的内在原因。要把紧运行是怎样不断再生出来的原因说清楚。因为科尔内只谈了预算约束软化,只讲了企业对于外部环境这层关系,用这些来解释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紧运行不断循环和再生的过程,就显得很单薄,很不够了。

80、**公有制在紧运行成因诸要素中占重要位置** 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呈现紧运行的特征取决于很多原因。在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历史时期,原因也会有所不同。其中有主观上决策失误,方针、政策上失误的原因;有在社会主义初创和探索过程中,体制上不可避免的不成熟、不完善的原因;有由于没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水平的提高而及时地相应改革体制的原因;有宏观经济管理在摸索、尝试中难免的“代价”;还有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影响的作用等。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样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所带来的必然性。

对紧运行的另一种理论表述,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资源,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也就是说,是一种需求超前增长(需求拉动,需求膨胀)并受到资源约束的经济运行。社会主义经济正是依靠这种紧运行而达到了资源的最大限度的利用和

平衡。可以有实现不了的需求，但不能没有被分配和利用的资源，是这种运行的原则。尽管在微观上存在着浪费，但至少从宏观经济管理角度看是这样的。这种以资源最大限度利用为特征的资源平衡方式，与以资本取得最大利益为原则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各社会主义国家都具有紧运行的特征，不是因为政策上有着相同或相似的选择，而是由公有制这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所决定的。公有制具体形式的变化，可以改善紧运行的强度，缓和短缺，但不可能完全消除紧运行状态。社会主义经济的紧运行，是与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源不能充分利用，经济运行受有效需求不足的约束相对应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有时也出现相对“短缺”及由此而来的通货膨胀。但这种需求增长是偏离它稳定状态的暂时现象，是他们的政府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长期趋势中，采取创造和刺激社会需求的政策及对企业投资需求的振兴政策带来的短期效应和现象。

81、从历史发展角度认识制度因素 制度因素和经济发展阶段是相互作用、相互连接的，如果把它展开分析，显然这个制度应包含相应的历史因素。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又是统一的，过去采用的是高度集权的封建制度，对于粮食、造币等最重要的社会产品，都采取高度集中控制的办法，以维持国家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又是不断地以各地方诸侯割据为补充的，割据导致统一的颠覆，然后又出现新的集中统一。

这样的历史演变过程，在现实中也有它的影象，那就是各地方经济的发展对全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原来政治上的割据完全是负作用，现在变成各地方的经济发展都趋于社会化，最终导致全国经济的统一。但在目前发展水平很低的阶段，又相当程度地再现了那种割据的局面。

82、需要在分析所有制基础上对运行成因做深层解剖 我

们讲的所有制离不开一定的政治制度。对于一个经济还比较落后的国家来说,以所有权来划分运行成因,还难以概括经济活动整体的全部现象。所有制的成熟最终并不导致一种理想意境,所有制的作用最终是有限的。因而不能说,依靠所有制的成熟,就可以实现非常有效的资源配置和运行状态。不能把包治百病的药方都塞在所有制里。只分析所有制因素还不行,还需要在另外的层次上做深入分析。生产力是一个综合的表现,而所有制只是其中的一个框架。它可以导致某种趋势,在这种趋势上,人们可以进一步去完善,但不可能再改变这种趋势。一种趋势是私有制的趋势,它导致了一系列高层次的生产关系对整个运行层次的影响。另一种趋势是公有制的趋势,它也会最终映射到运行层次中,在每个地方都有它的痕迹和影响。所有制是决定趋势的,运行层次是宏观的总状态,总的状态往往也是一种趋势性的表现,如需求膨胀的趋势或需求抑制的趋势。这种趋势的缓解和完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所有制的完善,但是最终要依赖于所有制以外的东西。制度层次在运行成因分析中是个基础,在制度因素影响下,会对运行的一系列链条起作用,使其改变颜色,改变方向,最终形成总的运行状态。

83、**要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紧运行的关系** 再有,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最近开始活跃起来,报刊上这类问题的文章也开始多起来。这也是当前改革反思提出来的一个问题。看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实具有一系列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特征。初级阶段,替代战略不可避免;初级阶段,商品生产不可避免;初级阶段,“紧运行”和“短缺”不可避免;初级阶段,市场发育不可能那么完善,等等。但是,应该明确,讨论初级阶段不是把所有问题都装在筐里,就算完事了。而是希望大家对初级阶段和“紧运行”内在的关系做出进一

步的分析。因为，对中国来说，是初级阶段问题；对于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变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又是另外一种情况。这两种类型国家作为历史的不同阶段，在现实的空间都同时存在。所以，还可以对这个问题做一些对比分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间很长，区间目前难以判断。但是不是初级阶段过去后，紧运行就消除了？从社会主义的现实来看，民主德国比较发达，但还是紧运行；匈牙利等国家引入了市场经济，也还是紧运行。所以，需要说明社会主义内在的倾向性。过去苏联搞指令性计划时存在短缺，现在大量引入市场机制，但很快就为需求服务。南斯拉夫今年通货膨胀率为100%，去年是80%。计划、市场这两种手段都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环境条件，不能把科技进步完成归为买方市场。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是靠战争，掠夺殖民地，不是靠市场。两次世界大战，使这条路走不通了。现在西德不追求市场扩大，只要做到市场不减少，就可以达到每年增长6%。美国在二次大战后也有很大变化，随着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经济的发展，初级产品充斥市场，美国就转而占领高技术市场；美元成为世界货币，从凯恩斯财政政策，走向高技术，并不是买方市场的结果。买方市场亚当·斯密时就有，科技进步既不能归结为私有制的优越性，也不能归结为买方市场。我们的希望是通过改革最后过渡到比较宽松的环境，市场机制更多地发挥作用，减少政府无效干预；但我们认为全面买方市场离现实较远，所以在紧张中得到更好的发展比较现实，但绝没有越紧越好的意思。至于紧运行什么时候可以消除，现在很难说清楚。就是将来很发达时，也很难达到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资本主义是宏观松，微观紧；我们是宏观紧，微观有松有紧，紧的是两头。我们就是想分析描述这种状况。解放初，主要是农产品紧，现在紧在工业资源上。高级阶段情况如何，现

在还很难作出逻辑推测，怎样实现宏观、微观都不浪费资源，现在的研究还不好涉及。全社会如何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是基本的出发点；但怎么实现，中国会有很多阶段性特征，一下子还说不清。到共产主义是不是还紧？现在还不好说，但总的应该是资源更合理的利用，显然不会象现在这样紧运行。现在说初级阶段，但终点一端是开区间，没有界定，现在也很难界定，我们讨论中也感到很难。

84、确立经济发展的赶超目标有其必然性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最大的区别在于，地方政府是利润导向，它采取的所有方法也是紧运行下的“条条专政”。所谓市带县也好，其他也好，利润导向的结果，使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都追求福利的最大化，而中央政府现在显然不是纯利润导向。

从长远来看，中央政府的赶超目标有其必然性。要赶超发达国家，这是所有落后国家都想做的事情，只是有些国家想做，但现在又做不了；也有些国家是在与英、美差距不大情况下赶超的，比如说战后的西德、日本。再有就是两种制度的赶超，如，苏联要求超过资本主义制度，中国要求发展起来，超过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制度性赶超的要求是强烈的，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走过了头。但不能说这种动因是无稽之谈，因为它的基本动因是合理的，只不过合理的东西在实现时有合理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过份了。

社会主义要超过资本主义，这是基本的出发点，很难说这个基本出发点有什么错误。原来战略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只是对实现目标的追求过快了。象过去毛主席讲要打持久战，蒋介石要打速决战，要打这点是好的嘛！但是目标显然不合理，会导致剧烈的震荡，问题是严重的。所以，应该改变过去追求高产值、高速度、低技术水平的发展。

地方政府的赶超目标在于相邻和相近省、市，在于利润，而并不在于技术。对于地方政府，资源和技术的赶超是中央的责任。因此，赶超的任务主要由国家，由中央各部承担。实际上，赶超就是国际上国家经济之间的竞争。目前，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赶超过程中地方政府有退出第一线的趋势。但这个趋势受紧运行影响，演变的速度不够快。特别在经济发展的新领域里，象乡镇企业、新产业部门、还离不开政府的制约。一种经济从无到有，行政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没有市场时，只有依靠非经济因素才能建立起这个结构，这个结构才能运转。它一旦转起来，并到了相当的程度，政府部门就可能退出直接管理的第一线。至于政府能不能退出直接投资的领域，就很难说了，因为这和紧运行的条件有关。

85、赶超战略下的“镶嵌经济” “镶嵌经济”是我国经济状况极突出的特点，这是“赶超经济”的一种形式。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只有国家能感到来自国际、国内赶超发达国家的压力，一开始只能集中全国的力量建设工业化的基础。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建设现代化经济，会遇到天然的资源短缺状态，和与之不相适应的自然经济基础的约束，因此只能采取“镶嵌”的方式，即不是在自然经济上以简单增殖的方式建设新项目，而是在自然经济基础上，以投资为形式，建设形成一个完整的现代经济（独立的物资供给和销售系统，独立的信息和技术交流系统和生产保证体系），所以这样做是不可避免的。从“一五”时期的156个项目到现在的三千多大中型企业，这决定了我国的基本经济结构，在高层次上形成了我国的现代化经济结构。当然，中央的这种干预，又是引起中央和地方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紧运行下，中央不得不向地方征收财力，只能保证地方的经济在一个下限下运行。中央拿走的财力，在资源所在地、战略要地上镶嵌了现代

工业。这些都来不及等待当地从自然经济中自发地缓慢地形成现代经济的条件和现代工业的要求后，再自发地形成这些现代工业的骨干。实际上，地方工业的骨干企业也是采取“镶嵌”办法，由地方政府集中资源和财力建立起来的。美国和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就没有这种发展形式。中央和地方一方面有矛盾，另一方面地方也得到了各种好处。“镶嵌”项目不仅给地方带来了投资和附属设施的建设（如：学校、商店、医院、住宅），为本地项目的发展带来了原材料，环境条件（如：公路、铁路、通信）上的基础条件，而且对于地区技术水平的提高，获得经济发展商业和地区经济的工业化、现代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中央与地方在这个方面的矛盾集中表现为：地方尽可能地减少中央集中部分，而尽可能多地争取“镶嵌”项目。中央要建设现代化工业，就必须集中使用财力，这又会增强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在地区经济实力相差悬殊时，只有物资串换能突破区域封锁。如果按市场价格进行交换，落后地区只能吃亏。所以“块块”对企业的作用还是必要的。地方政府拿短线物资去串换，可以缓解地方工业资源和生活消费品短缺的状况。如果地方政府不这样，在紧运行下，地方工业的发展就有困难，中央在地方的企业日子也不好过，尤其在落后地区镶嵌的中央企业，会更困难。可见，商品经济的统一市场决不是简单消除行政办法就能形成的。现在人们给经济改革开了不少药方，有的说“块块”不要管经济，只管基础结构和人民生活。这种意见离中国的实际差十万八千里。总之，各级政府担当的角色不同，行为也不同。

## **十、这项课题研究的目的是、意义和基本方法**

86、对社会主义的实践要不断地再认识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述，与现实有一定距离。最早的理论认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列宁走了第一步，斯大林走了第二步，现在我们又在往前走，这就是不断的探索，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

对于社会主义，人们是在实践中逐步认识的。毛主席搞农村公社化时，是真心地认为，只要一集体化，就能焕发出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当时不只毛主席相信，其他人也相信，谁都相信。苏联曾提出发达的社会主义，成熟的社会主义，现在叫做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也是一步步地认识过来的。战时共产主义取消货币，就含有空想共产主义的因素，真有人相信；连列宁自己都相信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但是，后来列宁很快转过弯来，接着实行了新经济政策。这些情况表明，人们对社会主义实践是不断地再认识，然后对原来理论中过激的预测不断加以修正，不断把它们摆到现实的基础上。

**87、研究经济运行需要运用历史的方法** 我们要把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的形成过程看成是一部历史。布鲁斯也好，奥塔·锡克也好，都包括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现在比较起来，布鲁斯，奥塔·锡克，还有波兰的兰格，在这个问题上概念色彩相当浓，现实色彩差。他们从概念出发，象马克思参加过的青年黑格尔派，从宗教改革中汲取力量，理论探索上都玄得很。理论研究还是要有现实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不能对那种理论探索评价太高，不要过多地从那时候形成的概念出发，要从现在已经形成的现状分析，回过头对历史重新了解，要注意历史的连续性。黑格尔哲学有很强的历史感，我们对社会主义实践，也应有历史的分析，而不应是简单的横断面比较，应从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建立和发展的实践过程分析。断面分析的方法会被认为没有抓住历史的根源。

88、由于某些主客观原因，已有的运行理论落后于发展变化着的实践 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从马克思主义产生，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以后，正面地把它作为一个对象进行理论研究的时间还不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很长时间内，大家主要还是从现在称为规范理论的角度上，考虑得较多。这也不奇怪，因为一个新社会制度从无到有建立的时候，主要是通过批判旧社会的批判形成的。它的内在的历史逻辑，是在旧社会必然灭亡的逻辑中产生的，它产生之后将逐渐展开自己的运行机制，要在一段时间内才能表现出自己的特点；人们对它的认识要在它表现出来之后，再过一段时间才能有所突破，这也是很自然的。我们这个题目，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理论工作者中，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它进行研究的时间还比较短。理论上讲，这个领域的成果还是比较单薄的。作为现实的说明，作为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改革措施，提出的依据都显得很不足。存在这种情况并不奇怪，有历史的原因，也包含了我们主观上的原因。

89、要努力改变经济理论不适应时代要求的现状 我们对历史过程的认识必须不断深化，同时还必须解决一个方法问题，也就是用什么方法研究经济问题。现在我们考虑这个问题时，已经与过去有很大不同，特别是1978年以来，更多的是从管理和发展的角度，从完善与建设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社会主义经济建立和初创的角度来考虑。对于这个问题，已经到了把它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来加以完善的阶段，就是说，到了从破坏旧世界、建立新世界阶段向完善与建设阶段的转变。要尽快完成这一转变，就必须提出区别和超出前人的理论。现在单薄的理论很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其中很尖锐的矛盾表现在当前改革提出的很多问题，我们在理论上却难以回答。现在的好处是大家思

想活跃,提出很多新看法,缺点是这些看法缺乏内在的逻辑性和系统性。我们要逐步在这方面加强工作,为改革提供强有力的工具和武器,使我们的工作不断克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现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理论研究还没有几家,而且也并不系统。为尽快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这项课题研究偏重于描述和解释中国的经济运行机制,但我相信,研究成果的意义会超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这就象马克思研究英国的经济,其结论不仅限于英国;研究法国的政治体制,其结论也不仅限于法国一样。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发生了200多年之后,在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之后,终于产生了凯恩斯学说这样讲清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客观矛盾和规律的成果。凯恩斯学说的价值不在于它在内容上的“函数推论”,也不在于它所开的药方,而是它对运行矛盾,自发性倾向的分析和结论。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历史验证了这种理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已经30年了,从历史条件看,产生成熟的宏观经济运行理论还有困难。但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提出了产生这种理论的要求。这也是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90、运行研究是一项难度很大、周期性很长的工作** 一些同志长期以来感到,凭经验做了不少事情,但是缺少能够说明经验的合适工具。现成的工具中,可用以借鉴的成果又不多,所以,目前的这项研究难度很大,不可能一次取得很大成功。这种在历史和空间上跨度都很大的课题,必须长期坚持下去,做不间断的研究。在现阶段,要从实证的角度,从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深入地做一些理论探索工作,使整个研究过程不因过多的、理论上的跳跃而埋下一些失败的种子。在研究过程中可能会有反复,但只要我们的工作扎实,脚踏实地,就有希望取得具有较高质

量的研究成果。当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可能根本舍去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不可能离开对现实作实证性描述。

**91、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开展这项研究** 这项课题题目大,难度大,现实又很丰富。因此,在研究过程中要注意紧密配合和相互间的协调一致。科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已经摆脱了个体劳动阶段,也就是说仅仅依靠一、两个人,已不可能作出很全面的、合理的概括。正象现在的经济发展一样,社会科学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它的社会性、整体性和民主性。任何研究成果的科学性,都要通过它的社会性、民主性来体现。只要大家协调一致,组织力量,形成社会化的、协调的、统一的整体,就能把这项研究扎实地推向前进,从而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特别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作出有价值的理论分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工具。

**92、理论研究要紧密联系实际变化** 在我们的研究中既要解放思想,以理服人,同时又要紧紧扣住现实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变化,将这些变化及时地反映和吸收进去。对改革中新出现的一些变化,如企业股份制的尝试,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促使管理走向更高水平,逐步摆脱低层次行政化运行等,要把这些变化特点深刻地反映到我们的研究成果中来。也可以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更多地吸引实际工作者关注和参加,使更多的同志认识到这项研究的重要性。

**93、研究成果要真正做到以理服人**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由于大家都处在刚刚起步阶段,希望能够充分解放思想,畅所欲言。有很多同志希望在研究中形成较系统的看法,希望对整个研究提出有价值的见解并作出贡献。但我想强调一

下,要做到对现实有深刻的内在逻辑的描述,而且有很强的说服力,就一定要在材料的加工和分析上下功夫,真正做到以理服人。这个“理”就是描述现实,同时在逻辑上要有很强的一致性,这是很不容易达到的标准。许多搞研究的同志,过去做了很多工作,是很有意义的;但也有一些人总是把规范理论套用到当前现象之中,这就难以使大家对现实有准确了解。因此,在坚持解放思想的同时,一定要在逻辑分析上下功夫,要继承马克思主义强有力的理论分析的传统,使我们对当前现实的分析具有充分的论据和逻辑力量。

**94、实证性是这项课题研究的基本方法** 根据我们的理解,实证性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具体地说,实证性的研究方法还包括以下含义:

(一)、强调实证性只是意味着不准备过早回答(而并非不准备回答)我国经济运行“应该怎样”这类问题。因为在实事求是地搞清楚我国经济运行到底“是什么”和“为什么”这类问题之前,不可能对“应该怎样”作出准确的判断。而要搞清楚“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就必须借助实证性的研究方法,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和充分占有材料,在丰富的感性认识和客观分析基础上,得出实证性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只要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有关“应该怎样”的问题解答也就包含在其中,或者呼之欲出了。

(二)、强调实证性,并不意味着可以排斥规范性或价值判断。实证性和规范性从来就不是截然对立的,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一方面,实证性是规范性的基础,实证研究可以促进规范研究的深化;另一方面,在实证研究中也包含一定程度的规范研究。比如说,在对经济运行机制及其演化的历史进程进行实证分析时,必须充分利用前人已有的规范性结论,同时不

断抓住历史进程中带有规律性的主要线索，及时作出必要的价值判断，以指导下一阶段的实证研究，逐步形成基本的理论框架。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历史性的实证研究方法，它同单纯的现象罗列式的描述有本质的区别，也可以避免理论联系实际的庸俗化倾向。

95、在研究中作“病理”分析比开“药方”更有意义 这项课题研究并不是政策性的建议或方案，而仅仅是一种初步的、但却是企图深入进行的分析。如果可以把提出方案的建议比作明确的诊断和开出药方，那么，这项研究只是作了些病理分析，希望从更深的层次，找出病理的机制，从而对现存的各种经济现象，找到一种更加富有内在统一性的病理方面的原因，为正确地诊断和开药方提供些依据。当然，提方案和分析各有各的作用，不可互相取代。现实的改革不可能等待完美无缺的方案提出后才前进，但改革造成了千载难逢的体制动态演变的机会，使一切有志于改革和加快社会主义体制成熟的人，能以前所未有的广泛角度和深入程度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而为加快这个历史进程做出努力。这也是我们的愿望，这可能比看到一些弊病就急于开药方更困难些，但也更有意义些。

96、“病理”分析必须透过表象，深入本质 在研究中我们始终认为，当前的体制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在它们种种的表象之下，存在一种深层的结构，不断地再生出或变形地产生出相似的现象。如果不透过现象，抓住这些深层次的线索，将使改革不断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

正象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从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开始的一样，我们的经济体制也是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不可逾越的阶段中形成和发展的。它本身必然带有落后生产力的色彩，也不可避免地长期处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所

导致的体制摩擦中。从私有制向公有制转变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结束体制的摩擦、演进，而是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展现出公有制在初级阶段的种种不可避免的矛盾运动，和内在的制度演进的规律。必须认识这种现实的矛盾运动和矛盾转化。体制的弊端作为体制矛盾的表现形式，必然有它发生、发展、消除的历史进程，有它从历史地存在的理由及其向历史的否定转化的质变点。如果不搞清它存在和生成的理由，就不可能清楚它被清除的理由，也就不会搞清楚它被消除的历史原因，历史力量，以及途径和方法。

**97、要做一个清醒的改革者** 当前改革深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要求我们从习惯于充满理想和热情的改革热潮中，进入冷静的、客观的、历史的思索和分析，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冷静的和科学的改革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的科学方法，应该成为深刻剖析经济体制的武器，使理论的思索，不但有改革的巨大空间感，而且更具有宏伟的历史感。

改革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在矛盾及其所产生的体制，不但是改革所必须面对的对象，同时也是改革必须面对的环境。只要这个阶段没结束，改革就总会面对初级阶段的公有制，不断再生出新的矛盾，矛盾的长期性决定了改革的长期性。

冷静和客观地对待公有制从不成熟向成熟过渡，并不意味着固守旧有的体制模式不变，更不意味着对公有制的否定，而是要更科学地认识旧体制为新体制取代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的长期性，从而更坚定长期改革的信心。有一些好心的同志，充满理想色彩，看到紧运行这样一种现实的描述，感到和理想的运行机制距离较远，感到难以接受。对这些同志，我们只想简单地指出，承认紧运行这种现实，并不意味着企图恢复初创时期幼稚的

实物型产品经济；简单的点式倾斜的产业政策，如以钢为纲等不会再现了，历史不会倒退。整个经济在利益多元化基础上的商品化是不可逆转的；但要冷静地注意到，紧运行走过了它的实物经济阶段，更多地表现为价值、商品、货币的形态，只不过是紧运行的新阶段。盛开商品经济鲜花的大树上，不可避免要继续存在着货币形态的总需求膨胀，在树下仍深深地扎着短线制约的基础根系。它成为整个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柱。同时，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逐渐发育的由点到面的倾斜的产业政策，推动经济跨越平均利润率有限的倾斜度和盲目性，也成为市场机制成熟的基础支柱。这种形式的紧运行，是我们不得不长期面对的现实，紧运行的矛盾运动，仍然会是改革的环境和对象。

我们衷心希望，这项研究能够引起广泛的讨论，只有在这种深入地分析和讨论之中，改革的理论才能在现实的基础上，大踏步地前进，从而为改革的顺利进行开辟道路。

#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研究的思考<sup>①</sup>

## 一、关于紧运行的状态

从供求总量不平衡与供求结构不对称的关系来看，还不能说它们是正交的。总量与结构的关系是我们整个研究在理论上的一个难点，二者的关系到底怎么表述。邓英淘、罗小朋的文章<sup>②</sup>中一个突出的观点，就是认为在我们现实的情况下光讲总量不行，但他们把这个问题推到总量毫无意义的角度，把总量的作用完全抹煞了。讲结构这方面他们有新意，但对结构与总量的关系问题没有讲清。结构问题在我们这里有与资本主义经济不同的含义，有它的重要性，这层意思怎么表述？你可以说它是一个骨节的关系，但很难用几何图形表述。

将紧运行划分为紧运行 A 与紧运行 B，即总需求略大于总供给和总需求过大于总供给两种状态是有利的。总需求略大，过大于总供给，实际还是指静态。从时间上来看，总是保持紧运行状态。实际上，有时刚刚超过有效供给整个经济运行就不太灵了，有时却是有效供给和滞存一块都超出了，即超出了现实供

---

① 此文写于 1987 年 11 月

② 见于《经济研究》1987 年第 6 期。

给；有效供给与结构关系密切，加滞存就成为总量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有效供给的直接作用更明显。在现实供给的圈内，是紧运行 A 的区间，超出这个圈即是紧运行 B，进入震荡状态。这是讲总量关系一。总量是从货币可加，货币可加是从时间可加来的。实际上是有效供给控制现实供给。现实供给与有效供给越接近，经济发展的弹性范围就越宽，容限就越大。现实运行中的很多情况是超出有效供给就已经紧了。现在钢库存三千万吨，我们对钢的总需求可能并没超出这个数量，每年进口钢材二千万吨，都是钢板，而现在库存的三千万吨都是钢筋、钢锭。就是说，在有效供给被超出后，它就开始紧了，因为最终形成的供给是有效供给。如果用两个量来说，矢量越重合越好，越拉开、到完全垂直可能是相当难的时候。咱们现在粮食总的说是紧的，即使有点储备，也没什么滞存，没有太大的余地，但确实有一些别的东西上存在刚才说的情况，在结构上够不着的地方，结构的边界就是紧的边界了。

紧运行 A 与紧运行 B 的过渡期可能是关键所在。在有效供给的范围内，与西方经济学是一样的，总量与结构的关系是清楚的、一致的；完全超出可能供给之外，也是清楚的。文章就出在中间这一段，总量与结构有多种可能的组合。过渡期不能说既不是紧运行 A，又不是紧运行 B，而是 A、B 都可能在里头。超过了可能供给那绝对是紧运行 B。紧运行 B 是从超出可能供给开始，还是在这之前就有可能出现？超出可能供给是绝对震荡区，把所有设备开足了还不够。

紧运行状态下的滞存，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引起的，往往是由于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原因导致的。实际中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越紧时滞存越多、越厉害，最后被某一个结构上的短线制约，其余都变成长线，都趴下了。我们是从原材料开始，一直向

制成品传导的滞存，由于基础一端的滞存，导致一系列的滞存；资本主义的滞存是从另一端过来的，即由于产品滞存，导致生产能力的滞存。这里有一个制约导向的变化。这种互相制约的关系，说明供给状况与滞存的关系很大。在紧运行 B 时，滞存是相当大的，比紧运行 A 时可能扩大。总量与结构是相关的，因此需要给予多维的表示。有效供给取决于结构，同时又构成一个总量，在有效含义上构成总量。对紧运行 A 如何评价的问题，人们是很敏感的。在张晓光和一些人的分析中，经常作为对比的是西德、日本战后的发展，还有苏联的发展。实际上，这些国家是在打烂了以后再重来一次，有些东西在发展中是很清楚的，它不会糊涂，做一些可笑的举动。我们是第一次工业化，过去只有沿海的上海等地有一点底子。俄国从彼得大帝统一后，向外开放、扩张、发展，工业变化是很大的；日本明治维新后，保留并依靠天皇制进行工业化；德国是依靠俾斯麦的统一，铁血政策，创立了一次工业化的环境。现在如果把把这个环境贬得一钱不值，认为越分散越好，那就是德国在统一之前和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状况。这个过程是个自然的过程。当时的日、德只是感觉到有发展的压力，但究竟怎么发展并不很清楚；那时的产业发展，是带有自发特点的，有政府的支持，如创造统一的环境等，有基本前提的变化。而战后的过程就很不相同了。如德国，1943 年艾哈德就在琢磨怎么恢复战后的德国经济，他那时就有相当成熟的一套东西。德国是已有了自己相当的基础，它的整个决策层次，思想界的构成，都已相当成熟了。希特勒只不过是在这个基础上又重新搅活了一次。所以，西德战后实际上是进行二次工业化和现代化，因此是清醒的。日本战后实行民主化，天皇变成了偶像，但在产业发展上继续保持政府对产业的支持，它在选择上也是相当清醒的，一开始就选择了重化工，然后又转到机

械工业,然后是一步跨到当时的先进水平;现在又选择信息业。它这几个选择是相当自觉的,统一的,没有什么自发的东西在里头。它们在选择时,是相当清楚的,理论上有什么凯恩斯这些人,经济发展上已有相当多的实践。选择不能脱离社会发展阶段,或者说是领导者的成熟程度。日本在战后表现出真正成熟了,不走弯路,不干傻事。德国战后也是这样,这个阶段是成熟的。它们在选择时一个是重视总量,一个是重视结构。离开这些,光是用刘易斯转变点等,很难说明这些问题。为什么德国战后有艾哈德,而在俾斯麦时期不会有这样一个人。因为他这样的人是在一定的环境里才能产生的。西德、日本不是一步登天,不是没有自然发展过程。单就发展来讲,离不开自己的历史,离不开这个国家统治阶级对社会认识的深刻程度,对经济认识和把握的深刻程度。战后的西德、日本在总量、结构上把握得是相当好的。西德与日本追求的目标不一样,它一度追求的不是世界领先的目标;有人说它没有选择信息业是决策失误,但从整个来说它的前沿产业都还是可以的,它的结构足以使它成为相当强的现代化国家。

苏联也有相似的特点。列宁一取得成功,就提出要实现全国电气化。斯大林也知道工业化的作用,知道第一部类要优先发展,在这个阶段上他没犯糊涂。只是到超过了帝俄的发展水平,需要追求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的新方向的时候,就不清醒了,因为超出了历史遗留给他们的遗产。对历史的东西,很难选一个时点,然后在空间上铺开,把不同的国家拿来比,说出谁那个模式最好。因为起点相差太多。在我们这里,从各利益主体的目标到综合目标的形成,就可看出历史和起点的差别。这个过程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是个很痛苦的历史过程。经过一定的发展过程,你这个综合目标才能比较有全局性,符合国家的



些东西？稳定不能概括成效率，稳定是最基础的，避免大的波动这一点大家都承认；经济稳定是个单独的目标，又是相当重要的、基本的目标，增长只能在稳定的限度之内。微观的问题不能回避，但我们要说明的是微观的问题只能在这个总的环境下解决，这个环境不能变；微观里有很多文章可做，但不能跳出这个环境。经济不稳定造成微观没法有效率。环境好了微观也有没效率的，北京手表厂环境挺好的，它早该转产、开发新产品了，但它不会，结果趴下了。这个问题不能完全归结为紧运行。紧运行下一是微观有很大文章可做，二是基本资源分配、流向不能跳出这个框子。所有的环节都是买方市场这个很难实现，但在既有买方，又有卖方的环境下，并不是效率问题就无所作为了，就必然效率很低。效率低是与我们起点低、素质低相联系的，不能完全归结为紧运行。很多人都是这么认识的，即每个人有效率，整个社会就是有效率的。现在美国人也是这么看，看每个人是不是都在玩命干。这两个有联系，但不能等同。每一个细胞都能无限膨胀、无限增殖，那就是癌了；给一错误的遗传信息，它拼命地长，超出一切约束。癌的最终原因就是失去平衡，最后导致崩溃。

需求中有一部分可能是既可用货币度量，但又不完全用货币度量。如平价材料，从财政来说，这个项目要的我全保了，你如拿到了材料，需求就能全部实现；但如果拿不到，就要再想别的办法。因此，在价值上很难完全反映它的需求。

紧运行与波动、周期有密切关系。我们要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但如果农产品这么涨价，过不了几年就回去了。有的人认为周期是正常的。如现在这个时期，大家都承认要紧缩，但还是增长得挺快，日子还过得去。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周期就挺好，周期不可避免；那最简单的结论就是现在的就是好的。从国外





预，不完全是资源争夺性质的，但从产业部往下，大体上带有争







的社会环境里,从一定的社会格局里判断。

低层次生产力水平下的需求的形成,是向高的那头看齐,是那边移植过来的。这里面很多东西如只是延用马克思分析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方法,好象工具不太够。资本主义除了股票之间的利益,还有一种利益,就是我这个生产石油、生产钢铁的企业如果停了,全社会都得趴下;这种利益是谁承担谁占有,是脱离财产关系的利益,是根据运行中的位置取得的。这种利益在资本主义也是有的,但不象财产关系那么清楚。说有不清,好象就是指这部分。就财产关系来说,确实它一直是清的。以财产来实现它们新源的最优配置,是不是还有多大意义?到这点上已经觉得意义不是太大了。所以,西方也有人说我是为社会服务的,也把这种利益拿来作标签。

讲利益问题,要搞清利益依附于什么,是从哪里来的利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利益主体、利益的含义很不相同,利益的来源、支撑点、含义、内容很不一样。利益边界不清的问题,从结构化这一点来说,只要符合生产力要求,应该说就是清楚的,你生产钢板,我生产汽车,从这一点看咱们俩的关系应该说是清楚的;但你是全民所有制,我也是全民所有制,这可能又是不清楚的。但在低层次上就不同了,你种麦子,我也是种麦子,这地要归我,我就好好种;没有一个在社会化经济中的占位问题。利益问题如果不与社会化经济中的占位问题联系起来,就很难说清楚,很难讲它的清与不清的判别标准。你要是总拿所有制关系来说,那不清的怎么也有发展快的?清的也有快有慢,资本主义也有不行的。判别标准不能仅用财产关系的标准。现在人们广泛说的利益,是占有社会财富的利益,而不是在社会化经济中功能的、占位的利益。现在有这种趋势,在低层次上的利益主体,它把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占位拿来谋私了,谋取更大范围的东

西；这种倾向是比较清楚的，这导致了很多问题。它依据社会占位的条件，不仅把占位作为生存的条件，而且把占位作为谋取更大利益的手段和出发点，谋取一种泛化的利益，谋取更多的财力和对社会财富的支配权。现在看来，凡是各利益主体扩张自己的需求，都是追求一种收入，追求占有更多的社会财富，但它们的原生点都不是从这一点来的，是从它们的功能点来的。它有独立的追求，是它生存的必要条件，但它还要把更多的东西、可流动性比较强的那一部分纳入到它的利益范围里。

农业这几年的发展，主要是靠价格的作用和生产组织的改变。农业投入是这几年才下降的，在78年以前一直是增加得比较快的；除了以农田水利形式的投入，主要是化肥起了作用，还有一部分农机起了作用。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一是国家提价，一是还原为家庭承包，这两条就可以不用化肥，不用机械，可以不要实现产业的升级；华国锋提出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后来大家都当成笑话了。所以，政策的威力现在在人们的心目中仍然是非常强大的，认为可以解决相当多的问题，可以解决农业投入，可以解决下一步的问题。真正认识到农业投入减少的问题，似乎是从1985年才开始。1984年是农业最好的一年，当时矛盾集中在卖粮难，卖猪难；要搞粮食转化，粮食多得不行了；应多吃肉，增加粮食转化，退耕还林，减少粮食种植面积，等等。还林、还牧、还果这个口子一开，现在耕地占用得相当厉害；一是淡水养殖和经济作物，一是盖房子，搞乡镇企业；不但原有的土地资源减少了，而且农民有了新的选择方向，马上釜底抽薪，积极性迅速转移。这个来得之快是人们没想到的，农村的迅速城市化，造成了对农产品需求的急剧增加，而同时它的产出能力又急剧下降。从1985年到87年，这个过程是非常快的。凡是乡镇企业、经济作物发展快，收入水平、住房改善快的地方，也是只有

工业品、副食品、果品等经济作物，但没有基本农产品的地方。国家的粮食储备在急剧下降，已经到了最低限。现在一年进口粮食 1500 万吨，这还不算各省自进的，都算上，可能有 1700 万吨。从农村来看，在二元经济转化的过程中，需求膨胀是非常容易的，但供给的增加是非常困难的，现在粮食只有增加进口一条路。每年世界市场上约 8 千万吨粮食，如果中国买 1500 万吨，苏联买 1500 万吨，世界的价格就会波动。粮食光靠进口显然不行，你有多少外汇？国家把农业变成集约化看来是非常困难的，只能在一些富的地方，人口已经过剩，资金也不缺的地方，其它地方做不到。乡镇企业产值增长很快，但劳动生产率多数很低；现在乡镇企业基本上是靠农贷过日子，靠农贷建立，靠农贷发展，赚了钱自己分光；投入农业、农田的不多。实际上是以这个致富，养农民。不是作为产业环节，而是作为发财手段和财源。乡镇企业应该与农村的种植业、养殖业，与整个农村的产业城市化过程衔接起来，但现在是直接作为获得货币的手段，获得后用于消费。农民现在最大的支出就是盖房子，买耐用消费品也就是彩电、冰箱、洗衣机、收录机等。乡镇企业是在利润导向下，根据产品利润和所需资源的争夺确定产品、安排生产。一个看产出，一个看投入成本。这个投入成本不是钱的成本，而是依靠上级支持，农贷，靠省、市、县在电力、钢材上去帮它划拉，直接把块块这一层的给它；它并不和原有的产业结构做什么衔接，也不和全国的产业衔接。在开始阶段还没有影响大格局，还起到一个补充、竞争的作用，但一旦影响到大格局，明显就没有好处，除了给农民钱以外，没有什么好处。国家从乡镇企业收税是很低的。从这个过程也能看出来，转化中需求增长是非常快的，资源配置是非常难的，这种利益格局对组织资源配置是很不灵的，很不合理的，但对于扩张需求很有效。

### 三、关于对紧运行的分析和研究

整个研究，从基本的层次来讲，应该是从实证性分析，然后到理论层分析，再到对策性构想的过程。如果说中间加一个趋势预测，可分为四部分；也可以把后边预测和对策两部分合一，这不是现在最困难的。紧迫的还是前面的两部分，即实证性描述、分析，然后达到一定的理论层次的规范，建立逻辑体系并做出验证。这里有这么一个问题，如果从理论映射回来，利益格局和资源配置在各个层次上是个什么关系，或者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到底在哪几个点上，怎么表述出来。我总感到如果在实证描述中能够把这么一个逻辑串进去，那么在实证和逻辑两个方面就都能站住脚了，在实证和理论两个层次都能站住了。这里有这么一个基本的入手点。如果能够从前面说到过的那些点，从一定的理论角度，从实证和理论层次的结合部这点深入进去，可能就能把实证和理论串起来；同时从这个点再推，就能把理论搞得更清楚。现在最缺乏的是象资本论二、三卷那样展开的说明；前面我们已经有了非常抽象的、逻辑上很严密的东西。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先是从具体到一般。这个具体不是具体到随便抓一点材料就说明一点东西，而是把我们已经形成的理论支撑点深入到实证当中去，从这样一个角度去把握。如果大家感到这种实证是有很强的说服力的，除了需要一定的内在逻辑体系之外，使得它对一些有理论深度的人有说服力，更重要的是要对整个经济的运行有足够的覆盖面，这样也会有很强的说服力。这个覆盖面，一个是时间上的覆盖，对不同历史时期，对我们经济运转的流程做比较生动的分析；把我们前面已形成的概念都推进去；在每一个描述开始和结束的时候，都要在理论的一

些基本点上有一些呼应；这样形成一个实证性分析，一个一个循环；还有对整个经济空间上的覆盖。如果对时空都能有足够的覆盖面，大家就会觉得说得清楚了。概念要说清楚，又取决于我们对实证材料串起来的过程。如果能够真正把实际运行过程，把人们感受最深的一些点，都用这些概念串起来，而且在每一点上这些概念都经得起推敲的话，那么这个概念看来就推敲清楚了。概念的深入和完整，只能靠实证分析的进一步深入。

还有一个是方法问题。这个问题看来比较困难。我们借助于图表、数字，或形象比喻，单用哪一个都很难把握最全面的情况。你看马克思后来也不是单独依靠一种工具就能描述清楚，好象也是各种工具都用。在研究当中，对于不同概念，在概念发展和形成当中，在它还处于一个变动和实际验证的过程中时，需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善于从现实角度，善于从哲学角度，概括出一些它变动的本质特征，概括出它变动的矛盾运动的特征来，以此作为我们深化概念的一些分析线索；另一方面，对概念本身的完善，似乎不能搞成这种非此即彼的东西，概念的完善，在基本的质弄清楚这一点上，可以是非此即彼的，除此之外，这些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一定是要在动态当中经得起检验的；在完善概念的过程中，需要做很多这种理论上的修饰。马克思实际上是从后往前思考的。他是先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整个资本主义的状况已有了看法；再把经济学的历史看过之后，对经济运行也有看法了；然后回过头来用大量时间提炼他的概念。提炼出来之后，他把概念放到资本论的第一部分。放到第一部分对人们理解有好处，人们是从概念，从一般到具体，符合理论的体系。实际上他的工作过程是从后往前，二、三卷的内容考虑得是比较紧的，但后来用很长时间琢磨第一卷，二、三卷长期停留在手稿上，他是这么一个过程。我们看来也得有这么个过程，先把实证



#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经济特征和改革问题<sup>①</sup>

十三大文件的一个理论基本点，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个观点。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十三大报告当中作了很多的描述；但其中还有一个理论难点，是大家都觉得需要认真加以探讨的，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或者说社会主义经济（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最基本的内在矛盾是什么？这个问题过去已讨论了很长时间。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里就提出与这个问题有关的看法；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的“八大”，谈了“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的问题”，后来，党的十二大又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这样一个矛盾。最近，看到上海理论界对这个问题又进行了讨论。有的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的低水平和我们现在公有制的发展程度之间的矛盾，即公有制的发展程度超过了我们社会生产、经济社会化实际达到的水平。这个提法和党的“八大”的提法有些接近的地方，有些实际的现实内容。据此提出一

---

<sup>①</sup> 本文写于1987年12月。







要把社会主义搞成一个不好的制度。比如说大家现在都批评斯大林当初的一些僵化的作法，但他有他所处的历史条件。在资本主义包围下，他必须首先把国家的国防力量、基础重工业建设起来，才能保存住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历史。当然他后来基于这一点，没有理解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内在的更大的潜力和活力。

由于人们的认识往往落后于经济发展的现实，又造成了一些人为的困难，造成了在资源组合上新的困难，如：条块分割，部门所有，大锅饭，预算约束软化，以及其它方面的约束软化，消费约束软化，金融约束软化，便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都是由于我们在体制上还不适应于这样一个迅速变化着的经济的要求。十三大提出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唯一的标准，这对于我们考虑各方面的问题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比如北京，曾经把各种各样的小商小贩统统搞掉了，最极端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商业网点搞得非常少，近几年，商业网点增加得很快，现在北京的餐馆已接近一万，其中属于国营的大点也就是一千多，不到两千，绝大部分是集体的或个体的餐馆，这说明它有强大的生命力，说明资源组合在这个层次上就是以这种方式最合适。“客观”是检验我们各种工作的最好标准。我们既有很大程度上处在原始积累发展过程这样一个特征；又有一些向着高层次的产业发展的特征。十三大报告把教育、科学技术的发展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作为一个向着小康水平发展、同时又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不可能离开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除了有卫星上天，有“两弹”爆炸之外，还要在产业当中，在社会发展当中，充分地把科学技术的能量、把人才的作用释放出来，成为整个产业发展的后备支柱。这些方面的要求都造成我们资源组合的广泛性和多样化，它的目标和模式都不可能是一样的，它必



















































































































就变成了无源之水。因为现实生活中没有这种金融作用，又如何让人们树立这种观念呢？所以，这两方面应该是互相促进，共同发展。随着我们整个金融事业的大发展，人们的观念形态要有一个巨大变化，同时还要增加大量新知识、新信息，这也是一个增量调整和总量调整的问题。一方面要注入新知识，另一方面要更新旧东西，这两方面都应该放在重要的地位上。

## 建立金融市场，深化金融改革<sup>①</sup>

关于建立金融市场问题，现在议论很多。金融市场的建立要依赖一定的条件。金融市场的完善和发展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达到了最高峰。在社会主义经济中，金融迄今为止还没有达到资本主义那样发达的程度，这其中有一定的内在原因，也有我们工作上的问题。但从总的趋势来看，金融市场将充分发展，它作为整个经济运行的中枢和导向的基本工具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前不久曾同德意志银行就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座谈。他们认为，金融市场的建立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从他们的经验看，经历了上百年的发展历史，要经过很长时间，一步步地建立。

我们向西德银行家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西德金融业如何解决产业转向、生产要素的重组问题。如鲁尔区，过去依赖当地的煤炭资源形成了以煤炭、钢铁产业为主的工业区，而现在要转向电子和机电工业，转向劳务产业，是如何转过来的？第二，对城市建设，金融发挥什么作用？西德银行专家讲，鲁尔区的工业化程度在减退，投资量在下降。在鲁尔区到处是上个世纪留下来的巨大的但已废弃的钢铁厂房，钢铁这个产业已经在那里

---

① 这是陈元同志在北京市金融研究课题开题会上的发言。本文写于1986年12月。









# 首都发展战略辑







递、处理要逐步向电脑化发展。方法现代化，就是要逐步摸索运用国外先进的经济数学方法、运筹学方法，把它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北京的实际相结合起来。第四，加强计划工作人才的培养。在计划工作改革中，有些东西可以开展有偿咨询，以推动人才开发和培养。今后大专院校、专业部门要向计划部门输送一些高质量的人才，以适应计划工作的需要。































盾分析的报告。首都发展战略研究第一次讨论会,范围之大,参加人数之多,讨论的程度之深是首都建设史上少有的。

通过这样较长时间、较大范围对市情分析和矛盾研究,使中央和市属各部门的同志对问题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为下一阶段对策研究打好基础。

进行首都发展战略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注意运用现代决策科学方式,积极探索,有了几点认识和体会。

## **一、在众多的工作决策中, 领导者首先要抓好战略 性和全局性的决策**

北京的工作具有各省工作的一般特点,也有各城市工作的一般特点,还有首都工作的特殊内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事无巨细,都非常重要。五十年代,周恩来总理曾讲,首都无小事,不管什么事情,都会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在北京的工作当中,具体事情往往看起来很急迫,有些是中央领导同志交办的;有些是人民群众意见很大,要求解决的;有些是基层急待解决的。面对这些大量的具体工作,有一个如何掌握全局工作主动的问题。要掌握主动,关键在于能否及时地抓好对于方针、政策、方向问题的研究和决策。北京这次开展发展战略研究可以说是在这个问题上开始有了比过去更高一些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开展发展战略研究的迫切性表现在几个方面:

1. 各个基层单位的工作积极性,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些单位的工作自主权都大大增加。一些企业提出了各自发展战略。企业有发展战略,行业必须有;行业要有,全

市则必须有。这样就提出了全市开展这项工作的迫切要求。

在各基层单位(包括各区、县、局、总公司)的决策权逐步扩大的情况下,要使各单位的工作仍然紧密地围绕市里的全局工作和中心工作来进行,更好地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避免盲目性,成为一个互相协调的有机的整体,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长期的工作指导方针。决策的分层化和分散化后的协调性,以方向和方针方面的统一决策为前提。战略问题决策的统一性和具体工作决策的分层化、分散化是相互依存的。否则,各项事业之间的内部联系就可能由于决策的自然分散和局限性而破坏。

2. 从全市各项建设事业面临的种种互相交叉、互相制约的矛盾和困难来看,也要求有一个统一的,能够给人们指出方向,振奋精神的发展战略。

北京市的工作千头万绪,相当部分是处于被动的“救火”状态中。这种状况有日益严重的趋势。许多领导自觉不自觉地被这些“救火”事件牵着走,为解决这些问题,就不断地增加临时机构,增加各种会议,增加各种调查组。各种就事论事的文件也大量增加。具体工作牵扯了各级领导的大量精力,仍然顾东顾不了西,掌握不了工作主动。这种忙于“救火”的工作方式,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非从科学的预测出发,争取工作主动不可。

3. 全国各地开展的发展战略研究工作是对首都发展战略研究的有力促进。

4. 领导班子需要通过对重大建设方针和战略研究来全面地认识市情,统一思想。同全国各地一样,北京近几年来,各级领导班子的变化是比较大的。领导班子组成之后,是在各自分工负责的工作领域埋头苦干,待遇到具体问题和年度工作计划时再碰头,就事论事地研究呢?还是主动地、自觉地研究一下我们面对的城市,从更高的层次认清市情,统一思想,制定方向、方

针，相互协调、有计划地配合起来努力工作呢？无疑，应该选择第二种方式。

从以上四个方面看我们感到非进行发展战略研究不可。在前一个时期，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就是基层研究战略，领导研究战术。因为各基层单位希望能找到本单位发展的捷径，所以重视战略问题。而领导干部则过多地陷于事务性工作中。基层研究战略往往是从本单位发展出发的，局限性较大，不能代替总体战略的研究。而领导如果只抓事务性工作，忙于救火，就会变成客观事物发展的尾巴，甚至变成基层工作的尾巴。这是一种造成工作盲目性而又比较普遍的现象。领导决策的科学化首要的是要使决策分层化，下放决策权，让领导从具体的事务堆中走出来，研究和解决宏观的、高层次的问题。

## **二、以科学化、民主化、社会化方式进行决策分析，是决策科学重大的进步**

随着决策内容的复杂化，首先是决策空间范围的扩大，时间跨度的增加，紧迫感和系统性的增强，决策分析过程同决策过程便可以并且应该适当分离，变成两个相对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领域。决策分析因此社会化地分工出来，不仅形成一个专门的学科，专门的产业——直接为科学决策服务的信息咨询业，而且形成了一批专门从事决策分析的专家队伍。决策的社会化带来了社会产业结构一系列深刻的变化。手工业的决策方式仅仅靠个人调查和分析，往往避免不了主观的作用；更严重的情况是拍脑瓜，个人说了算。在这种方式中，这种主观臆断是很难区分正确与否的。拍脑瓜拍对了，事情就办好了；拍错了，就付学费。

显然，依靠这种凭个人经验和个人智慧的个体劳动方式的决策办法来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是难免不失误的。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决策技术的发展，决策方式已经从单纯依靠个人思维的手工业方式发展成为客观的、物质的、系统的工程性方式。这时，决策分析过程和决策过程便开始分离。现代科学技术终于深入到领导决策这个手工业方式最后的世袭领地。而这个领地的最后瓦解便从根本上瓦解了领导方式官僚化和封建残余的基础。手工业决策方式所创造出来的那种所谓明察秋毫、洞察一切（信息搜集的神话）和所谓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决策分析和决策的神话）的“神人”也就成为历史的产物。

在决策分析过程中，充分体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社会化，听取社会各方面的各种意见，进行各种论证和预测，是我们为首都发展战略研究中特别注意采用的方法。我们纠正了急于提出各种决策方案的倾向，坚持全面、深刻地了解和认识客观情况，分析矛盾。我们通过三个途径做好决策分析的社会化和民主化。

1. 坚持领导干部直接参加分析研究，而不仅仅是指导分析研究。领导干部一般工作较多，往往对具体事情可以从调查、了解、分析到决策，一个人进行到底，但对大的问题则难以参与决策分析。为防止这种偏向，我们坚持领导干部都亲自参加研究。领导小组召开了七次讨论会，全面、详细地研究了全市各方面的重大问题，发表各种意见，交换了思想，开阔了思路。很多领导干部觉得多年从事领导工作，但是总陷于具体工作，这样系统地研究全局性问题，收获很大。这种领导干部之间的重大问题讨论会是给过去垂直化领导渠道增加了一个领导干部之间横向沟通的渠道。

2. 发挥科研单位的作用。科研单位的专业研究和综合研究的能力较强,研究思路比较开阔,发挥它们的作用会使研究有创造性进展。我们还把研究划分为十五个分战略,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超前研究,使得在最终对全市进行总体研究之前,就已经有了各方面的初步设想。

3. 充分征求中央各部门的意见,争取这些部门参加研究分析。

### **三、必须坚持把决策建立在对客观的全面、正确地认识上**

大部分同志从各自的具体工作出发,对北京市的情况有所了解,但并不全面和深刻。而人们往往认为自己已经了解情况了,一开始就急于进行对策研究。我们注意纠正这种偏向,坚持把把握和综合分析市情、找出主要矛盾放在首要的、不可逾越的阶段位置上,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来完成。通过这样的分析,终于全面地把握了市情,找到了人口、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水和土地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城市基础设施、产业结构、人才、资金和经济体制等九大方面的困难,提出了首都发展基本矛盾是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发展和经济建设等各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超过了首都有限资源的矛盾。这些对市情的客观分析和认识已经被人们接受。重视并且认真进行对客观现状的认识,是克服决策分析的主观性,实事求是地把握客观,作出正确决策的首要条件。

#### **四、积极采用现代化方法和手段进行决策分析**

现代科学的发展为决策分析科学化提供了条件，也为摆脱决策分析主观化提供了可能。首都发展战略研究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采用现代化的分析方法，如：对环境、能源、水资源等方面采用各种数学模型分析，积极利用了航空遥感的新成果，着手编制北京地区的价值型和实物型投入产出表，以便逐年分析比较北京的产业结构和进行宏观经济运行预测。

#### **五、把长远决策和近期工作决策结合起来**

有了对长远建设的认识，便对当前具体工作的一些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我们防止发展战略研究成为纯学术性的，而将研究成果束之高阁；努力将它同当前的工作研究和政策研究结合起来。这次研究形成的对首都建设的新认识，很多已经被各级领导同志用以指导具体工作，在北京市“七五”计划中也得到了体现。还同水电部联合召开了水资源紧缺对策讨论会，为解决北京水源紧缺问题作了决策。

首都发展战略研究过程中对决策科学的探索还只是初步的，但对参加研究的领导干部的工作方式改进，促进领导干部决策的逐步科学化、民主化、社会化发挥了作用。领导干部决策方式的转变确实是一件长期而又十分重要的工作。它的实现，有赖于领导干部素质的提高。它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内容之

一。而只有实现了这种转变,真正掌握了这门“软科学”,而不只是挂在口头上,领导方法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才能克服,决策上的重大失误才可能避免,实事求是的原则也才能在领导中体现出来。

## 关于首都发展战略研究的几个问题

首都的发展战略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北京这个城市既具有首都的特性,又具有一般大城市的共性。它既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又在全国和区域经济当中起很大作用,既担负着建设首都的繁重任务,又要为全国建设提供资金,提供物质和技术,提供各种服务和信息。怎样把这些问题统一起来,发挥首都在全国的积极作用,是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要研究首都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北京的城市性质,中央已经作了明确的规定,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在这个问题上,中央认真总结了北京城市的特点,集中强调了北京城市的本质特征,坚持了主要功能与多功能的统一性。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在深入理解“四项指示”和“十条批复”的基础上,要全面科学地确定城市功能。研究首都的功能、地位和作用,应着重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如何看待北京目前所处的战略态势,二是在城市功能问题上争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三是如何全面科学地理解“四项指示”和“十条批复”。

最近,有些同志比较系统地回顾了三十五年来北京建设方针的演变历史。前三十年即从解放初期到一九八〇年基本上执

---

① 本文写于1986年2月。

行了一条在服务中央的前提下,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把北京建设成为现代化工业基地的方针。一九八〇年以来,各方面对中央的四项指示和十条批复都是拥护的。但是,怎样把建设的重点转到政治文化中心轨道上来,认识并非十分一致,有些方面还有较大分歧。

对于首都功能的认识,争论的核心是如何理解政治文化中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或者说首都功能与北京城市经济功能的关系问题。有的同志主张,既是政治文化中心,就要限制经济的发展。但多数同志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首都各项事业,特别是经济建设的发展必须服从、体现、服务于政治文化中心的建设。但是如何服务、服从、体现又有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北京的功能主要是服务中央,服务全国。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原来以发展工农业为重点的产业结构和以工业部门安排就业为主的就业结构,实行以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和以第三产业部门安排就业为主的就业政策。要根本上改变那种单纯强调第三产业为第一、第二产业服务的片面观点,强调第一、第二产业为第三产业服务。另一种意见认为,经济发展是政治文化中心建设的基础。特别是第二产业还是北京的支柱产业。政治文化中心的建设必须从北京现有的经济状况、财力情况、资源情况以及人民生活状况的实际出发,来调整产业结构,使之能在自己内部均衡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就是服从服务于政治文化中心的建设了。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科技是北京最大的优势,北京的振兴发展应以科技为先导,带动生产发展,形成首都科技——生产联合体,搞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试制,以此带动首都的全面发展。还有一种认识,认为必须对首都的功能全面理解。北京既具有首都的特性,又具有一般大城市的共性。三十几年来,它一方面发挥了政治文化中心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全国和区域经济中也

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对全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两个方面的客观事实我们都不能忽视。首都要想完成这样双重的任务必须进行重大的结构与技术调整。

这些观点反映了我们的认识还很不统一，虽然各有道理，但也都存在片面性。政治文化中心的含义包括什么，怎样认识北京城市的经济功能，如何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贯彻“四项指示”和“十条批复”，正确处理政治文化中心建设同经济发展关系，需要进一步讨论，并作出明确回答。同时，更深入地讲，在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和相对集中管理的体制下，社会主义首都应具有那些功能，如何结合我国国情，从北京的实际出发，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北京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首都，这些本质性的问题也要展开讨论。

在开展讨论中，必须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央书记处关于首都建设方针的四项指示的实质。把首都的各种功能、作用统一协调起来。使首都的精神文明建设同物质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使首都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使政治文化中心的建设同经济建设、城市建设协调发展以及使城市基础设施同整个城市建设协调发展。

研究首都的城市功能与地位作用，还应该把眼光放得更开阔更远一点。从全国城市建设发展的方向看，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我国的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都在由单一功能逐步转向开放型多功能的方向上去，在组织领导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符合现代经济，现代城市发展的规律。我们也应把握全国城市这种变化的趋势，研究我们的战略对策。

另外，从世界局势的发展来看，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世界的多极化发展成为一种明显的趋势。未来一、二十年中，太平

洋沿岸和亚太地区的经济社会有可能得到较为迅猛的发展。作为世界大国的首都,作为太平洋沿岸的特大城市之一,我们也必须有自己的战略对策。

总之,我们只有对我们自己目前的态势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对首都的主要功能与其它功能的关系,尤其是政治文化中心与经济功能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摆法,对全国和世界局势的发展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对首都的功能、作用、地位有一个正确的评价,才有可能正确地确立首都发展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

(二)要吃透市情,抓住主要矛盾,把握首都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

科学地制定首都发展战略,必须从我市的市情出发,从解决我市面临的主要矛盾出发。在对市情作深入透彻分析的基础上,确定我们的城市功能,确立长远发展的总体目标以及制定具体的政策。因此,认识北京,应该成为首都发展战略研究必须把握的一个基本因素。

分析首都的基本特征,我们会看到,优势与矛盾常常联系在一起。

市情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北京是全国的首都,是我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以及中央各部委等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背靠中央是北京最大的优势,是北京兴旺发达、繁荣昌盛的最主要原因。三十几年来,北京的建设发展受到了中央高度的重视,得到了中央最直接的关怀与指导。但是,由于管理体制上的矛盾,北京也确实存在着多头管理,重复建设,事权不清的问题。市情的这个特点,既是我们发展的动力,又是我们面临的矛盾,研究首都发展战略不能不重视这个问题。

市情的第二个特点是,北京建城三千年,建都八百年,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极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使这座城市具有深

厚的历史基础。到了现代，科教文卫事业高度集中于北京，使这个文化古城焕发了青春，增添了新的文化内容，在北京地区形成了极丰富的智力资源。“人杰地灵”，“文化荟萃”。科学教育实力居全国之冠。目前北京地区各种研究机构四、五百个，高等院校七十多所，研究人员五、六十万。科研人员占全国总量近百分之二十，分别是上海的二倍，天津的五点六倍。其中高级研究人员占全国同类人员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分别是上海的三点八倍，天津的十四点五倍。而且，北京的研究人员也是全国素质最好，水平最高的，这是北京的财富，是优势。但是，这种优势目前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没有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还只是一种理论的或潜在的优势。一方面我们拥有科研人才实力，这是优势，另一方面又存在怎样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与生产力发展结合起来的问题。这也是我们面临的矛盾。

第三，北京工业具有雄厚的基础。三十几年来，我们努力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地，工业得到了较快发展。门类齐全，综合生产能力较强，具有较高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有些产品和技术在全国乃至世界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这是我们建设第一流首都，向四化进军，发挥北京更大作用的物质技术基础。但是，由于工业的发展，我们也确实面临着城市规模日益膨胀，交通拥挤，通讯紧张，水、能、原材料等资源不足，以及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问题。

第四，北京是一个开放型的城市。三十几年来大批各类优秀人才流入北京，形成北京高智力结构，使北京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是，城市人口机械增长过快。据初步测算，到二〇〇〇年，北京城市人口的规模，有可能为：城区六百万，加上流动人口可能达到七百万，郊区城镇人口二百五十万，农业人口二百六十万。城市化水平大大提高，超出了城市总体规划方案规定的市

区人口规模。城市可能过分膨胀拥挤。另外，北京还存在人口老化的问题。近年来，由于出生率一直保持在低水平状态，人口结构老化的趋势有了发展。据初步预测，到二〇〇〇年，北京的老龄程度按国际标准可能达到百分之十左右。即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一百零七万人。进入了按国际标准规定的老龄社会。到二〇三〇年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将达到二百三十七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一点四。人口老化的现象远远高于当今世界上人口老化现象最严重的瑞典（百分之十六）。与此相适应的是，劳动力老化现象也十分严重，二〇一五年北京五十岁以上的劳动者所占比重将由目前的百分之十点五，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一点九，到二〇〇〇年，北京将面临劳动力不足的局面，三次产业的发展都要受到一定的制约。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北京人口老化的特点同世界相比，是起步晚，发展快，来势猛，绝对数大。国外是经济发达了，人口老化了。我们是人口老化了，经济还不够发达。人口老化对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方面，由于人口的增长，特别是机械增长，造成了城市规模的膨胀，产生一系列城市矛盾。另一方面，人口的文化结构，年龄结构，有可能要靠人口的机械增长来调整，很可能在控制人口机械增长的问题上，使我们左右为难。

第五，北京的自然环境同华北其它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相比，具有突出的优势。辽金以来，择此建都，除了政治、军事因素之外，适宜的自然条件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北京这块土地承载相对规模较小的京都是适宜的。承载目前这样规模的现代化大城市就显得不足了。水、土地等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严重短缺。

据有关方面的预测，二〇〇〇年以前，在没有外流域调水的

情况下，北京可利用的水资源总量只有四十六亿立方米。从目前情况看，平水年，四十六亿立方米的水刚刚够用。但一遇偏枯年或枯水年，北京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就十分尖锐。如果考虑到未来城市的发展，工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四十六亿立方米水就根本不够用。北京地区现有可开发的水利资源所剩无几，外流域调水，二〇〇〇年前难于实现。二〇〇〇年以前，我们不得不对各行业各部门包括人民生活用水在内，实行限量供应。城市用水必须增加一部分，所增部分又要靠工农业生产节水。首都各行各业都要在限水、节水的条件下发展。这一点，我们无法与世界上的一些大城市相比。这不能不妨碍城市现代化水平和综合服务能力的提高。因此，我们必须在这种困难的局面下找出我们的出路。

城市土地问题，是我们面临的又一大矛盾。解放以来，北京五次扩大市界规模，总土地面积达到一万六千八百零八平方公里。其中规划市区面积为七百五十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控制在四百四十平方公里（人均用地一百一十平方米）。一九八一年城市用地三百五十一平方公里，城市人口人均占有用地八十一平方米。一九八四年建成区面积用地达三百六十五点九平方公里，人均占有用地七十九平方米。目前，规划城市用地的范围，所剩无几。而且七百五十平方公里范围内保留的农田，绿化隔离带多处被城市占用。乡村企业占地更多，而且缺乏统一规划。如果我们没有长远的对策，没有果断的措施，不仅市区规模无法控制，就是城市布局也将遭到严重破坏。一方面城市的建成区规模，特别是市区建成区规模要控制，另一方面，城市各行各业都要有一个大的发展，这是一对尖锐的矛盾。究竟是以“摊大饼”的方式，继续向外扩展，还是沿重要交通线搞带状发展，还是搞什么其它方案，我们应有明确的回答。

另外，城市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状况也十分严重。大气污染常年超标，其超标程度大大高于东京、巴黎、莫斯科等大城市八十年代初的水平。河流污染有的超标达几十倍，上百倍甚至几百倍。地下水污染的程度也有缓慢上升的趋势。同时，由于城市规模过大，北京已成为城市强烈热岛地区。特别要提出的是，据有关部门的预测，到二〇〇〇年，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的变化很不乐观。一九九〇年反映污染程度综合状况的污染指数为一九八〇年的一点二到一点七倍，二〇〇〇年比一九八〇年更为严重。环境的治理是需要大量投资的。国外发达国家，为了治理污染投入大量资金。我们是不发达国家，北京的资金也十分紧缺。对待环境问题我们也必须有自己明确的方针。

第六，北京地处三北要冲，历史上就是交通枢纽。经过三十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北京已成为四通八达的交通中心。通讯事业、城市基础设施与全国城市相比，也是最发达的，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利因素。但是，解放以来，机动车增加了八十八倍，非机动车增加了三十倍，货运量增加了二十倍，公共客运量增加一百倍，但道路建设只增加十二倍。城区道路用地率仅占百分之九，大大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首都（伦敦百分之二十三，巴黎百分之二十四，纽约百分之三十五，华盛顿百分之四十三）。人均道路面积更低，仅为三平方米。而且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道路无法分快慢道，并且路网稀，卡口、堵头多，环路少、立交少，贯通全城的干道更少，严重制约首都的发展。同时交通结构也十分不合理。缺少快速、大容量轨道交通等现代化手段。据有关部门的预测，到二〇〇〇年，全市道路年货运量将比一九八三年增长百分之一百一十七，公共交通客运量年将达到五十二亿次，比八三年增长百分之七十八以上。各种机动车将成倍增长。自行车将从目前的四百三十万辆增长到七百万

辆，增长百分之六十三。对外交通的矛盾也更加突出，铁路、飞机等也远不能适应首都发展的需要。交通运输紧张已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七，北京是全国首都，全国对北京的建设给予了巨大的支援。这也是我们的有利条件。但是，在目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首都的现代化建设既不能全靠中央资金，也不能无偿占有各省市的援助，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的经济力量，一方面建设好首都，另一方面支援全国的四化建设。这样，资金严重不足，也是我们面临的矛盾之一。

（三）要研究首都的经济结构。调整首都经济结构，是解决首都矛盾的关键。应从较高的层次和更宽的范围来看待首都经济结构的变化。至少应注意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首都产业结构的研究，二是技术结构的研究，三是产品结构的研究，四是城市综合服务结构的研究。

首先应研究产业结构，这是首都经济结构合理的主要基础。研究产业结构要注意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要研究各产业内部的比例关系，使首都产业结构的变化真正能够体现出政治文化中心的特点，适应水源能源等资源短缺的情况，体现首都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先进性，能创造出高效率的工作条件，高水平的服务设施，高质量的生活环境，使城市从单一的生产型转为开放式、多功能的经营型，使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生气勃勃，富有特色。

从目前产业结构的状况看，第三产业很不适应，三个产业之间比例不够协调。三产业的规模、数量、服务质量等远远不能适应首都功能和工农业生产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的需要。解决产业结构不协调的问题，不能只是简单强调发展第三产业，必须联系一、二产业综合考虑。

在各产业内部也存在着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各产业内部各行业也都面临着依据首都的功能进行调整的局面。面临着选择哪些行业作为重点发展行业的问题。

农业,在北京仍然是个很重要的部门,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中担负着重要作用。目前,对北京农业的功能有些争论,核心是郊区农业如何在服务城市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一种意见认为要成为副食品基地,另一种意见,还要建立起吸收城市扩散工业,为城市工业配套的工业结构,同时,在保护城市生态环境,增强城市环境自净能力方面起更大的作用。这些争论涉及北京农业发展的方向。应讨论清楚。从长远看,郊区农业与城市经济发展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郊区应更多地承担城市发展的任务。郊区的农业结构是要起变化的。我们要结合目前北京市区与郊区的实际状况把这个问题讨论清楚。

郊区的另一个矛盾,是北京市场大,郊区小,远远不能适应北京城市发展的需要。因此农业应从多方面想办法。首先应对二〇〇〇年人民消费水平的增长有一个清醒的估计,据以预测人民对农产品的需求量,然后从我们的实际生产能力上找出矛盾,提出实际的对策。

北京农业发展的方向应是先进的大农业方向,包括农林牧副渔,农工商运建等综合发展。每个行业的发展方针是什么,具体措施是什么,以及技术改造,地区政策,农副产品补贴政策等等都应进行综合研究。特别应强调加强农村科研对策的研究,建立起先进的生态型农业,对全国的农业发展起示范作用。

北京地区农业合作经济的模式应成为重点题目。北京郊区是全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同时兼有城乡两方面的优势,未来很可能是一块发展最快、最有前途的地区。它的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也应对全国产生积极影响。

北京地区工业的问题比较复杂，研究起来困难大一些。但是有一条应明确，北京是首都，是全国大城市之一，我们建设的目标不但要使这座城市充满生机和活力，更要使这座城市具有坚强雄厚的实力，使它立足于世界首都之林。这一点不容置疑。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工业到底搞些什么，方向是什么？这是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反复论证的根本性问题。其实中央书记处的“四条指示”和“十条批复”已经作了最本质的回答，就是要发展适合首都特点、代表新生产力发展方向的工业。这里四个比例关系，即轻重工业的比例，这是工业结构合理化的基础；新兴工业与传统工业的比例，不应忽视现实的基础，更不能忘记我们是北方新技术革命的基地；加工工业与原材料工业的比例；最后是各行业内部的比例关系。

对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应用现代化的观念去理解。也应把三产分为传统三产和新兴三产两块。传统三产主要是个政策问题，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去办三产。同时把国家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变成生产者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消费者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传统三产有个现代化的问题，这要依靠现代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传统三产的规模也要受到工农业生产、人民消费水平以及流动人口增减的影响。

新兴三产应是我们努力发展的重点。过去我们忽视产前产后的服务，忽视综合服务功能的发挥，使三产的发展十分落后。今后应大大加快这部分发展的速度。我强调三点：一是智力产业，这在北京具有深厚的优势。现在这个产业刚刚出现，应研究它的规律。二是金融产业。“七五”期间，金融政策会出现较大的变化，金融业会很快地活起来，金融组织经济活动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而且金融业投资少、利润高，是我们的优势产业，应有对策。三是公共市政的服务业，包括公用事业，房地产等等，

这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三产范围很宽,我们应抓住重点,以高水平的三产业服务辐射全国。北京的三产全市关心,全国关心,中央关心,我们应把它办得很有特色。

经济结构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技术结构与产品结构。要实现首都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必须有这两方面的内容相配合。所谓技术结构,主要是指不同先进程度的技术手段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数量比例。它反映劳动者技术装备的程度,反映技术现代化的水平,也反映我们社会化的程度和生产文明化的程度。因此我们必须重视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的研究。这里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处理好新兴技术与传统技术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我们的方针和对策是什么,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回答。

从城市特点出发,为了强调首都的服务功能,我们在经济结构中加入了一个城市综合服务结构。它的内容应包括,城市的基础设施结构,第三产业结构以及各种综合服务结构。这方面的研究是否也应大大加强。

(四)要研究首都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经济结构也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我们这里讲的是社会的小概念。但就是这个小概念的内容,我也不能讲全,只能强调三点:

第一,要重视科技的作用。科学技术是北京的最大优势。北京的全面发展应强调科技对各行各业的改造与带动作用。同时还应强调北京科技对全国的辐射作用与影响。应该看到,北京既是代表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名城,同时也是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基地之一。这里汇集着我国水平最高,素质最好,物质技术基础最雄厚的几十万科研队伍和几百个研究机构,北京是智力资源的密集区。现在的问题是潜在的优势并没有变成现实的优势。症结何在?如何实现北京地区的科研联合,科研与

生产联合,科研为发展服务?这些应成为战略研究的重点。

第二,要重视教育的作用。北京也是全国教育的重要基地之一。出人才是中央对北京的希望,也是北京服务全国的重要方面。是否应抓住教育结构,中小学师资的训练,在职干部培训,以及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教育投资等几个问题,在重点上有所突破。

第三,关于北京的社会问题。是否能抓住社会风气、社会风尚、道德水平和城乡关系、地区差别、人的收入差别引起的社会问题以及北京的老年人问题进行研究。

(五)要研究城乡布局。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合理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区布局的合理化。调整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很大程度上是要调整城乡布局结构,因此地区布局问题也是很重要的研究内容。

这里是否重点解决这么几个问题:一是功能分区。主要是城区、近郊、远郊、山区的不同功能的研究,按照城乡一体化的原则考虑好全市的整体布局,二是要把北京市放到区域即华北地区的范围内去考虑,从首都圈的大范围来考虑城乡、工农业生产等各方面的布局。华北区域内的城市,特别是承德、张家口、廊坊等地怎么联合发展,与天津怎么联合的问题也要考虑。三是要考虑地区差别问题。还要从时间顺序上安排好各地区的发展,四是各区县的各自优势与全市优势如何结合的问题。五是要着重研究城市的土地资源价值及开发利用问题。

(六)要研究城市运转的机制。主要强调三点:一是投资体制、方向、规模结构问题。二是市场机制与对外开放,这是一个大问题。三是整个城市的经济管理体制问题。此外,关于目标和指标体系问题,关于建立一些数学模型问题,关于建立外向型经济问题等等,也要研究。

## 首都发展战略研究报告<sup>①</sup>

1、建国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各部门的领导关怀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首都的建设与发展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成就，同时也经历了多次波折，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八十年代起，到下个世纪前五十年，是我国全面走向世界，实现民族振兴、国家昌盛、人民富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历史时期。同时，也是世界各国尤其是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各国，在世界新技术革命和改革两大潮流中，激烈角逐，奋力获取经济和技术新发展的时期。国内外发展变化着的新形势，特别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迫切要求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北京，根据国家总体发展战略要求和自身的条件，不失时机地作出正确的抉择，以争取长远发展上的全局性主动权。为此，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人民政府作出了开展首都发展战略研究的决定。

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是首都发展战略研究的根本指导方针。1980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首都建设方针的“四项指示”和

---

<sup>①</sup> 本文作于1987年11月。

198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十条批复”的基本精神，是首都发展战略研究的指导原则。根据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战略任务，必须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摆脱贫穷、落后和不发达状态，作为战略研究的基础，并进一步深入到城市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北京在推动全国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促进城市社会生产力在高水平上的发展。这样，才能按照“四项指示”和“十条批复”的基本精神，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首都的各项要求。

3、取得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进一步实现人民不断提高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愿望，决定因素是生产力的发展。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生产力为基础的标准。首都发展战略研究，力求贯彻和体现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并且力求同国家的发展战略相衔接，同北京的实际情况与特殊地位相结合，寻求适合国情，又适合首都特点的战略发展思路，和基本的战略对策构想。

## **第一部分 北京的战略地位和发展方向战略地位**

4、北京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都 and 现代文化名城，也是重要的综合产业城市。这是北京目前乃至今后较长时期，在国际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所处的战略地位。北京目前所形成的政治功能、文化功能和经济功能融为一体的城市特征，市特征，是其地理、民族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和长期演化的结果。它的形成，不仅表现

出社会主义国家首都政治、经济、文化集中统一的一般规律，而且表现了处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城市的基本特征。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是城市繁荣兴盛诸因素中的主导因素，它决定着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和基本格局。北京的各项事业都要在有利于加强和完善政治文化中心功能的前提下发展，各项工作都要服从、服务和体现城市性质的根本要求，并在与之协调统一中确立发展的立足点和动力。

5、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中心和行政管理中心，是全党全国的神经中枢，是示范全国现代化建设的“首善之区”。对国际来说，北京是全面展示当代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最主要窗口，是国际和国内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相互联结的桥梁与纽带。同时，北京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挥部所在地，对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紧密结合，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并将产生深远的国际影响。

6、北京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都和现代文化名城。在世界76个国都和历史名城中，北京的建城史居第4位，建都史居第13位。北京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4项，占全国总数的9.6%。在近代新文化运动兴起过程中，著名的“五四”运动和“一二·九”爱国救亡运动，为北京的历史增添了新的光彩，我国一大批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都在这里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建国以来，随着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城市环境不断美化，人口素质不断提高，各类专门人才大量涌现和云集，艺术团体日益增多，使北京成为国内科学、文化、艺术、道德水准较高的地区，成为世界当代重要的文化名城之一。北京丰厚的历史遗迹、革命遗存与现代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辉煌成就相融合，构成了北京特有的城市文化体系。它不

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粹，同时也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的代表和现代化建设重要的精神产品生产基地。北京城市文化巨大的内在推动力量，将持久地强化着首都政治中心的凝聚力和辐射力，并成为北京城市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社会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作为中国和东方文化的代表，正以她独特完整的文化体系，影响着当代世界文明的进程。

7、北京是我国科学技术和人才高度密集的地区。北京作为全国重要的教学和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基地，拥有国家一流的研究实验设备和手段，具有国内其它地区所不及的智力优势。北京地区拥有的各类科研机构占全国总数的 5.7%；重点高等院校占全国的 1/4；科研人员占全国科研人员总数的 18.4%。特别是中关村地区，集中了国家级科研机构 40 多所，高等院校 27 所，科技人员达 4.5 万人，智力密集程度和结构系统程度为世界罕见。北京已成为我国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先导城市之一。

8、北京是重要的综合产业城市。经过 38 年建设，北京已成为我国具有相当生产规模，基础比较雄厚，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化工业基地。这个基地不仅成为首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建设的强大经济依托，而且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1986 年北京工业产值为 322 亿元（不包括村办工业），国内生产总值为 284.8 亿元。随着产业结构向高度化发展，航天、信息、微电子、新型材料、生物工程等新兴的高技术产业在北京已具雏形或开始出现。以提供全面、优质和高效率服务为目标的第三产业，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北京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文化合作和贸易规模正在迅速扩大，到 1986 年底，国外驻京商社已达 924 家，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已有 189 家，协议金额 21.6 亿美元。北京已经成为

我国最大的多功能中心城市和对外开放城市之一。

9、北京是我国的交通和通讯枢纽，是集散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中心。北京地处我国三北要冲，自古以来就是南北贸易互致，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交汇点。经过解放以来38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已拥有较大的交通集散能力，担负着繁重的客货运输任务。现有国内铁路干线7条，成为联结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铁路总枢纽。北京是我国最大的民航运输口岸，目前拥有国际航线23条，国内航线34条。北京还是华北地区公路网的联结点，拥有对外放射性干线9条。目前，北京的现代化通讯设施，可与3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直达线路，通过接转可与世界各国和地区通话；同30多个国家与地区相互开办了国际特快邮递业务；国内可与29个省市、130多个城市迅速通话。北京设有各类全国性的管理中枢，每天产生、收集、处理和发布大量信息，已成为我国层次最高、容量最大、内容最广泛的信息生产源和集散中心。

### 历史使命和发展方向

10、解放后的前30年里，在全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北京的建设与发展基本实行了一条变消费性城市为生产性城市，建设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以及现代化工业基地的方针。这条方针对于加快城市发展，发挥政治文化中心功能，完成全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基阶段的基本任务，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缺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城市的经验，对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和首都建设的特殊性缺乏深刻认识，许多工作是探索进行的，加上受到有限自然资源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而在城市发展中，同各国工业化过程一样，也相继出现了日益尖锐的城市问题。八十年代初，在首都面临向新阶段过渡的关头，中央书记处

总结了北京发展的历史经验,从北京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地位、作用出发,做出了关于首都建设方针的“四项指示”;尔后,党中央、国务院对《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做了“十条批复”,从此,首都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1、当代中国以其强大的政治实力,巨大的经济潜力,和历久不衰的文化吸引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影响着国际政治格局,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基本力量之一。北京作为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和亚洲及环太平洋地区的大城市之一,担负着国内和国际赋予的重要历史使命。它的兴盛与发展,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未来,蕴含着深远的历史性影响。

12、从世界城市化进程的一般规律观察,北京的城市化大体处于从初期向中期过渡的阶段。即:产业及人口大规模“向心”聚集的过程已经接近完成,聚集的速度开始减缓;产业结构开始发生重大转变,以增强城市服务功能为主的新兴第三产业已具雏形;城市郊区的开发建设已经起步。预计,城市中心区持续膨胀的势头将在下个世纪初达到顶峰,以后随着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工业化向新阶段的迈进,北京将出现市区科学技术、产业和事业单位以及人口较大规模的扩散,并逐步在更大区域范围形成以首都为核心的联合城镇群体。

13、考察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按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衡量,北京大体上比全国平均水平超前10至15年达到小康生活水平。但是,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总体上看,北京仍是一座发展中的城市。城市建设、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城市的承载能力与交往能力都与大国首都所应担当的国内外事务相距甚远;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社会主义的民主观念和法制观念还有待大大加强;适应现代化首都所要求的高效运转的城市机制,还有

待经过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改革逐步建立和完善。总之，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管理体制的不完善，以及自然条件的制约，严重影响着政治、文化中心功能的进一步加强。这是目前北京发展所处阶段的基本特征，也是选择北京长远发展战略目标的基本出发点。

14、加强与完善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是指导首都各项事业发展的总方针，是实现城市有序运行的主导因素，对此应当坚定不移。同时，马克思主义还告诉我们，政治、文化功能从来不是空中楼阁，它的形成和完善，要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对于经济功能并不具有必然的内在排斥力，只是对经济发展的内容、方式和规模作出了更高的质的规定。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首都的发展与建设必须服从于这个根本任务，这样才能正确处理好政治文化中心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北京的发展才有旺盛的生命力，政治文化中心的主导功能才能更加突出；也只有抓住这个中心，才能动员全市人民为实现首都的各项发展目标而共同奋斗。

15、基于以上判断，由北京的战略地位和经济不发达的基本国情所规定，北京的长远发展方向和目标是：建成具有发达的政治、文化、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和较高经济社会综合效益，充满活力和发展生机，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首都。

北京未来的发展目标由以下主要部分构成：

第一，长久地保持城乡的繁荣与发展。实现首都广阔地域空间组织的均衡化和城市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城市管理科学化，形成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发展环境，是北京保持繁荣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也是强化首都功能的基本要求。要通过合理布局，大规模发展与城市性质相适应的各项经济事业和高技术

产业,全面实现城市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全面促进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为这座历久不衰的文明古城注入旺盛的生机和新的活力,以求长久地保持国家首都的强大功能和地位。

第二,创造崭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北京有形和无形的深厚民族传统文化基础,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仍将是民族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统一的基础,是国家凝聚力量的重要构成因素。同时,它也将成为促进城市蓬勃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要通过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充分运用现代化科学技术成果,广泛地吸收融合世界进步文化,不断创造出与国家时代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化北京文明,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世界文化的繁荣。与此同时,造就一代又一代具有崭新社会主义精神风貌和高尚道德情操的北京人。

第三,加强首都城市的主导作用。北京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高指挥部所在地,它在全国的城乡建设、产业发展、技术进步、人才培养、道德风貌等方面,具有极强的示范和影响作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城市的发展方向上居于不可替代的主导地位。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发展和现代化水平的全面提高,北京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诸方面,与其它中心城市协同起来,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第四,建成国际交往中心。北京负有全面沟通中国与世界联系的重任。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城市现代化水准的提高,在未来的全球战略中,北京将与华盛顿、纽约、莫斯科、伦敦、巴黎、东京等城市一道,共同成为国际间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民族等事务交往的中心城市,这是国际社会赋予北京的重要使命,也是社会主义大国首都和世界文化名城所应担负的责任。为担当这一重任,应从现在起,在国力和财力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按照国际标准,逐步把北京建设成为

世界级的国际交往中心,促进国际社会的协调和稳步发展,推动人类的进步与和平。

## 第二部分 北京发展面临的基本矛盾

16、北京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然而,面对跨世纪的发展问题,在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若干因素的制约,前进中仍面临着许多困难,发展中还潜伏着某些危机,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为了有步骤地实现战略目标,首先需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全面揭示北京发展面临的基本矛盾,深刻剖析基本矛盾的内在经济关系,准确判断矛盾各个方面质的规定性,充分估计未来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只有从这个基本点入手,才有可能站在战略高度,依据北京发展的客观规律,有针对性地选择实现战略目标的基本途径,科学地划分战略发展阶段,确定战略重点,并相应制定逐步实现战略目标的基本对策。

17、城市化趋势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在城市化过程中,也带来了人口急剧膨胀、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质量恶化等问题,这是国内外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曾经或正在经历的阶段。北京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濒于衰落的城市,转变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继而迅速发展为具有千万人口和相当规模工业基础的特大城市,从而使城市各种功能之间形成极为复杂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在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和城市功能迅速转变的特定发展阶段,北京不可避免地既有世界大城市发展的一般矛盾,又具有不同于国内外其它城市的特殊矛盾,主要表现为:在有限的地域空间内,由于受到自然资源、产业结构以及分割体制的制约,

经济发展直接为城市建设提供的供给能力十分有限，而政治文化中心建设和为强化城市功能不可缺少的经济建设、城市各种设施建设等，都持续扩张着需求，造成总需求急剧膨胀，超过了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供给限度。这种状况长期存在，必然导致城市系统总体呈现“紧运行”状态，供需之间结构性失衡异常突出，供不应求所引起的局部“超紧运行”状态十分明显。北京的特殊地位，为北京增加供给的社会制约性和需求膨胀的无约束性提供了特殊的条件，形成了特殊的不对称的供求机制。

### 基本矛盾的显著特征

18、北京发展面临的基本矛盾，首先表现为政治文化中心建设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受到有限资源的强烈约束，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明显超出基本动态均衡的限界。

人口规模急剧增长，导致需求持续膨胀。截止 1986 年底，北京常住人口达到 971.2 万人，比 1949 年底的 203.1 万人，扩大、增加了 768.1 万人。特别是人口迁移增长规模和速度，在国内其它大城市中是最高的。尽管从五十年代末期开始控制人口迁入，七十年代开始普遍推行计划生育，但是人口增长的势头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1980 年到 1986 年，全市常住人口净增长 101.5 万人，平均每年 14.5 万人。近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北京市的流动人口急剧增加到日平均 110 万人左右。北京实际负担人口总数已经超过 1100 万人。人口的急剧增加，带来城市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需求成倍增长，资源的人均占有水平大大下降。

城市建设规模过大，超过了现有自然和社会资源供给的承载限度。北京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是导致城市总需求膨胀的又一重要原因，也是首都建设难以治愈的

“顽症”。自第四个五年计划以来，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平均每五年翻一番，在建总规模逐年增加。庞大的建设规模和急剧增长的建设需求，大大超过了目前北京的建设能力和资源承载能力，超越了现阶段国情国力允许的限度。因而，不仅使在建项目的建设周期延长，投资效益普遍下降，而且给物资、财政、信贷的平衡，以及自然和社会资源的配置造成极大困难。

水、土地等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严重短缺，城市发展受到有限资源和空间的严重制约。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目前每年可供分配使用的水资源，平水年一般为 40—42 亿立方米，枯水年只有 33—35 亿立方米；人均占有量为 400 立方米左右，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 1/6，世界人均占有量的 1/25。近年来，城乡用水总量已接近水资源的可供量，供需矛盾十分尖锐。更为严重的是，城市中心区和新建区地下水开采量已超过可供量，从七十年代以来，每年平均超采 1 亿立方米左右，累计超采 18 亿立方米水位普遍下降，漏斗中心水位下降 30 米左右，形成了近千平方公里的地下水集中开采下降区。在现有用水结构不做重大调整的情况下，2000 年的需水总量可能达到 55—60 亿立方米，而可供量却难以增加，供需矛盾将进一步呈现“超紧”状态。北京人口、产业和党政机构在空间范围高度向心集中，以及随之而来的高度聚合开发，使市区有限的建设用地日益匮乏。目前，规划市区 440 平方公里的城市建设用地已基本占满和划拨完毕，规划保留的农田和绿化隔离带，也不断被挤占蚕食。城市中心区地域空间的有限性，严重制约着城市未来的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于城市建设，城市载体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环境质量不断恶化。长期以来，北京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大大落后于城市主体设施的建设速度。据有关方面计算，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应占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35%，而 37 年

来北京只占 20.8%，导致基础设施的负荷能力难以承载城市建设规模的增长，长期处于严重的超负荷运转状态。其主要表现是，给排水设施欠帐太多，日供水能力只有 168.5 万吨，用水高峰期间日缺水 15—20 万吨；下水道普及率只有 27%，污水处理率只有 9%，与实际需要差距悬殊；热力、煤气、电力供应全面紧张；对内对外交通拥挤堵塞，城市道路年增长率仅为客运增长量的 20%；邮政电信落后，市区电话普及率只有 8.1%，电话拨叫接通率仅为 50.8%，邮件处理能力严重不足；城市环境质量进一步恶化，废物总排出量已逼近环境容量的可能性边界；防灾设施严重不足，抵御灾害的综合能力低下，等等。

资金供给远远满足不了首都建设对资金的迫切需求。北京是全国的对内对外窗口，实现党中央和国务院对首都建设的要求，标准高、时效性强，需要较多的建设资金作为保证。但是，在现行财政体制下，一方面，一些体现首都优势的高利税产业（如金融、中央直属企业等）实行税收代理制，北京难以留用这部分资金；另一方面，市属企业收入由于实行大半上缴的分成制，使地方财政只有吃饭的钱，没有建设的钱，难以较快地扭转产业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落后和自然资源紧张的被动局面。

19、北京发展面临的基本矛盾更尖锐地反映在供需之间严重的结构性失衡。

人口年龄结构日趋老化，各方面专门人才严重短缺。人口老龄化是北京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1990 年，北京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增加到 110.3 万人，占总人口的 10.6%，开始进入按国际标准规定的老龄化社会；到 2000 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为 14.7%，成为老年型城市；2000 年以后，老年人口增长趋势更为迅速，2030 年将增加到 314.1 万人，全市每 3.5 人中就有一个 60 岁以上的老人。这种人口老化先于经济发达

并且“超高速”到来的趋势，必然使劳动力资源的供求出现结构性短缺，劳动力人口负担过重，并对未来的消费结构、经济结构，以及社会保险、医疗保健和各种服务设施，提出许多新的要求。北京与国内一些城市相比，教育基础比较好，智力相对集中。但从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的特殊地位看，人口素质亟需极大提高。据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北京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8年。六岁以上人口中，初中文化程度占31.7%，小学文化程度占28.5%，文盲、半文盲占15.3%，共占75.5%，低文化素质人口的绝对量很大。目前，北京市各类专门人才只占全市职工总数的11.1%，人才的严重短缺，将成为首都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产业和人口的空间布局不合理，城市资源的分配在地域间极不均衡。北京城市总需求的急剧增长，从空间布局上看，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心区和新建区。规划市区面积只占全市的4.5%，却集中了87%的市区人口，100%的中央、市级机关，90%的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80%的中央、市属工业企业。城市中心区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为2.7万人，而近郊和远郊区的人口密度各依次下降一个数量级。1986年，规划市区常住人口达520万人，已远远超出450万人的控制目标，加上流动人口，实际负担人口已达640万人。由于城市人口和企事业单位过分集中于城市中心区和新建区，城市生产和生活活动的总需求，必将超过现有土地、水源、环境和基础设施的实际负担能力。目前占全市土地面积87.3%的远郊县，十四个城镇的人口仅有57.6万人，资源和环境的开发潜力很大。但由于交通不便，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不完善，教育与文化事业不发达，难以起到疏散城市中心区产业和人口的作用。

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空间的高度集聚和外延式发展与政

治文化中心建设争夺有限资源的矛盾十分尖锐。北京工业规模过大，三次产业的比例关系极不协调。1985年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占6.9%，第二产业占59.8%，第三产业占33.3%；从业人员，第一产业占18%，第二产业占45.9%，第三产业占36.1%。在工业内部结构中，机械、冶金、化学三大资源消耗型的传统工业部门又占较大比重，其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59.4%，水耗占43%，能耗占70.1%，所需基本原材料大部分靠外地调运。近几年虽经努力调整，但变化不明显。产业结构不合理，必然导致在有限空间内的生产活动规模挤压行政公务活动和人民生活活动规模，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城市可供资源的紧张状况。近年来，为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发展了一批新兴耐用消费品工业，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外汇支撑，成为新的“资源约束型”产业，使北京工业发展在受到水、土地、能源等约束的同时，又出现外汇资金短缺的新问题。

建设投资比例严重失调，城市建设与发展后劲明显不足。长期以来，北京地区的各项投资主要由“条条”下达，各单位有钱建设自己的项目，地方政府无钱建设为之服务的公共项目，各单位的投资越多，公共项目欠帐越多。建国以来，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中央单位项目占50.9%，地方项目仅占49.1%，而为主体建设配套的市政基础设施投资主要靠地方解决。以北京市微薄的财力，跟在千家万户基本建设膨胀的后面堵窟窿，必然导致城市运行的资源供给能力不断降低。“四五”时期，北京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26.3%，欠帐已经十分明显；到了“六五”期间，这一比例下降到16.8%，形成旧帐未还，又欠新帐。此外，由于财政支出中用于补贴的份额逐年增长，使得生产性建设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支出比重被迫减少。1978年各项补贴为2.16亿元，1986年激增至19.6亿元，当年地方财

政用于生产性建设的投资仅有1亿多元。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北京发展面临“无米之炊”的窘困局面将进一步恶化。

### 基本矛盾形成的主要原因

20、北京发展面临的矛盾，其形成原因，既有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和一定历史条件下某些方针、政策的制约，也有宏观管理在探索尝试中难免付出的“代价”。但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生产社会化程度低，以及制度和体制上的不成熟、不完善。

城市是社会化商品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物。现代城市有较高级度的社会化分工。集约的城市空间构造和基础设施结构形成了现代化城市运转的物质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形成集约人口、集约经济和集约的科学文化，使社会运转具有集镇和农村不可比拟的高效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的高效率是资本形成的必要环境，它吸引着资本向城市集聚，获得高于社会的平均利润率，表现为资本的城市化。这是资本主义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城市内部总需求加速膨胀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国家抑制城市需求膨胀和增加城市供给总水平的主要办法，是采取高物价、高税收等政策，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平衡城市资源的供求，并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完成城市现代化的各项建设任务。

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还不完善的条件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及其利益机制，驱使全社会各个部门、单位及个人，把平等地使用较为完备的生活服务设施和各项基础设施，平等地享受优厚的福利待遇，作为本部门、本单位或个人的基本权利，以及寻求发展的重要目标，在争夺城市资源上没有什么自我约束。他们往往是以最低的利

益损耗,形成实际的更多的需求扩张,或者虽然创造了一定的供给,却同时产生出更大的需求。所以,尽管城市与乡村、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相比较,在发展和建设资金上占有明显的优势,投资总量相对来说是较多的。但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决定了各自的投资偏好,有限的资金并不能有效地组合并提高城市的供给能力,而相反地不断生成新的需求。这种利益主体关系造成的供求不对称(向需求倾斜)长期存在,必然导致供求总量及结构性严重失衡。在以往的城市宏观管理中,利益协调机制和创新机制都很不完善,物价、税收等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极其微弱,在兼顾条块各方利益的管理体制之下,行政调节的强度也十分有限。因此,地方政府对城市总需求膨胀既不能进行有效的社会约束,更无条件建立不断增加资源供给能力的发展体系,从而造成各种“城市问题”日益尖锐化。

北京是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在传统体制下,各方面、各部门、各单位凭借各自特有的条件,实现各自的追求,争相使用或占用城市资源,不断扩张着实际的需求。与国内其它大城市相比,北京地区的需求膨胀来得更直接、更迅速、更加难以抑制,尤其是在现行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财力根本无法满足建设全国首都的资金需求。这是北京城市呈现“紧运行”状态的根本原因。

21、必须看到,在目前我国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换时期,在社会生产力需要较长时期才会逐渐提高起来的历史条件下,北京城市供需总量失衡和结构性矛盾,将是一个此消彼长,相互作用的较长过程。这种错综复杂的相互交织作用,既包括供需总量失衡而制约结构调整的规模和进程,结构失衡反过来又加剧总量失衡的程度;又包括顾及眼前矛盾,而影响长期目标的实现,和追求长期目标又往往受到现实矛盾约束的“两难”问题。

根据预测，在严格控制的前提下，2000年全市常住人口将接近1200万人，流动人口将突破200万人，实际负担人口可能达到1400万人；规划市区常住人口将达到650万人，超出规划指标200万人，实际负担人口将达到850万人左右。2020年以后，常住人口的<sub>增长</sub>可能出现缓慢回降的趋势，但总规模也将突破1400万人。到2000年的15年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可能达到1500亿至1700亿元，房屋竣工总量累计将达到1.2亿至1.5亿平方米，相当于再建一个目前规模的北京城。在这个过程中，人口结构、投资结构都将产生一系列极其复杂的变化，因而将对城市的“紧运行”状态产生很强的惯性作用。面对未来城市总需求不可逆转的膨胀趋势，和城市总供给能力需要通过艰苦努力才有可能稳步提高的现实，实现首都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全面改革，把改革与发展结合起来，大胆地寻求新的出路。

### **第三部分 北京发展的基本途径和战略阶段**

22、实现北京发展的战略目标，克服前进中的矛盾与障碍，必须根本扭转放松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倾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确处理政治文化中心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努力增强资金、资源、技术实力，为政治文化中心建设提供强大的物质保证。同时，摒弃传统封闭的发展模式和狭隘观念，从解决北京发展面临的基本矛盾入手，选择既符合当前实际情况，又充分估计改革、开放前景的正确发展途径，进而确定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任务和基本对策。

## 基本途径

23. 逐步完成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转换,为城市正常运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建国后的前30年里,随着我国工业化的起步和发展,北京政治文化中心功能和城市其它各项功能处于形成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在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客观环境里,北京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外延和不够平衡的发展道路。为了实现首都发展的战略目标,从现在起,要不失时机地实行发展模式的战略转换。

即:变急于求成、盲目铺摊子、以外延扩大为主的城市发展方式,为以提高城市土地、环境、设施建设的聚集效益为主的内涵发展方式;

变分散投资和追求产值、数量的粗放型经营,为集中投资,追求效益、讲求质量的集约型经营;

变以本地区配套自求平衡为目标的封闭式发展,为面向国际国内市场,以国际市场引导国内市场,在更大的系统中求平衡的开放式发展。

为此,必须从现实的国情国力出发,加强对城市发展规模总量的控制,把提高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的综合效益作为首都发展的主要考核指标;以城市短线资源确定适度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和建设规模,并以此为基础组织好人财物的综合平衡,组织好财政、信贷、外汇收支的综合平衡;必须大大加强城市资源配置的调控能力,改革现行的管理体制,调整并完善对城市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法规和经济政策,强化依法治都的手段和措施;必须从城市发展的总目标出发,依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调整投资结构,采用经济、行政和立法等综合措施,不断突破制约全局发展的薄弱环节和主要问题,使城市发展始终能够在总

需求略大于总供给的相对平衡水平上。

24、开拓城市发展的新空间，长久保持城市的繁荣与发展。解决城市“紧运行”的矛盾，实现城市的长远发展目标，不仅需要逐步完成发展模式的转换，还必须打破就北京论北京的观念，改变产业、行政机构、科研机构和人口高度集中于城市中心区的极度不均衡布局状态，在更大的开放系统中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城市发展模式的转换，主要是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内部系统的均衡发展，开拓新空间则是为了求得更大地域空间利用上的优化组合，从而为城市发展提供更为良好的条件。世界大城市发展的历史表明，由于受有限地域空间和城市环境的限制，城市的集聚效益，并不随集聚规模的不断扩大而无限地相应增长。为了解决超过适度规模引起的边际效益递减，解决城市发展与土地、设施结构性失衡的尖锐矛盾，求得地域空间利用上的优化组合，当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在城市中心区高度集约化的经济、科技、信息辐射作用下，必然逐步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中等城市、小城镇有机分布的城镇群体，这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缓解北京城市资源在总量与结构上的失衡状况，永久地保持城市的繁荣与发展，必须合理分散城市中心区已经形成的过于混杂的功能，使中心区更为集中地体现城市的主要功能。凡是不适宜在中心区的经济事业和相当一部分经济管理及文化科研机构，必须坚决扩散到城市新建区和郊区的次中心或分中心，以实现城乡和产业的相对均衡布局。与此同时，必须打破现行行政区划界限，从京、津、冀更大的地域空间范围，为城市发展做多方位选择，逐步形成环首都的联合城镇体系和城乡发展新格局。

25、调整城乡经济结构，充分释放文化智力潜能，增强城市的综合辐射能力。北京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必须

服从和体现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这一城市性质的基本要求，充分发挥服务中央、服务全国的多功能作用。但是，目前北京经济社会结构距离功能目标的要求相差甚远，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潜在能量由于管理体制的分割，未能完全释放，亟待大力挖掘和充分发挥。因此，必须在战略上做出规划，以约束总需求、增加总供给为基本出发点，有步骤地调整城市总体结构，下决心根本扭转目前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坚定不移地以增强资金、资源、技术三大实力为目标，重组和改造传统工业，大力发展深加工产业、高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从而逐步形成适合首都特点的高技术、高质量、高效益、低耗水、低耗能、低污染、少运量、少占地的新兴产业群体。必须改革科技、教育体制，充分释放北京巨大的文化智力潜能，促进城市新资源的开发和短线资源的替代，把科技人才优势更多地转化为首都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资源。在产业、科技、教育结构调整过程中，北京的人口和劳动力结构也必须适时地做出调整，以优化的结构满足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

26、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调整社会组织的利益关系，形成新的城市运行机制。建国38年来，改革前后两个阶段的历史充分证明，实现北京长远发展战略目标的根本出路，是继续深化城市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与首都功能相适应的、有权威和有较高效率的行政管理体制。从长远看，一方面必须通过政治体制和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形成适合首都建设特点的宏观调控机制，从经济、行政、立法等方面，强化对各级行政部门以及企事业单位扩张动机的约束，调整社会组织的利益结构，抑制总需求的无计划增长和盲目膨胀。另一方面，必须从产品经济的束缚下彻底解放出来，使城市的经济活动走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轨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抑

制需求，增加供给。同时，要继续深化企业改革，以及改革价格体系、完善市场体系和城市税费体系，促进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充分利用，不断增强城市自我发展、自我积累、自我改造的能力。

## 战略阶段和近中期目标

27. 根据多种方案预测，2020年前后北京的常住人口总量将出现缓缓回降的趋势；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将有较大的提高，经济实力会有较大的增强。由这两方面的基本因素决定，实现首都发展的战略目标，大体需要经历三个递进的阶段。

第一阶段，从1986年—2000年，为全面改革调整阶段。主要任务是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科学、教育、文化体制的全面改革，调整政策，理顺关系，实现城市发展模式的转换。通过改革，增强宏观综合调控能力，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初步突破制约城市发展的主要障碍，缓解供需失衡的矛盾，使政治文化中心建设、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进入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

第二阶段，从2000年——2020年，为巩固提高，稳步发展的阶段。主要任务是巩固、发展改革成果，完善新的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宏观调控能力和城市的综合效益；基本完成城乡经济社会结构的全局性调整，形成新的城市运行机制；确保人口和城市规模转变点的实现，初步形成首都圈产业、人口和城镇体系的综合再布局，为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三阶段，2020年——2050年，为战略目标的实现阶段。主要任务是全面发展，奋力赶超，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飞跃，发挥强大辐射能力，把北京建设成为高度文明的现代化首都和国际中心城市，为推动世界和平与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28. 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 切实完成全面改革调整阶段的各项任务, 对北京的全局和长远发展有着决定性意义。必须下决心,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 使首都的发展达到下述目标: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经济, 科技和社会的综合发展水平(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水平; 适合北京特点, 以高技术产业为先导的现代产业结构初步形成, 传统产业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得到改造, 若干新兴产业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城市综合服务功能进一步增强, 城乡建设的现代化居全国领先地位; 常住人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 市区人口向郊区扩散取得进展; 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基本得到控制, 市区的环境质量有明显改善; 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显著的提高; 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得到较大发展, 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观念和精神面貌发生较大变化。

#### **第四部分 北京发展的战略重点及对策**

29. 实现北京发展战略目标, 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为了顺利完成各战略阶段的任务, 并最终向战略总目标逼近, 必须紧紧抓住影响全局成败的关键环节, 以解决基本矛盾为核心, 集中主要力量, 采取重点突破的方法, 不断推进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经过多种方案比较论证, 北京发展的战略重点是: 严格控制人口规模, 积极疏导城市人口; 调整城乡布局, 缓解城市中心区供需矛盾的尖锐程度, 开发和建设首都圈;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and 改造的步伐, 积极促成新的经济发展格局; 把基础设施建设放在重要位置, 努力提高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和现代化水平; 充分释放智力潜能, 发挥科学技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先导作用; 加强文化建设, 提高精神

文明，培育起新一代人的“北京精神”；大力推进城市改革，依靠民主和法制，加强城市的综合管理。上述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对于获得北京未来发展的全局性主动权，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 **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积极疏导城市人口**

30. 严格控制和合理调节人口的流量和分布，是关系北京建设和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性问题。从根本上缓解北京的人口压力，必须遵循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将人口问题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密切联系起来考虑。在大规模向外疏散人口的条件没有成熟以前，到本世纪末，常住人口总量要坚决控制在1200万人以内，规划市区控制在650万人以内。

31. 人口迁移增长过快是北京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必须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加以解决。基本方针应该是：严格控制，积极疏导；城乡兼顾，合理布局；量出为人，全国统筹。近中期应以控制城市人口为重点，采取以下必要政策措施：

（一）编制人口移迁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纳入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通过指令性计划指标，严格控制常住人口增长。

（二）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在北京新建和扩建企业、事业单位”的规定，今后不再批准人口成批、成机构、成建制地迁入或转业到北京。

（三）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对常住人口迁入采取分层控制办法。

（四）对于按统一管理计划指标新增的迁入人口，按人征收城市建设增容费。

（五）制订鼓励人口迁往郊区卫星城、县城、集镇的特殊政

策，形成城市人口分布的次中心和分中心。

(六) 授权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使之成为人口控制的权威机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人口管理法》。

32. 必须长期坚持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的政策。由于常住人口总量已经具有一千万人的规模，尽管自然增长率有了明显下降，但是人口出生的绝对数量仍然很大。因此，2000年以前，必须继续抓紧抓好计划生育工作，稳定现行的各项人口生育政策，决不可掉以轻心。2000年以后，考虑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等因素，再酌情适当调整有关生育政策，以满足下个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33. 流动人口规模迅速增加，结构发生变化，在给北京发展带来新的活力的同时，对交通、住宿、供水等方面的需求也明显加剧。北京是全国的首都，有义务接待好四方来客，但是，北京的接待能力不可能无限度增长。因此，解决北京流动人口的基本方针，应该是积极疏导分流，加强控制，严格管理。基本政策应该更多地运用经济办法，区别不同对象，实行有效的调控。

### **调整城乡布局，建设首都圈**

34. 2020年以前北京总人口增长的趋势不可逆转，即使顺利越过人口增长的转变点，人口总量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大幅度下降，为了逐步缓解人口膨胀引起城市中心区供求矛盾的激化程度，不断提高城乡现代化建设的综合水平，必须下决心改变产业、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人口高度集中在城市中心区的不均衡布局状况，在北京市行政辖区内和市辖区周围更大的空间范围，对产业、人口、城镇功能和生态环境等，进行综合性宏观调整

和再布局，从根本上扭转城市中心区有限空间容量对北京发展的全局性制约。调整后的北京城乡布局，分为城市中心区、城市新建区、城市郊区和首都圈四个层次；在每一层次内包含若干次中心和分中心，形成以城市中心区为核心的圈层分布格局，使地域空间组合实现均衡化和合理化。

35. 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和1983年党中央、国务院的批复，是北京城市建设与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基本精神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形势的发展和各种因素的影响，《批复》中提出的一些根本性措施，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执行，城市规模膨胀的速度大大超过原来的规划设想。基于这个基本事实，需要从已经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出发，考虑修改《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使之成为同首都发展战略相衔接，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的城市建设发展规划。

36. 二环路以内及二环路两侧的城市中心区，应集中体现政治中心功能，保持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貌。为此，必须积极疏导这一区域内的常住人口，精简各种行政性机构，搬迁工业企业，加强环境建设。今后，城市中心区的投资，应主要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的综合开发，重要古建筑的保护修缮，以及现有办公用房和生活住房的改造等。居住区的改造应严格控制密度，一般不应再新建居住密度高的住宅小区，以降低人口密度。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使城市中心区真正成为容纳党政军首脑机关的政治中心，和国际国内交往的中心。人口密度由现在的每平方公里2.7万人降到2万人以下。

为疏导城市中心区人口和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确保城市中心区功能的实现，城市建设的投资重点要逐步转向三环路周围及以外地区。城市新建区要按照分散集团式布局，建成

若干有园林和绿化带相隔离的，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比较完备的工作区和生活小区。这些工作区和生活小区内的人口密度，由现在的每平方公里 6900 人逐步增长到 1 万至 1.5 万人左右。这个区域内现有工厂企业需要进一步改造搬迁，文化科研单位也不宜大规模兴建或扩建。

37. 郊区是北京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和城市的生态保护带及旅游休养基地，也是未来工业、贸易、科技、教育等事业发展的重要基地。城市郊区圈层的开发与建设要放宽政策，多方面吸引资金、人才和技术，加快轨道交通和通信建设。以建成几个优于城市中心区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的区域中心为基础，通过产品扩散、横向联合和企业搬迁等多种形式，逐步建成十来个容纳 10 万—15 万人口的分中心区、吸引城市疏散人口，截留农村过剩人口；把房山、通州、昌平、顺义、黄村按市辖区管理，以安置从城市中心区，新建区疏散出来的工业企业，教育科研分支机构和中央部门的下属单位；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建成相当一批容纳 3 万至 5 万人口的集镇，使大批脱离土地的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

38. 综合分析各方面因素，着眼于下个世纪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有必要考虑选择适当位置建设“副都”。“副都”主要是分担目前城市中心区过于庞杂的部分功能，在城市中心区与周围地区的分中心之间起桥梁作用。在目前生产力水平还不太高的情况下，集中有限财力、物力建设“副都”，可以较快见到成效。“副都”的建设应有全面优惠的特殊政策，建设水平要有一个较高的起点，总规模以 80 万至 100 万人口为宜，地点可在顺义、昌平一线，涿州或廊坊市三个地区做可行性论证，选择比较最优方案。

39. 为了适应城市化发展趋势的要求，同时借鉴国外一些

首都建设的成功经验,必须从更大空间范围考虑北京的发展,逐步形成朝东向海为主的环首都联合城镇体系,这个城镇体系可简称首都圈。首都圈的功能在于,实现区域内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通过区域内的经济联合、企业集团、合资经营等方式,增强这一地区内的经济实力,减少和避免重复建设的严重浪费现象,为这一地区内的城乡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物质条件。首都圈的范围包括京、津、唐、秦和它们之间的一批中小城市、集镇和相互连结的广大地区。特别是在京、津、唐、秦、和京、津南北两线,开辟建设一个三角形的大、中、小城市相联接的城市带,形成首都朝东向海的大陆走廊,构成首都圈的基本框架。这项工作必须在中央统一领导下,京、津、冀及有关城市参加,组成有权威的领导机构,制订区域性长远发展规划,通过地区间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广泛联系,以及制定互惠互利的经济、社会政策,达到相互支援、共同发展的目的。

建设首都圈,要特别重视秦皇岛作为我国“夏都”和北京出海口的战略地位。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建立与发展北京与秦皇岛之间长期稳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采取积极措施,加快秦皇岛的开发和京秦之间的交通通讯建设,使秦皇岛地区逐步成为首都对外开放的出海大门之一,并能起到吸引北京人口的“反磁中心”作用。

## **调整和改造产业结构,形成经济发展新格局**

40. 根据北京的城市性质和国民经济及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造,是解决城市发展基本矛盾,转换发展模式,实现北京长远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和基本保证。

北京产业结构调整与改造的方向,是按照我国经济发展战

略的总要求,从北京的战略地位和现实基础出发,坚定不移地走技术进步和集约化发展的道路,加快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促进智力资源的开发和一些短线资源的替代,调整地区布局,形成开放式、多层次、网络型的首都经济区,使北京的产业结构在新的更高层次上带动和支撑城市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争取在下个世纪初,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以出口导向和深加工产业为重点,以第三产业为主体,以突出综合服务功能为宗旨的高水平、集约化的经济发展新格局。

41. 为此,必须制订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将产业调整的宏观指导深入到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用行政、经济和立法手段,对产业结构变化进行定向干预,促使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向预期目标推进。

北京产业政策的核心,是要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挖掘现有潜力,实现生产力要素的最佳配置,迅速增强资金实力,资源实力和技术实力。增强资金实力,就是通过发展投入少、产出多、效益高的产业部门,积累和集聚资金,扩大财源,增强城市的自我发展能力。增强资源实力,就是通过改造提高材料工业的加工深度,合理利用和节约有形资源,大力开发无形资源。通过掌握更多的资源,增强对经济和企业的调控能力,大大增加在产业发展中的回旋余地。促进加工程度高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有效提高资源供给能力。增强技术实力,就是通过依靠技术进步,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推动产业结构向高层次、高水平转换,为首都现代化建设奠定雄厚的技术基础,以高水平、高质量的产品占领国内市场,扩大出口。增强三个实力综合起来,就是要达到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有效提高城乡整体效益的目的。

42. 北京产业政策的基本指向,要从实际出发,正确选择和优先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支柱产业,积极推进六个方面的转变:

(1) 第三产业从以传统行业为中心的发展,向以新兴行业为中心的发展转变。根据北京的城市性质和特殊战略地位,尽快摆脱第三产业在传统观念、传统体制、旧的经营方式等方面的束缚,大力推动旅游、房地产、金融、信息等新兴第三产业的发展,使无形产品行业成为筹集资金、开发技术、发挥人才优势的主体产业。

(2) 郊区农业的生产技术从主要服务于北京,逐步向服务于全国市场和国际市场转变。在调整城乡产业布局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城乡结合的种植、林果、畜牧、淡水养殖、食品加工、农业技术开发及其它多种经营的生产体系,使北京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科研成果进入全国和国际市场。

(3) 工业从满足内需为主的内向型发展,向外向引导型发展转变。努力增加出口、开拓国际市场,使出口导向的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居重要地位,使以粗加工和初级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转变为以深加工和高技术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以此带动全市各产业部门协同起来,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追赶国际先进水平,以符合国际标准的生产技术和优质产品占领国内市场。

(4) 科研和生产从自我封闭的体制,向多方位开放的科研、开发、应用、推广一体化转变。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发展上层次、上水平、增效益。

(5) 结构调整方式从注重追加投资的增量调整,向注重现有生产要素的重组与更新的存量调整转变。一些消耗高、污染大、效益差的企业,要在调整过程中转产、关并,使原有生产要素向新兴产业、高附加价值产业、高收入产业转移。

(6) 政府干预方式从行政性直接管理,向有计划商品经济条

件下的间接调控与必要的行政干预相结合转变,通过完善企业经营管理机制,加速发育市场体系,建立与北京城市性质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

43. 在产业结构调整起步阶段,需要努力抓好以下几点:

(1)最大限度地掌握初级资源,充分发挥现有短线资源的作用,积极开发无形资源,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尽快入轨。为此,在一定时期内要进一步强化基础产业,结合技术改造,在严格控制污染、严格节水、节能的前提下,深化燕化、首钢的配套能力,在全国范围内,有步骤地建立起稳定的、有相当规模的有色冶金、化工、建材、食品加工等初级原料生产基地,以增加有形资源的实力。同时,要大力加强无形资源的开发,特别是要尽快把北京“四宝”——房地产、金融、科技、信息,转化为资源实力和资金实力,从这两方面抓起,为全面调整准备条件。

(2)以行业集约化、推动科技进步、加速开发新产品和引进产品、设备的国产化为目标,积极推进企业重组,提高产业集中程度。建立企业集团是提高企业规模的一种重要形式,一方面可以把分散的有关企业联合起来,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可以发挥大企业财力、物力、技术力量雄厚的辐射作用,使应该关、停、并、转的企业,能够较为顺利地纳入产业政策的轨道。企业集团还可以在较高层次上统筹安排企业的发展,减少盲目性。根据北京的现实情况和战略发展要求,要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通过产品扩散、在外地投产建厂、与外省市联合经营等多种方式,逐步在毛纺、化工、电力、汽车、建材、电子、机电、高档消费品等生产领域,建立若干个规模不等的跨部门、跨地区的企业集团,形成“一条龙”式的配套发展,使之在全国同行业中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成为北京工业的重要支柱。与此相适应,要以利益兼顾、互相补充、共同发展为原则,建立产业及

企业间的协调机制，以促进生产要素在产业和企业间合理通畅地流动。

(3) 以利润为导向，发展高技术产业，尽快完成产业奠基。高技术产业是知识技术密集、经济效益高的产业，初始发展阶段，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因此，要积极创造条件，一方面通过扩大商品出口增加外汇收入，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吸引国外的科技、人才与资本，率先实行商品化生产与经营。在一定时期内，国家要适当加大这一方面的投资，并采取大力扶植的政策。

(4) 以加强管理、提高效益与质量为中心，改造市区工业，发展郊区工业。要努力提高企业素质，使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达到全国先进水平。利用市场机制，合理调节资源的分配与流向，把有限资源集中用于投入少、产出高的优势行业和拳头产品，把不宜在市区发展的企业或产品，结合技术改造，采取多种形式，逐步扩散到郊区企业，使市区大中型企业逐步成为新产品开发、经营服务和信息咨询中心。

(5) 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中心，建立和完善城乡一体化的农村经济结构，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调整农村经济结构，要十分注意同北京城乡布局和产业布局合理化的要求相统一，实现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效益协调一致。在这个前提下，把农业生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要逐步把粮食生产纳入现代食品生产体系，在保证农民口粮基本自给的基础上，开发本地资源，建立现代化的、稳定的副食品生产和加工基地。要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加快先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努力降低成本。要充分发挥京郊农业的优势，以禽蛋、牛奶工业化生产为前导，逐步建立养猪、养鱼、蔬菜栽培、良种选育等工业化生产，同时进一步加强和提高饲料工业化生产水平，在农业发展的更多领域向规模经济过渡。

## 坚定不移地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44、采取有力措施,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缓解城市供求结构性失衡的矛盾,增强城市载体负荷能力,把北京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国际性城市,具有决定意义。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必须采取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配套、突出重点的指导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基础设施建设的近中期目标是,基本解决城市运行中突出的薄弱环节,增加基础设施短线的综合供给能力,使城市供求逐步向相对平衡过渡;远期目标是,根据现代化国际城市标准,建成高效率的信息和交通系统,高质量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高水平的公用服务设施,从而使城市获得高度统一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45、北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必须突出抓好以下工作:

第一,解决供水紧张问题,努力实现水资源供求的基本平衡。必须把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放在北京基础设施建设的首位,实行以节水求生存,以节水求发展的战略方针。为此,必须改革水资源管理体制,加强水资源使用的全面计划管理,严格控制用水总量;采取行政、经济、立法等手段,制定严格的节水措施;要积极采用世界最先进的节水技术,首先解决用水大户的节水,大力推广污水资源化,尽早把北京建设成节水型城市。同时,要在中央和有关省市的支持下,积极创造条件,尽快实现外流域调水进京。

第二,加快交通与通信建设。交通与通讯设施是城市运行的动脉与神经,也是城市发展制约全局的短线。必须把近期措施与远期规划结合起来,把改善城市布局和管理,与加快设施建设结合起来。从长远看,解决北京交通拥挤的根本措施,在于完

善路网系统和改善交通结构,建设以地铁和现代化有轨交通为核心的高效率快速轨道交通系统。自行车的使用和发展必须加以限制,公共客运交通需要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在通讯、邮电建设方面,要改革现行管理体制,在国家增加建设投资的同时,发动社会各方面集资建设。要重点扩大市内电话容量,增加国际电话线路,增强邮运能力,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第三,改善能源结构,实行民用能源优质化。北京城市能源特别是民用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二次能源十分短缺。解决这个矛盾,一方面要继续做好节能工作,杜绝各方面的浪费,大大降低耗能指标,提高一、二次能源的利用率。另一方面要在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兄弟省市的帮助下,尽早实现“气化北京”的方案,根本改变目前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的状况。近期应重点调整民用能源结构,尽快实现民用能源优质化。与此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快电源和电网建设,以缓解首都电力供应紧张的状况。

第四,搞好环境建设,改善环境质量。北京的环境质量已经恶化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必须从战略上给予高度重视。为此,要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广泛汲取世界各国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的成功经验,逐步加大环境建设的投资比重。今后,城市建设、发展经济的各项工作,都要把防止污染、改善环境质量作为制订规划和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做到建设与保护环境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近期的重点工作,是开展区域性综合治理,对工业及部分生活污染实行总量控制;加速园林绿化建设,使重点保护目标和局部地区的环境质量尽快有所改善。中期的任务,是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在2000年至2010年期间,使环境质量由下降转为上升。远期目标,是把北京建设成为清洁、美丽的城市,在环境质量上达到世界大城市的先进水平。

46、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突出困难是资金短缺。为此，今后在城市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中，应确定合理的基础设施投资比例，五年计划不应低于25%的水平，并力求达到30%。在进一步深化改革过程中，要逐步改变市政公用设施的管理办法，尽可能采取企业化经营；要区别不同情况，对部分市政公用设施实行有偿使用，合理收费；要坚持以行政和立法相结合的形式，全面收取基础设施配套费或综合开发费，扩大城市公用事业的附加收入。此外，还要发行基础设施建设债券，广泛筹集社会闲散资金，等等。通过这些途径，逐步建立起稳定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渠道。为了解决产业发展与政治文化中心建设争夺基础设施的矛盾，今后对新兴产业的发展，应实行与基础设施挂钩的政策，即：新兴产业在创办初期自收自支，形成规模、稳定生产以后，将所创造利润的一部分，专项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 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先导作用

47、北京是显示国家水平的科技智力高度密集的地区。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充分释放科学技术和智力的潜能，将是北京未来经济、社会全面振兴的主要推动力量。北京科学技术的发展，要坚持面向经济建设、面向城市现代化建设和管理，为改善人民生活服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方向。基本途径是走中央与地方联合研究开发的道路，运用高智力与产业嫁接，逐步增强技术实力，形成系统、配套的改造传统产业的科技能力。要有重点有选择地发展一批有相当规模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以推动城市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为我国全面赶超世界水平做出贡献。

48、充分释放北京科技和智力潜能，必须打破条块分割的局

面,积极发展中央科研单位与地方科研力量多种形式的联合,集中力量开展科研攻关,争取在新技术领域研究开发中,在短期内取得较大成果。要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充分释放科学技术和智力的潜能,将是北京贯彻中央关于“放活科研机构,放活科研人员”的方针,积极探索科研机构与企业结合的新形式,力求较快地形成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科研生产联合体,解决好经济和城市建设中最迫切的关键性课题,强化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要大力支持和积极扶持民间科技机构,使这种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新形式,不断深化和完善。要继续加强技术引进工作,制订统一的技术引进计划和政策,把技术引进和提高消化、吸收、创新能力,作为推动北京科技进步的重要战略措施之一。

49、为了充分发挥北京地区的科技优势,使之成为全国科技进步的主导力量,要积极创办两三个科学技术开发区。在开发区内,集中一批航天、超导、微电子、生物工程、激光等方面的科研机构和高级专门人才,组织若干个具有较强实力的科技攻坚群体和若干个高水平、高效益的科研生产联合体。要为开发区的建设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全面实行人才、技术、资金、税收、外汇,外贸等方面的对内对外开放政策。目前,中关村地区的科技开发已经在改革中形成一定规模,初步显示了这方面的潜力,需要总结经验,做好长远发展规划,争取在近中期内取得更大的发展。其他尚未确定的科技开发区,要结合调整城乡布局和各项改革,及早选定、尽快起步。

50、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努力为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人才。当代科学技术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北京城乡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两个文明建设水平的大提高,都取决于全体劳动者思想、文化和身体素质的全面提高。北京既要为自身的现

代化建设培养合格人才，又担负着为全国现代化建设输送合格人才的繁重任务。因此，必须提早做好人才总量和结构的需求预测，制订长远发展规划，从多方面采取重大措施，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不懈努力，奠定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智力基础，培养出一批批高质量的合格人才。

51、要坚持执行“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扎扎实实地抓好基础教育，积极发展幼儿教育，大力提高中小学教育水平。在教育质量稳步提高的前提下，在适当时候考虑延长普及义务教育的年限。同时，要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更新教学内容，发现并推广新的教育和教学方式。要正确处理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基础教育与专业教育、职业教育与在职教育的关系。高等教育要通过现有学校扩建挖潜，扶植重点学科建设和扩大国内外交流等方式，使教学和科研逐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要调动全社会各方面力量，发挥各级、各部门的积极性，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加快成人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加强和扩大在职职工的技术培训。力争到本世纪末，全市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全面提高和进一步扩大高等学校教育，初步形成适合首都现代化建设要求的终身教育体系。

52、为了实现北京教育事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十分重视师范教育，全面提高师资素质和教学水平。师范教育是教育事业总体发展的“母机”，决定着全民教育的总水平，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环节。要努力通过改善办学条件、较大幅度提高教师工资待遇和社会地位等有效措施，使师范院校的学生来源、教育教学的设施设备、师范毕业生的素质等，能够稳步地逐年有所提高。

53、要继续深入进行教育改革。积极推进教育、生产、科研三结合。进一步深化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

步完善新的教师任用制度、招生和分配制度。在办学方向和教学方式上,要积极创造条件,进一步密切教育与北京城乡发展、与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逐步建立起有利于全面提高教育质量、造就一代新人的、充满活力的教育体制。

## 加强文化建设 提高精神文明

54、随着改革深入和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将伴随着文化建设高潮的兴起和社会观念的深刻变革。作为我国对内对外窗口的北京,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人民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等,都将在这里得到全面的展示。因此,大力加强北京的文化建设,努力提高精神文明水平,对于实现发展战略总目标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对于鼓舞人民建设四化、振兴中华,也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55、北京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战略目标,是永葆北京文化经久不衰,充分发挥精神产品在国内外的强大凝聚力与辐射力。具体说,是要适应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培育体现时代风貌的“北京精神”,造就出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与此同时,逐步建成能够全面代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精粹,对于世界文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当代世界文化名城。

56、北京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培育“首都意识”和“北京精神”,造就“四有”新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延安精神”,曾经激励全党全民族团结一致,夺取了全国胜利,并鼓舞获得解放不久的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辉煌成就。当前,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国内外迅速发展着的形势,都迫切要求北京带头形成良好的党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道德风尚、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

形成反映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民风民俗，和科学、文明、健康的社会主义现代生活方式。当代的北京人，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荣誉感和历史感，继承和发扬当年的“延安精神”，勇于创造出代表新时代风貌的“北京精神”，不辜负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愿望。为此，要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建设，在全市人民中大力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法制教育，进行深入系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在全体市民中牢固树立起以“高标准、严要求、创一流、做表率”为基本内容的“首都意识”。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和文化活动，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逐步形成体现新时期革命性、科学性和创造性要求的，以具有开拓创新的勇气，奋力进取的品格，实事求是的作风，遵纪守法的观念，谦虚谨慎的态度，勤俭朴素的传统为核心内容的“北京精神”。要从青少年开始，把“四有”教育，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各种教育的始终，坚持德、智、体、劳、美全面发展的方针，培育起新一代具有强烈“首都意识”和“北京精神”的“四有”新人。

第二，形成具有北京地方特色的文化体系，源源不断地创造出大量高质的精神产品。北京拥有全国各地所不及的文化遗产，地方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特别是经过新中国 38 年的丰富、发展和提高，已具有建成当代世界文化名城的基本条件。为了完成这一历史重任，从现在起，北京的文化建设要重点选择自身具有优势、能够影响全国发展、代表国家形象的文化系列。目前，初步筛选的文化系列，由以下基本内容组成：历史文化、革命文化、思想文化、科教文化、艺术文化、社区文化、环境文化、饮食文化、家庭文化等等。同时，充分发挥体育、卫生、新闻、出版、信息、博物博览馆等其它各项文化事业的作用，重视影视、声像等现代化技术手段和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不断创造出崭新的文

化种类和艺术形式,努力生产出大批反映时代风貌、鼓舞人民斗志、振奋民族精神、艺术精湛的社会主义精神产品。

第三,逐步兴建与世界文化名城地位相适应的先进设施,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无论是发掘和继承传统文化,还是交流与创造现代文化,都要依靠必要的技术设备和先进设施。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多,人民群众文化享受的需求在深度和广度上也将大幅度增加。因此,从现在起,应根据财力和物力的可能,着手规划、设计并建设拥有现代先进技术装备的,适合国内外文化交流需要的国家级文化设施;同时,制定有关政策,拨发专项资金,动员各级政府和群众团体,按照城市功能分区的要求,兴建各种专业或综合的博物馆、图书馆、展览馆、娱乐厅、俱乐部等等。要鼓励区、县、乡、村、街道自建体现社区传统文化精华的博物馆,以及群众活动便利、内容健康的文化活动站(室)。历史上所形成的北京独特城市风貌和文化环境,既是中华祖先遗留给当代北京人的不可多得的珍宝,又是北京立足国际发达城市之林,成为当代世界文化名城的基本条件。在城市建设,特别是在旧城区内兴建文化设施时,尤其要格外注意和原有建筑风貌和文化环境多方面的协调,避免造成“建设性破坏”。

57、实现北京文化建设目标的基本途径是:

(1)依靠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教育科学技术进步,普遍提高全体市民的文化素养。生产力诸要素,特别是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是提高民族文化素养,更新传统观念,创造新的生活方式的基本决定因素,因而也是社会文化发生和发展最基本推动力量。北京要充分利用科技和教育比较发达的优势,提高对外文化交流的能力,要通过发展形式多样的各类教育事业,使科学技术成果和文化知识普及化。要注意培养人们的观察能力、研究

能力和发明创造能力，使新一代北京人具有现代观念和良好的创造能力。

(2) 依靠广大市民的创造精神和建设热情，培植新思想、新观念的生长点。近几年来，人民创造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文明共建”等众多精神文明建设的好形式，在北京当代的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要进一步动员全体市民，更广泛的依靠群众，积极培育和扶植那些内容健康、形式新颖的文化生长点，不断丰富和发展北京的古老文化，产生和形成当代的新文化。

(3) 依靠国家对外开放政策提供的机遇和条件，通过国际间的交流，巩固和发展北京的文化体系。任何民族的优秀文化都不可能是在封闭状态下发展完善，北京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要在继承发扬传统优秀文化的同时，勇于吸收融合世界进步文化和各民族艺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方向的前提下，善于借助外来文化的冲击力量，割除传统文化中封建主义和落后保守的固疾，不断创造出充满活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58、实现北京文化建设的宏传目标，需要根据国家和首都发展战略的总体安排，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集中各方面力量，完成文化建设高潮到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主要方面是：

(1) 确立文化产业的战略地位，并制定相应的发展政策。北京的文化遗产和现代文化事业具有雄厚的基础，与有限的自然资源相比，这是北京的优势所在。要充分认识文化遗产和文化事业蕴藏的巨大经济潜能，并把它列为北京长远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战略产业。通过改革和发展，逐步加大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总体结构中的比重。近中期内，应通过发展国际旅游、艺术表演和展览、服饰设计、民间工艺纪念品制作、美食加工、美容美













